

军事天地

48 一波三折的印度航母之路 / 石稼

人物

纪念徐向前诞辰 120 周年

55 “布衣元帅”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公私分明的家规不能忘” / 刘畅

人物春秋

63 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宋时轮（上） / 蒲元

百岁黄埔老人

69 黄埔老兵苏长禄：国家兴则百姓兴 / 肖燕萍

我的黄埔前辈

71 他是怎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小妮

历史

口述历史

74 我的黄埔老师皮天钊 / 杨大昆

黄埔研究

79 恽代英对黄埔军校的贡献分析 / 李立

黄埔收藏

84 浅谈中央军校人事训练班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89 1926 年 4 月 13 日，唐生智派代表前来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黄埔连载

93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四）/ 熊子杰



双月刊 单月 1 日出版
2021 年 第 6 期 总第 201 期



2 碧血丹心卫星城——纪念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 80 周年



55 “布衣元帅”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公私分明的家规不能忘”



69 黄埔老兵苏长禄：国家兴则百姓兴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droid



ios

碧血丹心卫星城

——纪念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 80 周年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冈村宁次在给日本军部的报告书《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写道:“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 200 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系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固然,冈村宁次的报告明显低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和巨大力量,但黄埔师生的抗日意志由此可见一斑。黄埔师生的抗日意志从何而来,为何让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军如此忌惮?翻开黄埔军校历

史,我们不难发现,是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铸就了黄埔师生反抗外国侵略的铁血丹心,成为挺立在日军面前摧不垮、打不倒的钢铁长城。

今年是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 80 周年,本刊“碧血丹心卫星城——纪念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 80 周年”特别策划将带领读者走进那段烽火岁月,重温当年黄埔师生的抗日壮举,祭奠英勇牺牲的抗日英烈,传承和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以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本期特别策划得到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背景

□ 李宣钊

1939年9月，日军调集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及部分空海军共10万兵力，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称湘赣作战），妄图消灭我第九战区抗战部队主力。第九战区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加上其他配属部队共30万人参战，历经一个月，歼敌3万余人（日军自认伤亡3600余人，其雇佣军及汉奸部队伤亡人数不在统计之内），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仅就局部战争而言，双方各有胜败。从整个抗战局势而言，中方更为有利。

战后，冈村宁次认真研究了各个部队的作战报告，动手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递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造寿大将。冈村宁次在写给日本军部的报告书《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承认：“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系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很显然，日军发动



/ 薛岳（赠给黄保德）。



/ 阿南惟几。

第一次长沙会战没有达到目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湖南战场大约沉寂了两年。薛岳利用这段时间大力发展湖南经济，训练军队与民众，并命令部队经

常出击骚扰敌军。1939年冬，薛岳还策划指挥了冬季扫荡战。我赣北、鄂南、湘北各部队主动出击，炸毁日军铁道机车及军火仓库，破坏日军交通通讯，以游击战袭击日寇各据点，积小胜为大胜，消耗日军兵力，打击日军的器张气焰，增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这期间，第九战区的部队得到修整和补充，战斗力显著增强，对武汉地区的日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1940年8月，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约定的谈判泡汤，日本方面寄予希望的“桐工作”诱和计划失败。

1941年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4月，阿南惟几接替园部和一郎出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的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上

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摧毁敌（指国民政府）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9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向第11军传达了大本营的命令。其命令内容如下：

大陆令第538号


昭和十六年（1941年）8月26日命令：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当前任务，夏秋之际在华中方面可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

大本营

经过反复的空中侦查，阿南司令官认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失败在于兵力分散，因此此次决定集中兵力，力争在汨水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九战区主力，进攻时间定于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10周年日。兵力方面，阿南惟几组织了第3、第4、第6、第40

师团，第13师团一部，加上4个步兵支队、2个山炮联队、2个重炮联队、1个坦克联队、1个高射炮联队、3个工兵联队、2个飞行团180架飞机、30多艘军舰、200多艘汽艇，总兵力约15万。

根据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中国军队反攻方针，薛岳拟定了第九战区反攻作战计划，反攻与御敌均注重鄂南、赣北、湘北三面。但是，日军第6师团却先期于9月7日开始扫荡我岳阳大云山地区，打响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前哨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过

□ 李宣钊

大云山前哨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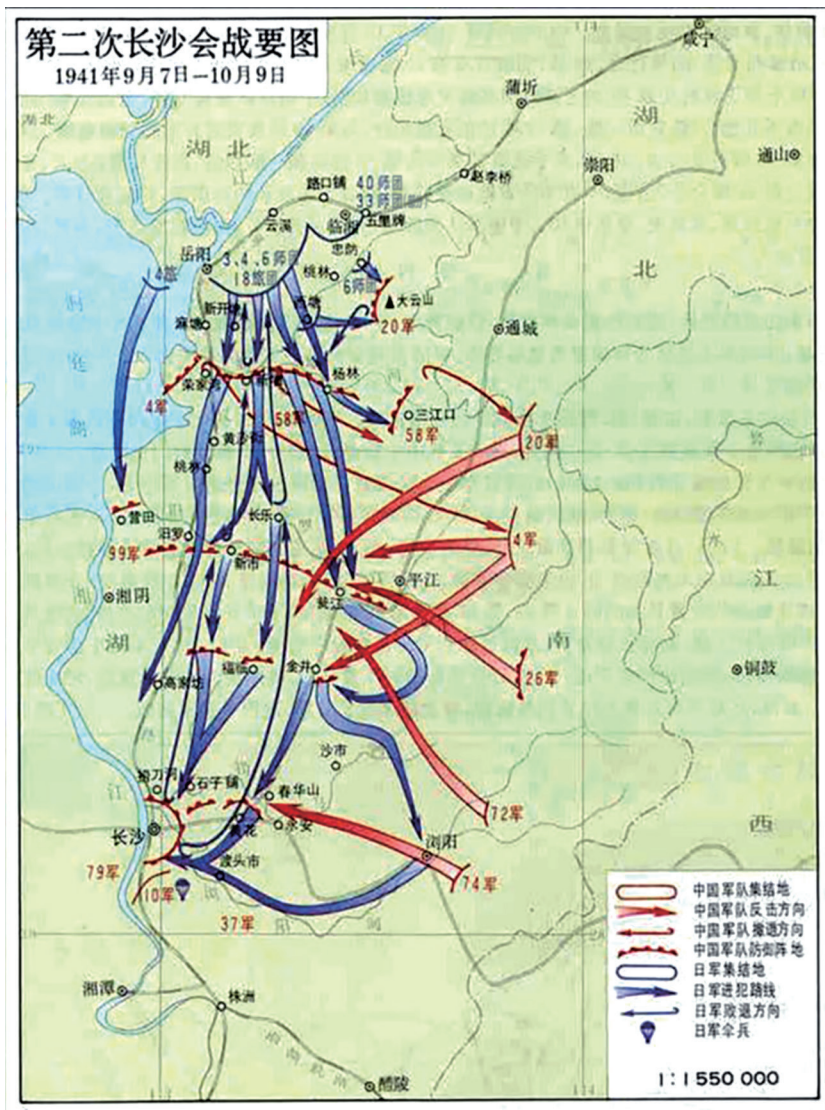
大云山位于湖南省岳阳县新墙河上游的昌水北岸，海拔960余米。这里山势险要，道路崎岖，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大云山屏障湘北，由东北出横溪可通羊楼司接湖北蒲圻，由东南下北港直至通城，由西北经桃林逼近岳阳，是湘北的咽喉所在。

1941年9月，大云山除了驻扎第4军以外，部分由第58军防御。9月3日，日军第6师团突然进驻岳阳西塘。第二天（9月4日），

师团长神田正种亲临托坝高地视察。3天后，第6师团分别由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而忠防、桃林等地的日军也各自增加到7000-8000人。9月7日，日军第13联队和第45联队分途进犯：一路自忠防经南山、詹家桥直奔南冲；另一路由西塘经尖山、刘家冲向八百市急进。同时，日军出动飞机10架对八百市、杨林街进行狂轰滥炸。第4军军长欧震命令第4攻击队及第102师官兵阻敌，以死守活打方式与日军周旋。午后，日军以大炮掩护，集中兵力猛攻鸭婆岭、草鞋岭之

线，我方宋家坳阵地被突破，日军乘机急进，我白羊田、八百市、甘田一带遂落敌手，南冲附近也被敌人占据，大云山陷入日军包围之中，形势非常紧张。

8日晨，敌派增援部队合围大云山，我守军奋力抵抗，至中午，大云山制高点被敌攻陷。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急令欧震第4军各部从外线侧击敌军。9日子夜，我军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遂合力猛攻日军。新10师挺进毛田、冷水坑一线，第102师也攻抵甘田、石塘坳一带，敌退据五龙桥、白羊田附近。



/ 第二次长沙会战要图。

10日，日军第6师团撤往桃林，扫荡大云山任务改交第40师团，两军交接空隙被我新编第10师抓住，我军乘势收复大云山。我军第60师抵达长乐街并继续挺进昌水北岸，也进入大云山阵地。同日上午10时，第九战区最高司令长官薛岳以电话命令第27集团军司令杨森：“着第37军之60师，归第4军军长欧震指

挥，即以新10师、第59师、第60师聚歼该敌，限立即行动，于明日（11日）拂晓会攻。杨森接令后，指挥新10师自东向西、第59师由西向东、第60师由南向北包围日军，着各师务协同一致，限于明（11）日拂晓前开始攻击，并在本（10）日晚着派部队夜袭为要。”11日拂晓，第27集团军发起全面反攻，日军第6师团第

13联队损失惨重，固守待援。而日军第40师团刚换防上阵，不知道日军第6师团已报告扫清了的大云山又被我新编第10师夺回，其重松支队抵达甘田时即遭受我新编第10师猛攻，损失亦惨重，竟日苦战后，方得以与固守的敌第13联队会合，却又陷入包围之中。日军为解第40师团之围，派荒木支队前往支援。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亦命第102师主力、第59师、新编第11师赶赴大云山参战。13日，我军四面攻击日军第40师团，日军伤亡惨重，我军亦遭受重大伤亡。

9月15日，杨森在指挥大云山反扫荡作战中获知岳阳方面已集结了4个师团以上的日军，这才意识到日军有大规模进犯第九战区的可能，于是急忙电告第九战区司令部，并命令第4军余部在新墙河防线加强戒备，令通城方面的第20军准备参加新墙河战斗。薛岳很想全歼陷入包围的日军第40师团，但得知日军主力已在新墙河前线集结完毕，大战即将爆发，薛岳不得不忍痛将大云山战斗的部队撤回防守新墙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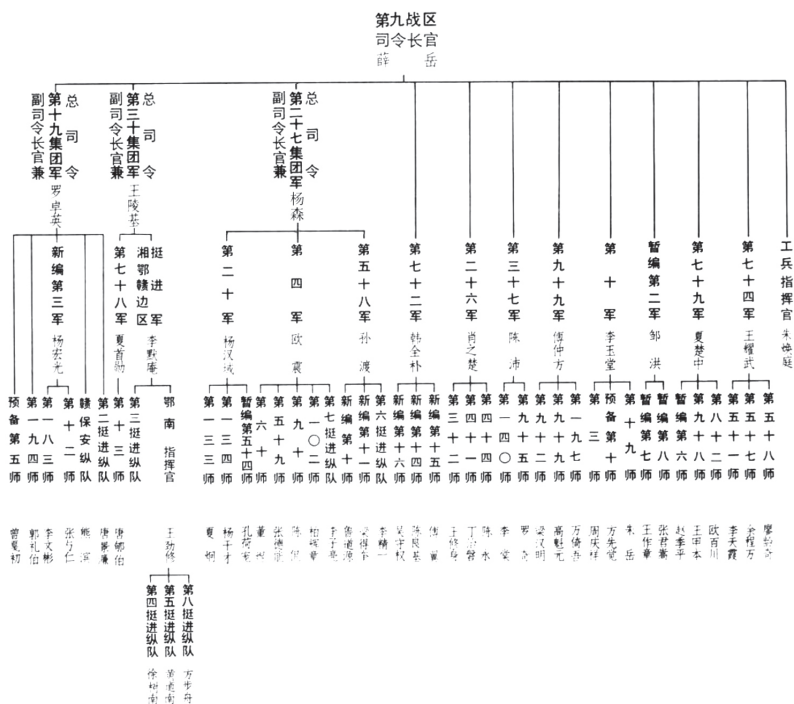
此时，日军分别由临湘、岳阳县北向新墙河一线增兵六七万人，坦克装甲车百余辆，企图按预订计划向新墙河南岸进犯。我第4军第102师和第58军大部转移到新墙河南岸。16日晨，我第4军59师和第58军新10师还在大云

山附近的八百市、白羊田接战。然而日军已经将主力部队集中在新墙河的中部及西部，战事重心已逐步离开大云山，转向新墙河一线。

关于大云山战斗，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第11军曾令第6师团扫荡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1000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9月10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4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为第40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11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遭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15日夜，11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

大云山战斗是日军为掩护部队集中和缓解侧翼压力而进行的一次作战。在这次作战中，第27集团军以5个师的兵力先后与日军2个师团英勇战斗了10天，予敌人以重大打击（日军在大云山战斗中的伤亡几乎占整个会战伤亡的一半），粉碎了日军攻占大云山以掩护其进攻侧翼的企图，为后来第27集团军保卫平江和进攻长沙之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第27集团军主力长期滞留于大云山附近，虽然给日军两个联队以重创，但并没有全歼进攻之敌的主力，还导致了我防守新墙河兵力分散，新墙河正面空虚，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8月下旬）



/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 日军小型装甲车艰难渡过新墙河。



/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攻克平江，扫射残敌。

日军主力在湘北地区从容集结，我新墙河防线被轻易突破。

新墙河防线战斗

9月18日拂晓，日军主力对我新墙河防线发动攻击，新墙河前线遭到日军强大火力打击，整个第27集团军部署全被打乱，昌水以北各部不得不撤离大云山阵地，转入新墙河战场。

18日凌晨，日军集结步兵五六万、骑兵数千在大炮300多门、战车数百辆的掩护下，向新墙河以北仅仅20公里宽的战场展开猛烈进攻。日军分别在岳阳县小塘、穆家渡、四六方、潼溪街、杉木桥等地区作正面强渡，骑兵及装甲车向我军阵地猛冲，伞兵亦陆续在我井塘冲阵地后方降落。不久，数十架日机又飞临上空，对新墙河南岸进行狂轰滥炸，

不多时，我军第一线阵地的工事全被摧毁，我守军官兵伤亡惨重。4时左右，日军开始强渡新墙河，步兵在骑兵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如潮水般涌过河来。此时，我第59师主力仍在大云山地区，这里仅有少部分部队防守。而第90师和第102师刚到达指定位置，来不及休整即仓促应战，相当被动。但即便如此，我军仍不怕牺牲，英勇苦战。其中，尤以第102师最为顽强。他们连续打退了日军数次强渡，并集中该师所有迫击炮封锁河桥通道，迫使日军攻势稍减。苦战至10时，新墙上游阵地最终全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师团迅速通过突破口，向我第90师后方包抄。日军第6师团、第3师团也击破我军第90、第60师的奋力抵抗，攻占了长湖、白羊冲、大荆街。至18日上午，新墙

河阵地已全部被敌军突破。我军虽英勇苦战，但终于不敌日军强大攻势，牺牲惨重。军长欧震不得不命令第4军所部（附第60师）逐次向关王桥以东转移。当天傍晚，突破沙港河防线的日军第40师团右翼（龟川联队）攻占胡少保，其左翼（重松联队）进逼步仙桥。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19日拂晓，日军第40师团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向步仙桥以南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第4军（附第60师）依据修筑的工事，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惨烈。

本次战斗，薛岳原打算在汨水两岸歼灭敌军，遂于18日电令第99军的99师、92师两个师由第37军陈沛统一指挥，设置阵地于浯口至三姐桥一线；第26军集结金井、将军坝；第72军调平江；战区炮团进至金井，先协助第37军守势作战，再协助第26军攻势作战。随即又电令第27集团军于汨水以北向敌侧背发起攻击，以迟滞敌军南下。如果不出意外，此部署应该是有效的。不料，日军特种情报部门截获了第九战区司令部发给各部队的电文并破译了密码，掌握了我军部队的部署计划，以至于原本武器装备就优于我军的日军提前部署，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汨罗江阻击战

日军破译薛岳的电令后，对

第九战区各部行动了如指掌，阿南惟几决定立即变更原定在湘江两岸消灭中国军队的计划，改在捞刀河以北打击中国军队，对企图自东侧击日军的第26军肖之楚部等进行包围。20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下达命令，将日军主力推进至汨水南岸，准备下一步攻击；第6师团以一部侧击第26军并占领攻势据点；第3师团、第4师团各接守前锋部队守备，然后向前推进。

由于日军第40师团未能消灭在大云山和幕阜山地区集结的第27集团军，因此始终无法解除来自侧后方的威胁。

20日拂晓，日军在关王桥以南集结完毕后，开始向朱公桥发动进攻。先期到达的第60师一部凭借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日军进展缓慢。与此同时，第4军90师和60师主力奉命向日军第40师团侧翼攻击，分别攻占鲁家虾、张家园。第60师副师长黄保德（黄埔第5期毕业）率部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偷袭了日军第40师团在张家园的供应基地，出其不意地击溃张家园的日军三四百人，夺取日军第40师团的炮弹及补给品。恼羞成怒的日军发疯般地四面围攻第60师，并出动飞机10余架低空轰炸，日军便衣队切断了第60师的通讯联系，英勇的第60师官兵坚守不退，但伤亡严重。

此时，第20军和第58军开始



／第60师师长董煜（左）、副师长黄保德（右）、参谋长谢日暘（中）在大云山视察阵地。

向日军后翼发起猛烈攻击。当天，第20军134师在第4军59师配合下攻占胡少保、石塘。深夜，第20军又袭占关王桥，并在第4军和第58军的协同下，打退了日军重松联队的反扑。日军为挽回不利局面，以重松联队第1大队连续猛攻第60师据守之水口桥东北高地。战斗到21日傍晚，第60师放弃该地退守朱公桥。第4军亦退到东港、黄泥岭和马嘶洞，以及毛大申、风角尖之线。而第20军则继续攻击登龙桥、关王桥附近之敌，以策应第58军向归义方向挺进，进攻长沙日军主力的后翼。

20日傍晚，根据阿南惟几的命令，日军第3、第4、第6师团继续向汨罗江推进。当天，天降大雨，已经被我军民严重破坏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日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

面对强大的日军主力，我第37军与第99军严阵以待，官兵们摩拳擦掌，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20日午夜，第37军95师及140师乘南渡汨罗江的日军立足未稳，夜袭兴隆山、马头岭、鸭婆尖、狮形山、新市等地。日军先头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所占阵地被我军收复。21日晨，日军一部疯狂反扑，遭到第37军、第99军顽强抵抗。至此，两军在汨水两岸展开殊死战斗。

22日晨，阿南惟几得知被日军视为最大劲敌的第74军已向浏阳附近集结，而第九战区的另一支主力第10军也由衡山向金井开进，立刻紧张起来。阿南惟几决心赶在第74军和第10军到达战场前击破当面之第37军和第26军，于是，他命令各师团提前开始进攻。日军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第11军司令部命令第6师团放弃占领平江的计划，“在第40师团进入金井北侧地区后，应及时将主力向捞刀河上流河谷转进，切断金井方面敌军向浏阳方面的退路，并阻止敌第74军从浏阳方面前进”。

日军第3师团在栗山巷附近遭到第37军第140师的顽强阻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日军猛攻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取得突破。其中，第140师防守的兴隆山阵地失而复得达4次之多，可以想象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激烈。

22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数倍于我军之兵力大举进攻第37军95师284团阵地。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的团长黄红指挥将士奋起反击，激战3昼夜，击退日军多次冲锋，日军尸横遍野。战至最后，284团仅剩百余人，黄红壮烈牺牲。

这期间，薛岳接到蒋介石长途电话令：“第七战区抽调一军（两师），即日用铁道输送至株洲，限25日到达曲江。战炮第54团，即以第3营用铁道输送至长沙附近，限23日前到达。第5军即将驻全州之战车一连，用铁道输送到涑口附近，第六战区应速派一师，统归夏楚中军长指挥（原率两师），限23日到达益阳、宁乡地区，均归第九战区指挥。”

23日，日军第4师团在同乐桥、双江口附近遭到第95师及第26军第41师的英勇阻击，进展迟缓。为了加快进攻速度，第4师团师团长北野宪造不得不命令早渊支队向神鼎山西侧穿插，从第99师与第95师的结合部突破我军防线。但早渊支队于23日中午到达密岩山时，遭到第95师一部顽强堵击。

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右翼部队在21日与我第26军第44师激战了一整天。由于我军后继炮兵未到，火力贫弱，第44师只得节节抵抗，步步后退。22日中午，瓮江失守，日军继续向南进

犯。下午，第44师退到瓮江以南1公里的喻家关附近，奉命停止退却，死守待援。双方遂在喻家关、风源洞、白源洞一线展开激烈的拼杀。同日，为了缓解战局，第26军军长萧之楚命令第32师反击涑口。双方展开激战，伤亡均重。23日，第32师支持不住，被迫后撤。萧之楚将部队撤到蒲塘一带，各师靠拢，阻击日军。这时，日军第6师团为了围歼第26军，命令荒木支队由瓮江向南攻；刚解除攻占平江任务的竹原支队向金井突进。为此，我第26军各部在转进中均遭到日军的包围，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恶战，全军被打得七零八落。23日上午，第10军到达金井一带，稍事休整，当晚即奉命接替第140师在金井及其北面的防地。第10军军长李玉堂令第190师防守检石厂、麻峰嘴东侧阵地，预10师据守金井、福临铺的既设阵地，第3师占领福临铺、影珠山、栗桥、茅根坝一线阵地。第二天上午，日军即以骑兵向预10师阵地袭扰，均被我军击退。

24日拂晓，第190师奉命北上支援第140师，在花门楼与日军第3师团第39旅团遭遇，当即占领有利地形进行抵抗。战斗中，第190师损失甚重，副师长赖传湘（黄埔4期毕业）殉国，部队被迫向福临铺突围。第140师在日军围攻下，已无法支持。李棠



/ 赖传湘。

师长率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日军重围，向南撤退。上午，第95师阵地被突破多处。日军第39旅团已击破第190师行进到第37军背后，形成了对第37军的包围。为了避免被日军围歼，军长陈沛命令部队向麻林桥退却。就在日军猛攻金井、福临铺之时，日军第40师团又加入战斗，协同第6师团向蒲塘攻击，战斗更加惨烈。

24日晚，日军第6师团乘机占领金井。金井一失，第26军的后路就被切断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夺回金井。预10师师长方先觉一面将情况上报军部，一面指挥预10师官兵与日军反复争夺金井。殊不知，当日下午，日军向预10师侧后迂回，企图切断预10师后路。当晚，日军第39旅团又向预10师左翼古华山、西乡瑕攻击。25日，为避免被日军围歼，预10师只得退守学士桥一线。日军跟踪追击，第3师

团在击破第37军后，也向该线发起进攻，预10师新占阵地全被突破，只得向万家铺、麻林桥退却。

25日，日军突进至何家坪、五台洞，威胁到第26军指挥所，幸有第140师一部前来支援，才稳住了局面。当天，薛岳电令第26军向更鼓台、石湾转进，协同第72军夹击自三角塘向金井进攻之敌军。继肖之楚第26军被日军击破之后，陈沛指挥的第37军和第99军在汨罗江南岸占领阵地时，也被日军一一击破。25日，杨森获知汨罗江以南战局不利，心急如焚，严令各部向当面之敌猛攻。于是，各部全力攻击。到当日中午，第20军第134师攻克长乐街以北一公里之赤马江、三里牌，击毁往来于公路之上日军汽车20余辆。第58军亦于大荆街附近袭击日军运输队，毁其汽车10余辆。与此同时，防守洞庭湖东岸的第99军也趁当面日军兵力减少之机，以湘阴、大娘桥为支点，由西向东发动攻势，以策应各方面作战。这样，我军开始逐步夺回汨罗江两岸战场的主动权。

长沙争夺战

尽管日军截获我军电报并破译了密码，使我军损失巨大，但进犯的日军仍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第九战区司令部也不断调整布署，从各地调集部队，急速行进支援长沙。



/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阻击日军。

24日，薛岳见汨罗江战事渐趋不利，认为日军必将进攻长沙，遂率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了长沙城，移往湘潭。到达湘潭后，薛岳打算调第79军和第74军协同保卫长沙。

25日，薛岳命令第74军以先头部队两个师急速挺进黄花市，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嘴一线阻击南进之敌，保卫长沙城。不料此电令又被日军破译。敌军改变部署，先占领春华山，以逸待劳主动攻击奔袭过来的第74军第57、58师，企图先消灭中国最精锐的第74军再进攻长沙。在第74军军长王耀武命令下，第57师拼死夺取春华山，已请假回家探亲的第58师师长廖龄奇（黄埔第4期毕业）赶回部队，率领部下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扫清了春华山附近各日军据点。王耀武立即抓住时机，命令部

队发起总攻。第57师猛攻正面之日军第3师团，遭到日军疯狂反扑。日军第4师团一部增援攻击57师左翼，57师顽强抵抗，顶住了敌军的猛烈攻击，但伤亡惨重达3000余人。第58师攻击敌第6师团，经激烈战斗后攻进夏家塘、伍家渡一线。27日，敌第3师团主力加入战斗，空军亦配合作战，第58师被分隔包围，陷入苦战。我第51师赶到战场，立即向第6师团攻击。整个第74军都陷入苦战之中，至27日半夜，第74军突出日军包围，撤至浏阳河南岸高地，稍事修整准备再战。

日军突破我军战线后，兵临长沙城下。27日晨，几乎与日军同时抵达的从常德赶来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进驻岳麓山，师长王甲本率第98师主动发起进攻，但不敌日军20多架轰炸机狂轰滥炸和猛烈反击。下午，日军突

破98师防线进入长沙城。晚上，奉薛岳命令来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8师抵达左家塘，随后占领长沙东郊杨家山阵地，然而其攻击日军受挫，退往打靶场一带。28日，第79军暂编第6师到达岳麓山，29日渡过湘江与日军早渊支队开战。30日，暂编第6师师长赵季平率部攻入长沙城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同日，日军第4师团主力抵东郊金盆岭一带，第6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40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集结于沙市街附近，平野支队在庐林潭附近，江腾支队在关王桥附近。至此，日军基本占领长沙。日军第3师团突破暂编第8师防线，并一度占领老百姓已经撤离的“空城”株洲。

其实，当日军强渡汨罗江威逼长沙的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下达了援助长沙会战的有关电令，主要内容为：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23日开始实施。各战区向各自当面之敌发动范围广泛的袭扰行动，第三战区全面袭击日军据点，第五战区以破坏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为重点。这些对日军都构

成了一定的威胁，影响最大的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反攻作战，使日军受到了震撼。面对这种情况，阿南惟几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被迫放弃了完全攻占长沙的机会，下令全军反转，驰援宜昌。

9月2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就认定日军“其势已疲，其兵站线亦不易推进”，是切断其退路，歼灭日军的良机，要求薛岳不管长沙如何，英勇截击敌后路，力求全歼。

30日，日军第4师团参谋长吉田茂登彦因师团粮弹供给不上，用信鸽向日军南岳兵站传信：“目下该部与本部因无法联络，希望速将粮秣四五吨，迫击炮弹约500，向石灰嘴输送补给。不得已时，着该队至罗家坪。”不料信鸽在飞行途中被王甲本第98师士兵击落。薛岳得到这份重要情报，获悉日军弹尽粮绝，大喜过望，认为反攻机会来到了！薛岳当即命令长沙周围各部队发起反击：第79军固守长沙待援，第10、第37、第74军侧击日军，第27集团军等严防日军北撤，第99军救援长沙，暂编第2军攻占株洲，并连同固守长沙的第79军一起向北追歼撤退日军。

追击日军

9月30日，薛岳即下令王耀武第74军追击日军，予敌沉重打击。并令第11、12两挺进支

队即刻将杨林街、长乐街及新墙、新市的道路彻底切断，以断日军归路。

10月1日，阿南惟几下达了北撤命令，接到命令后，日军第3、第4、第6师团跟随在第40师团之后陆续撤退。中午，长沙附近日军全部溃散。此时，薛岳命令：

一、夏军（第78军）以主力向新市、长乐街跟踪追击。

二、韩军（第72军）速经平江西北山地向杨林街超越截击。

三、孙军（第58军）迅速超越浯口由长乐街、关王桥截击。

四、欧、杨两军（第4、第20军）及傅军（第99军）梁、高两师（第92、第99师），分在金井、麻峰咀、青山市、马鞍铺自东向西截击。

五、萧、王、邹三军（第26、第74、暂2军）清扫浏阳、捞刀两河岸战场。

六、王指挥官劲修亲率第四、第五、第八挺进纵队，于咸宁、蒲圻间截击；第六及第七挺进纵队于新墙、杨林街及忠防、杨林街间截击，并申令各部编组便衣队，注重超越侧击、伏击，乘敌疲惫及夜间宿营时予以猛烈奇袭，务使溃败之敌不得回巢。

10月2日，日军北渡捞刀河，自岳阳出动坦克车8辆，装甲车22辆，掩护汽车100余辆向南奔驶，企图接应溃敌突围北去。然而我第20军已于先日攻克麻峰

咀，并以主力紧扼其通道。故日军刚到就遭到我军迎击，日军不得已只能掉头北窜。当晚，欧震第4军完成固守金井部署，正好遇上日军汽车200余辆及步兵5000余众自南窜来，第4军当即予以痛击。10月3日，日军以汽球升空施放烟幕，企图掩护溃兵改向西北移动。我第4军立即以一部扼守蒲塘，一部断绝脱甲桥通道，主力则对陆续北溃之敌主力猛击。至此，日军乃改道向福临铺、李家墩、新市狼狈逃窜。日军经我连日之截击，队伍混乱不堪，加上饥饿疲乏交困，一遇宿营机会，即倒地酣睡。故杨森总司令复遵薛岳令：飭欧、杨两军（第4、第20军）即夜编组敢死队，轻装急进，乘夜袭击敌营。我军多处出击，大有斩获。

福临铺、栗桥是由长沙北渡汨水必经之要道，影珠山雄踞道旁，其南面无险可资设伏。10月2日晚，我第99军92师夜袭集中于路口畚、枫林港之间的日军后，乃以主力转移影珠山，协同第99师扼要据守，并分途设伏。至10月3日清晨，日军第3、第6师团主力自南向北溃逃，我军奋力截击。日军也以飞机、大炮对我猛轰，并一再顽固向我各高地军仰攻。双方战斗到下午，日军一部乘隙向北逃逸，大部仍被阻。4日晨，日军以步兵、骑兵、炮兵数千之众，借飞机10余架之掩护，分三

路猛犯福临铺。战斗期间，我军阵地一度被突破，日军主力遂且战且走，乘机突围，而群集栗桥、李家墩道路之敌于当晚乘隙逃走。

自9月28日后，汨罗江口之何塘寺有日军小型兵舰多艘，用以掩护其千余汽艇及帆船抢运伤病员及军械向北逃逸。10月1日后，日军伤亡更多，由于何塘寺港口浅小，运伤病之船舰稍大者即不能停泊，于是，日军转向了营田、湘阴等处的港口。3日拂晓，日军海军陆战队500余众，借飞机3架之掩护，在湘阴城北箭毛咀、马头山一带强行登陆，我第99师295团1营营长曹克人（黄埔14期毕业）带领全营奋力阻御，日军伤亡甚众。上午，日军出动飞机12架再来狂炸我阵地及湘阴城区。下午，我援军赶到反攻，日军竟施放毒气弹，战斗更加惨烈。4日上午，敌军不断增派援军，而自长沙北溃的日军第4师团主力万余众此时也窜达周家桥一带，猛烈向湘阴城攻击。我第99师295团1营官兵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拼死抵抗日军。最终，寡不敌众，我295团1营官兵伤亡殆尽，曹克人营长以身殉国。

4日，薛岳命令：“败敌必迅速汨罗、新墙北溃，欧军（第4军）应速由长乐街北渡，协同孙军（第58军）自东向西截击；杨军（第20军）由伍公市、新市渡河尾敌穷追；傅军（第99军）高

（第99师）、梁（第92师）两师及夏军（79军）即速分头向新市、归义、营田、湘阴之敌逼进。”5日晚，第72军赶到岳阳县的杨林街、黄岸市，第58军则早就据守于胡少保、洪源洞及其以西地区严阵以待，狼狈北渡的日军主力被我军截击。

6日，第58军新10师既以主力分编为若干袭击队，又选编官兵多组，潜入日军退路侧近，占据要点伏击日军。其间，日军一再增援反扑，并利用飞机大炮不断对我军进行狂轰滥炸，以掩护其主力北逃，我军官兵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第72军开始猛攻新墙、箠口，第4军到达关王桥协同第58军续向潼溪街追击。各挺进纵队更是四处毁敌交通，焚敌粮弹，以至于岳阳的日军宣布特别戒严，纷纷将重要军事物资移置铁道沿线，并强拉民夫抢粮北运。

10月7日，薛岳申令：“残敌已渡新墙北走，我决追歼之，并乘机攻略临岳，今特重新部署，各部应断然穷追，努力达成任务。”

8日，我各军均积极行动，分向指定目标前进。9日，第72军越过新墙河向忠防、临湘地区急进，而第4军、第58军两军则猛烈攻击桃林、西塘之敌。

10日，中日两军恢复战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 中国军队师级以上的黄埔师生 (不完全统计)

□ 刘健

吴逸志，黄埔军校教官，广东丰顺人，第九战区参谋长。辅佐薛岳进行长沙保卫战。

罗为雄，黄埔军校教导团团副及独立营营长，广东大埔人。第九战区第19集团军参谋长。

李玉堂，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山东广饶人。第10军军长。

陈沛，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茂名。第37军军长。

夏楚中，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湖南桃江人。第79军军长。

李默庵，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湖南长沙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

王劲修，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湖南长沙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副总指挥兼鄂南指挥部长官。

余程万，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台山人。第19集团军第74军第57师师长。

董煜，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化县(化州)人。第37军第60师师长。

罗奇，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西容县人。第37军第95师师长。

梁汉明，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信宜人。第99军第92师师长。

张君嵩，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合浦人。暂编第2军暂编第8师师长。

王作华，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广东罗定人。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师长。

王耀武，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山东泰安人。第74军军长。

李天霞，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江苏宝山(现为上海)人。第74军第51师师长。

方先觉，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安徽萧县人。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

朱岳，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广东台山人。第10军第190师师长。

陈永，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浙江青田人。第26军第44师师长。

廖龄奇，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湖南祁阳人。第74军第58师师长。

周庆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山东夏津人。第10军第3师师长。

高魁元，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山东枣庄人。第99军第99师师长。

唐郁伯，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四川南川(现为重庆)人。第78军新编第13师师长。

吴守权，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四川崇庆人。第78军新编第16师师长。

李棠，黄埔军校第14期毕业生，江西信丰人。第37军第140师师长。

孙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第15期将官研究班毕业生，云南陆良人。第58军军长。

傅仲芳，黄埔军校高教班第4期毕业生，浙江萧山人。第99军军长。

王甲本，黄埔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生，云南富源人。第79军第98师师长。

(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一片丹心照湘阴

□ 李宣钊

曹克人(1911-1941)，名泽泉，号养正。出生于湖南桂阳清河乡长乐村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就立志报效祖国。1929年应征到部队当兵，后被保送到黄埔军校第14期学习。1936年毕业于，任陆军99师593团3连上尉连长。

1941年，曹克人调295团任1营少校营长，并奉命率部从贵州开赴湖南省湘阴县，担负县城防守任务。9月底，日军逼近湘阴县城，曹克人率全营官兵在湘阴县城附近的坞塘等地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10月3日凌晨，日军500多人由箭毛嘴、马头山登陆，随着轰炸的飞机向湘阴县御洗沟曹营阵地猛扑过来。曹克人率全营官兵同仇敌忾，奋力抵抗，英勇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曹营长一面指挥反击敌人，一面在原兵房筑碉堡、挖壕沟。他对官兵们说：“人在阵地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敌人踏进一步。”曹营长的身先士卒和沉着冷静使全营官兵深受鼓舞。疯狂的敌人见前进不得，便又施放毒气，发动了多次进攻，妄想一举攻克县城，均被曹营长率众官兵击溃。

日军平野支队长见屡攻不



/ 曹克人画像。



/ 曹克人革命烈士证明书。

克，恼羞成怒，于是增加兵力800多人，于10月4天亮时再一次发动疯狂进攻。曹营长振臂一呼，全营官兵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拼杀，敌人猖狂的进攻又被击退。就在这时，从长沙北退之敌，经袁家铺、文家铺向县城蜂拥而来，敌军的伞兵也空降于县城八甲和曹营主力驻守的北门，气势汹汹地向曹营扑来。曹营腹背受敌，又无援兵，情

况十分危急。但曹营长始终镇定自若地指挥官兵们和敌人奋勇拼杀，子弹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最终，由于寡不敌众，曹营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曹营长身负重伤，由两名士兵扶至一油榨房内。一队日寇冲进油榨房，曹营长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敌人射出了枪膛中的最后几颗子弹，最终为敌人所俘。

曹克人和两名士兵被俘后，日寇首先杀害了两名士兵。敌人知道曹克人是长官，此次攻城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于是对曹克人用尽酷刑。曹克人面不改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痛骂日军是一群强盗，高呼“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凶残的敌人居然用四只大铁钉将曹克人四肢钉在熊家祠堂的墙壁上，剖开他的胸膛，然后灌上煤油将其活活烧死。曹营长牺牲时，年仅30岁。日军退后多日，当地乡民到熊家祠堂，还发现墙壁上曹营长烧死后的油脂印迹，头躯四肢清晰可辨，乡人无不落泪，对这位抗日壮士钦佩不已。

198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曹克人为革命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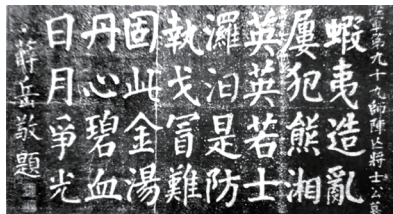
长沙三捷后，第99师派人



/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为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湘阴战场上的阵亡将士造具名册，于1942年9月将阵亡将士的遗骸

合葬于城南平家湾义山，并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俗称白骨塔），以资纪念。曹克人营长以



/ 薛岳的题词。

及牺牲的全营战士也都安息在此。塔基上刻有“丹心悬日月 白骨镇山河”10个大字，四周有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题词“蝦夷造乱，屡犯熊湘，英英若士，罗汨是防，执戈冒难，固此金汤，丹心碧血，日月争光”，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题词“为国捐躯”，99军军长傅仲芳题词“节义凜然”，塔后纪念墙上刻有纪念碑文和阵亡将士名录。

我参加了长沙会战

□ 粟翼航

我原名粟骏，出生于1922年农历五月。上过4年学，后来家贫辍学。13岁时父亲病故，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15岁办私学教农民子弟识字，闲时练拳习武。1939年4月，炭坡里的王竟成介绍我到浏阳县普迹镇参加19师志愿兵团，担任上士文书。但看到部队作风散漫，我不想久留。

1940年元月，通过上马田的杨宗珏介绍，驻扎在湘阴乔口镇

的99师（番号昆山部队）司令部军需处的黄本英科长写介绍信，我被分派到衡阳鸡窝山的师部通讯处任准尉司书兼译电员，处长蓝文博是广东大同人。6个月 后，我被提升为少尉书记官。当时，高魁元师长的太太住在南岳山下陈家园，我接送过她几次。1941年1月，我被调到师部担任警卫员。师长两次与我谈心，教诲我说：“安心工作，切勿心猿

意马，毋效鸚鵡多言。一旦有机，我当任用。”

1941年6月，我调任295团1营3连少尉排长，团长梁凤德、营长曹克人、连长徐展豹。我连驻扎在湘阴铁角嘴，一次训练时，4班班长（山东大汉）要与我比试，对抗中我抓住他的失误，将他摔倒在地，我因此获得士兵们的信任。

9月，日军突破新墙河第二



/ 粟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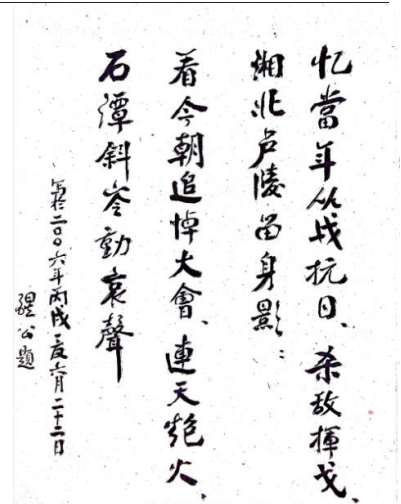
/ 粟翼航(右二)参加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95 周年座谈会。

次进攻长沙，我军奋力抵抗，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10月3日，我师副师长朱志席率3个团赶赴汨罗阻击。梁团长说前两天298团已与日军发生恶战，并命令我连进入阵地。一声冲锋号响，我们全连向对面301高地发起猛攻，但伤亡惨重。我们第7排死6人伤4人，牺牲的士兵中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浙江的翁忠全，四川的左正兴（班长）、周华。日军伤亡也不小，我军还缴获三八式步枪两三支、机枪2挺、步话机1台。师参谋长叶曼来部队视察，夸奖我们打得好。在这次会战中，营长曹克人带两个连坚守湘阴县城，打得日军节节败退。10月4日，日寇增兵800余人猛攻，曹营长身负重伤被俘，仍然大义凛然痛斥日寇。日军恼羞成怒，竟然将他割舌割耳割鼻剜目，钉

在墙上，剖腹烧死。

12月下旬，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我师仍防守岳阳湘阴一线。12月27日，我295团初战白水，转移到芦陵潭西岸坚守。12月30日上午11时，敌军猛攻，我军隔河攻防，徐连长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战斗中，我被一块迫击炮弹的弹片击中头部，昏倒在地，幸于当晚被当地人救起，送到乔口师部军医处救治。至今，我头上仍留有伤疤。后来，297团（团长刘技元）接替我团死守芦陵潭，敌军未能渡过湘江。

1942年6月，师部保送我到黄埔军校学习1年，同时保送的有10人。军校校址在武冈高沙市，副教育长周磐接替李明灏代管学校事务。军校入校时要求每人写自传，我这样写道：寓长沙于花果，素是村童。窃学员命不逢



/ 粟翼航的书法作品。

辰，学业难就。行年十二，吾父已亡。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伶仃孤苦，门户衰微。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突然想起路上看到的标语，又加了一句：头可断，血可流，国不可亡。教员给我打了100分。■

（本文由孟企平摘录整理自2017年粟翼航的回忆录）

南岳衡山祭英魂

□ 聂德芳

南岳忠烈祠于1943年7月7日建成，是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修建的大型烈士陵园，其中包括第二次长沙会战牺牲的部分将士。

南岳忠烈祠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最早修建的一处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位于南岳衡山香炉峰下方，距南岳古镇4公里，于1938年筹建，1940年9月破土动工，1943年7月7日落成，占地230亩。忠烈祠坐北朝南，由祠宇和墓葬两大部分组成，祠依墓建，墓依祠立。祠宇部分包括牌坊、“七·七”纪念碑、纪念堂、安亭战役纪念碑、享堂等建筑。“七·七”纪念碑、安亭战役纪念碑及墓葬区为纯石结构，采用西方建筑手法，其余建筑以木石结构为主，建筑形式为石墙碧瓦、单檐翘角的传统式，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牌坊是三门四柱三楼式的石木结构，正中拱门竖额上镌刻着“南岳忠烈祠”5个字，由原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题写。牌坊内的广场上种植了松柏、含笑，喻示烈士英名永存，含笑九泉。

“七·七”纪念碑位于广场



/ “七·七”纪念碑。



/ 纪念堂。

正中，由5颗直指蓝天的炮弹组成，象征着我国汉、满、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御敌。碑的正前方和东西两侧的青石碑上，用汉白玉石镶嵌着“七·

七”两个字，纪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碑的后面是薛岳将军题写的《“七·七”纪念铭文》：寇犯卢沟，大波轩起，捐躯为国，忠勇将士，正气浩然，



/ 纪念堂。



/ 享堂。

彪炳青史，汉族复兴，永湔国耻。

木质鎏金堂额“纪念堂”3个字是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副主席屈武题写。纪念堂为三开间，正中竖立一块巨碑，碑上刻有薛岳手书的《南岳忠烈纪念堂碑记》，碑记介绍了建祠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东西两间为《南岳与抗战》

陈列展，用大量的图片、文字详细介绍了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两党在这里举办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及四次军事会议等内容。纪念堂后有两道平行纵列石磴，分段而上达276级，气势宏伟，中间草坪用大理石片镶嵌“民族忠烈千古”6个醒目大字。

安亭战役纪念碑是为纪念第19集团军在上海淞沪会战最后一次战役“安亭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修建的。

享堂是祭祀活动的场所，为祠宇建筑，平面呈“十”字形，悬在正中的“忠烈祠”匾额为蒋介石所题。中厅突出部分为讲坛，坛后巨牌竖刻第一、第三、第九三大战区数十次战役中阵亡将士的神位，居中设“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祠内石碑刻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题词及部分阵亡将领（如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等）的英雄事迹。

祠宇周围为墓葬区，共有集体墓葬7座，个人墓葬12座。这些墓葬，都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有的华表相望、墓阙凌空，有的碑碣行列、塔尖入云，令人景仰。目前，忠烈祠公墓区已修复的墓葬：个人墓葬10座，分别是郑作民（黄埔1期生）、孙明瑾（黄埔6期生）、罗启疆、胡越、彭士量（黄埔4期生）、廖龄奇（黄埔4期生）、陈烈浩（黄埔15期生）、陈炳炽、章亮基、赵绍宗墓；集体墓葬3座，为第37军60师、第140师、第74军集体墓，其中最大的一座集体墓葬是第37军60师，葬忠骸2128具。

第37军60师集体墓位于忠烈祠右侧方，1942年7月建成，2013年修复。安葬的是在湖北抗战中收养的2128名阵亡将士的遗

骸。37军60师曾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以及四次长沙会战中与日军浴血奋战。抗战中，该师有万余名官兵为保卫中华民族而壮烈捐躯。

第74军集体墓位于第60师集体墓的上方，也在忠烈祠右侧方，1943年7月建成，1994年按原照片恢复。抗日战争中，74军曾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多次战役，战绩卓著，获得了“抗日铁军”的称号，并被授予飞虎旗。

第140师集体墓位于忠烈祠

左侧方，1943年8月建成，2010年修复。该师参加过晋南战役、鲁南战役和三次长沙会战，殉国的先烈共计5116名，此公墓内仅葬忠骸926具。

南岳忠烈祠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2016年被列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同年9月被列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2019年被列为民革党员教育基地。祠内

先后举办了《南岳与抗战》《抗战英烈生平事迹》《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等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陈列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学生团队、烈士后裔来这里缅怀和祭祀。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等也先后莅祠参观。近几年，忠烈祠成功举办了“勿忘历史·强我中华”大型图片展、“南岳忠烈祠·中华儿女公祭抗战民族忠烈大典”“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万人祭英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公祭民族忠烈大典”“春祭”等一系列纪念活动。

雄碑三捷壮云山

□ 谢雄宇

“三战三捷”摩崖石刻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题写，以纪念三次长沙会战中死难的将士以及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壮举。

巍巍大云山，横亘于湘北岳阳临湘两县（市）之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赣北、鄂南、湘北方面四犯长沙，大云山扼湘北之咽喉，自然是硝烟激烈，攻守争锋之地。长沙三次会战结束后，大云山留下了一座永久的抗日雄



/ 杨森的“三战三捷”。

碑——“三战三捷”摩崖石刻，记录着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外侵、保卫国土的英勇顽强，抒发着

对我广大爱国官兵不屈不降的敬仰和对死难将士的缅怀。80多年来，她饱经风雨，向世人诉说

着中日双方军队殊死交战的悲惨壮烈。

杨森题壁，抗倭三捷树丰碑

1942年8月，杨森由时任临湘县县长、第七游击挺进纵队司令的王翦波陪同上大云山检查军事布防。他们上至黄梁伞时，抬头凝视隆兴宫外一块大型石壁，回想起三次长沙会战中死难的将士以及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壮举，决定在大云山上刻石纪念。在隆兴宫，王翦波请杨森题碑，杨森欣然题写了“三战三捷”四个大字和65字碑文。其碑文曰：

倭寇侵我中国，在湘北相持五年，中经大举犯长沙三次，赖民众协力，将士用命，都予击溃。国人正精诚团结，矢志澄清，沥石共勉。

杨森题

大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

后来，杨森还派了一名蒋副官同王翦波一同督刻此碑，历时两月而成。整块石壁约178平方米。右边四个大字从右至左横排，每个字高2.15米，宽1.81米。左边碑文从右至左竖排，占碑体一半面积。当时，杨森属下的第20军第133师师长夏炯，亲历了三次长沙会战，感怀“民众协力，将士用命”，也亲笔题写了



杨森题的碑文。

“三捷泉源”4个大字，镌刻在三捷碑东下侧20米处石壁上，约占60平方米。抗战胜利后，王翦波还筹谋将隆兴宫改为忠烈祠，入祭所有三次会战中死难的将士，可惜因内战致此举未竟。王翦波树立了一块“大云山抗战胜利纪念碑”记录临湘民众抗日守土之史迹。

题迹重辉，抗战雄碑膺国保

大云山“三战三捷”抗战摩崖石刻，经历80多年而保存完好，有赖于将领后裔的努力和大云山公园的有效保护。笔者作为湖湘文化与抗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为此做了大量的查访、宣传工作。1999年9月，杨森的儿子杨新人、女儿杨万运（时任台湾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由岳阳市政协领导陪同上大云山瞻仰三捷碑。杨万运当场确认三捷碑文为杨森亲题墨

宝。杨新人在十届全国人大会上提交了在湖南大云山修建抗战纪念馆的建议案，并先后为其题辞“湘北大捷励后人”“抗倭功巨，爱国志坚”。

2010年4月，原国民政府37军60师少将师长黄保德将军的儿子黄开基，原第4军军长欧震的女儿欧楚华来大云山参观并题辞。2002年，在历届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领导以及各方努力下，三捷碑被湖南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由民政部审定并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抗战纪念遗址。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大云山公园已制定大云山三捷碑的保护和建设规划并启动实施。■

名山处处埋忠骨 烈士英名万古传

□ 孟企平

岳麓山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一直是守卫长沙的战略要地，为此留下了许多抗战遗址，第二次长沙会战也在此留下了部分遗迹。

岳麓山是风光秀丽的南岳衡山72峰最后一峰，山上有古麓山寺、云麓宫、爱晚亭，辛亥革命先驱黄兴墓、蔡锷墓，山下有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四季树木成荫，秋天层林尽染，近看橘子洲头，远眺长沙古城，是AAAAA级国家风景名胜区。岳麓山虽然海拔只有300米，但与湖南省会长沙城隔江相望，是守卫长沙的战略要地，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留下了许多抗战遗址。其中，与第二次长沙会战有关的主要有：第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第九战区战时指挥所、炮兵阵地。

1946年，由时任73军军长韩浚主持修建的第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是岳麓山规模最大的抗战纪念建筑。公墓由墓碑、石阶墓道、忠义观和墓庐组成，全部采用花岗岩石材建造。两级墓基上的墓碑方柱平顶，高10余米，正面刻首任军长王东原题字“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面碑词“精神不



/ 第73军公墓。

死”。碑阴及两侧分别刊“凛冽万古”“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名山忠骨万古长存”。墓室内原存放有历次长沙会战牺牲的官兵骨灰坛。正中的门洞上额题名“忠义观”，两侧对联：忠昭大麓，义塞苍冥。

离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不远处有后来建的77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刊有近年在原址土堆中发掘的抗日阵亡烈士名录石碑，刻有姓名680余人，官兵约各占

一半。

第九战区战时临时指挥所位于半山腰爱晚亭后清风峡的一个山洞里。周围树木参天，地形隐蔽，难以发现。第一次到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每当日军逼近及敌机临空时，薛岳即带领司令部人员进入山洞指挥作战。曾经担任战区司令部文书的姜立诚回忆：“山洞深20多米，用小型柴油发电机发电用于照明及电台联络。薛岳根据山头观察哨和电话报告

的敌情，召开作战会议，下达命令，指挥作战。”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之前，才根据统帅部命令将指挥所撤至湖南耒阳。

岳麓山顶的炮兵阵地，据炮兵学院专家现场考察，其选址极佳，既可以展开火力覆盖全城，又有利隐蔽避免被敌人发现。当时的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为资深少将旅长，麾下有6个编制与装备都残缺不全的炮兵团，实际配备的只有2门德造150口径榴弹炮、4门山炮、2门俄国老式野炮，这8门炮中有1门俄造野炮因连续发射温度太高而炸膛，能用的只剩下7门。但炮兵们在战前就对长沙城内各个目标进行了精准测量，绘制了详细的坐标图，开战时可以指哪打哪，弹无虚发，有力支援了步兵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攻进长沙城，岳麓山上的炮兵向日军据点猛烈炮击，为最后日军退出长沙，遭到中国军队的追击而狼狈北撤立下功劳。特别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根据情报，敌军在城北的湘雅医院召开联队军官会议，岳麓山上的炮兵接到命令，对准坐标准确射击，先向前门和后门开炮，待敌军官们群集到院内，再瞄准院内密集射击予以歼灭。而在城南杏花园、修械所一带，中日两军



/ 第九战区战时指挥所。




/ 炮兵阵地遗址。

反复拉锯作战，炮兵奉命开火，炮弹像长了眼睛一般落到日军盘踞的修械所，日军死伤甚众，仓皇退走。

岳麓山炮台也因此成为日军恨之入骨的眼中钉，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扫射。炮兵们在枪林弹雨和熊熊大火中舍命保护大炮坚持战斗，许多官兵牺牲在阵地或因烧伤不治献出宝贵生命。

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因为日军改变战术，强攻岳麓山，我军调动守备不及，炮兵阵地被日军占领，日军借此向我城内守军开炮射击，长沙最终失守。

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都有大批民众自觉登山祭扫抗战烈士墓，许多外地游客来到长沙也会把抗战遗址和纪念地作为必到景点。

赓续黄埔精神 共话祖国统一

——在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同学亲属“中秋寄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辛亥革命 110 周年。在辛丑年中秋国庆来临之际，黄埔军校同学会在京举办“中秋寄语”活动，邀请部分在京黄埔理事、同学、亲属围绕共圆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主题，以通讯方式书写“中秋寄语”，共度中秋佳节，表达黄埔同学和亲属后代共盼两岸团圆、共祝祖国

统一、共襄民族复兴的心声。林上元会长在书面致辞中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结和传统。此刻，我们以中秋寄语的方式，表达对台湾黄埔亲友和同胞的思念，表达不忘先辈初心，牢记自身使命，期盼祖国统一的信念、信心和决心。陈知庶、周秉德、胡葆琳、李霁君、许进、陈昊苏、徐小岩、郭庶

英、卫智等 70 余名理事同学亲属参加活动并结合各自经历纷纷寄语两岸同学同胞，表达思念之情和美好祝愿。大家共同呼吁海内外黄埔师生、亲属后代，牢记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重托，为两岸和平、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继续努力奋斗。现将部分寄语摘录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 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导、理事 🚩

林上元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两岸是我们共同家园，两岸利益我们共同捍卫，两岸未来我们共同开创。

陈知庶 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昔日国共合作，携手创建黄埔，扫荡群藩，东征北伐御外侮；今日海峡两岸，弘扬黄埔精神，反“独”促统，共圆中华强国梦。

周秉德（女）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协调两岸多筹措，千方百计费周折。
待到神州团圆日，不忘举头告先翁。

胡葆琳（女）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缅怀先烈革命志，传承父辈爱国情。
天下黄埔是一家，同盼民族大复兴。

李霁君（女）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两岸秋潮伴月生，黄埔浩气千古情。
传承前辈爱国志，民族复兴业竟成！

许进 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中秋，是海内外华人合家团聚的节日。
爱国，是世代黄埔人信奉的精神。
我们要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让中秋的月亮更圆更亮。

🚩 黄埔亲属 🚩

陈昊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共产党委员会书记陈毅之子

奋斗牺牲铁血红，振兴伟业看英雄。
繁花两树夸黄埔，一统江山大道同。

徐小岩 原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将，黄埔军校1期生徐向前之子

辛丑祭月情，黄埔百年迎。
实现前贤愿，我辈须奋行。

罗箭 原总装备部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黄埔军校6期生罗瑞卿之子

每逢佳节倍思亲，两岸同胞本同根。
待到一统大业成，家祭勿忘告先翁！

汪纪戎（女）农工党中央原专职副主席、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原理事长，黄埔军校13期生汪家龙之女

月圆年年相似，你我岁岁相盼。
黄埔后人携手，共促家国团圆。

陈正烈 火箭军某基地原副总工程师、少将，黄埔军校4期生陈毅安之孙

辛丑中秋抒怀
皓月清华九州同，两岸同胞梦一统。
中华振兴先辈志，黄埔后昆践始终。

郭庶英（女）郭沫若纪念馆特邀研究员，黄埔军校教官郭沫若之女

一年一度中秋日，佳节盛思黄埔情。
抗击新冠共赏月，期伴同品月饼甜。

张素和（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原高级工程师，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之侄女

思盼——双节有感

时政 · 黄埔之声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佳节到，举国齐欢乐逍遥。思盼两岸相聚八十余载，共同富裕的福音何时到！

陈寒枫 全国人大华侨委研究室原主任，黄埔军校4期生洪水之子

黄埔建校近百年，北伐抗日掀狂澜。
先辈牺牲做贡献，中华面貌换新颜。
万众齐整旧河山，黄埔精神割不断。
统一大任担在肩，坚定步伐更矫健。

陈崇北 北京京华国瑞投资公司董事长，黄埔军校教官陈奇涵之子

历史现实与未来，黄埔情怀永相传，
黄埔声音不能断，为两岸一统鼓与呼。

郭平英（女） 郭沫若纪念馆原馆长，黄埔军校教官郭沫若之女

同临一片海，共望一婵娟。
海浪抚两岸，醇酒暖心田。
家国欣向荣，慰藉诸先贤。
辛亥百十载，黄埔情更添。

郑苏伊（女）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办公室原主任，黄埔军校5期生臧克家之女

明月清辉洒人间，中华大地不夜天。
期盼两岸早团圆，神州万里共婵娟。

黄慧南（女） 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原副主席，黄埔军校1期生黄维之女

中秋月儿明，两岸黄埔情。
佳节盼统一，千里共婵娟。

覃珊（女）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市场策划总监，黄埔军校2期生覃异之之女

中秋月圆照两岸，把酒举头杯中满。
佳节更添相思苦，华夏儿女盼团圆。

李志仁 光大置业公司监事会原主席、党委副书记，黄埔军校4期生李运昌之子

传承黄埔军魂，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铸辉煌。

文定中 阿文餐饮集团董事长，黄埔军校4期生文强之子

明月同沐两岸人，举头悦目嫦娥倩。
祖辈披肝除倭寇，吾侪不输爱国情。

熊蕾（女） 新华社原高级编辑，黄埔军校15期生熊向晖之女

明月照海峡，两岸是一家。
神州团圆日，遍开自由花。

李明（女） 首都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黄埔军校1期生李树森之外孙女

皓月皎洁，吾心思念。两岸同胞，早日团圆。

卫智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副总经理，黄埔军校教官卫立煌之孙

抗战文化，两岸薪传。

田林芝（女） SINOWIND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战干团1期生田向前之女

百载黄埔讲武堂，千人报国寄心香。
农桑乐岁万家足，桃李春风新茂芳。

程海燕(女) 黄埔军校5期生程子华之女
海峡两岸,同种同族,共庆中秋,早日团圆。

李逸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埔军校6期生
李希纯之子

血战淞沪,生死太行。抗战御倭,黄埔名章。
魂牵梦萦,桑梓遥望。海峡阻隔,水天苍茫。终
老板桥,暂厝异方。企盼统一,驾鹤归乡。

彭幼明(女) 黄埔军校1期生彭明治之女
中秋月正圆,两岸共婵娟。
千里遥相望,统一早实现。

贾丽丽(女) 黄埔军校10期生贾克之女
缅怀先烈,遥举美酒,前赴后继。唱响青春,
芳华永存!

倪齐生 解放军出版社原编辑,黄埔军校4期
生倪志亮之子

昨日黄埔变红埔,英勇奋战创新天。
今秋黄埔后人聚,两岸情深盼统一。

郑新(女) 原总政歌舞团演员,黄埔军校17
期生郑赞章之女

月下良宵(歌词)

中秋月,荡银辉,眺望大海,念亲人,念亲
人。云是这般轻,月是这般美。茶呀茶是这般香,
酒呀酒是这般醇。月缺总有月圆时,隔海倍知骨肉
亲。旦等亲人来团圆哪,畅怀痛饮醉几回。

中秋月,泼银辉,眺望大海,念亲人,念亲
人。意是这般浓,情是这般真。金呀金杯擎在手,
美呀美酒沁心肺。皓皓月下度良宵,望断天涯盼归

人。旦等海峡架金桥啊,久别的亲人喜相会,久
别的亲人哪,喜相会。

恽代英后人

中秋忆先辈有感

两岸一统黄埔情,斗转星移盼乾坤。
莫道征战非常时,且看中华正复兴。

潘启强 民革原北京市崇文区委副主委,黄
埔军校1期生宋希濂之外孙

辛丑中秋感怀

两岸黄埔情,一曲中华梦。
国共携手时,复兴待日知。


林际平 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
黄埔军校18期生林上元之子

天下黄埔一家亲,两岸同胞骨连筋。
中秋佳节月当圆,江山一统倍思情。

陈云娜(女) 知行车谷(北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埔军校教官陈奇涵之孙女

祖辈执鞭军校讲堂,
父辈续写两岸情长。
青春如我百炼成钢,
黄埔精神代代守望。

霍励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北京分院院长,
黄埔军校23期生尹铭铮之外孙

月圆人团圆,佳节盼团圆。作为黄埔后代,在祖
国和平统一大业工作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在
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发扬黄埔精神,共圆中国
梦! 

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与黄埔军校

——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

□ 乔茵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这是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孙中山诞辰155周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盛世华诞，倍感振奋。我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历70年沧桑，把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蓝图一点点、一步步变成现实。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倡导民主共和思想，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不朽功勋。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为改造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此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回顾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是对辛亥革命最有意义的纪念。

孙中山先生既是革命的理论

家，也是革命的实践家。三民主义，理论精深，国共合作时期，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理论实践，体现了孙中山先生不断自我修正和与时俱进的可贵精神。孙中山先生在构建革命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革命实践，为实现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懈努力，寻找出路。从成立兴中会，到发展中国同盟会，到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从屡次失败的残酷现实中痛定思痛，走上建立军校、培养革命军的道路。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创办了第一所具有现代革命意义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此前一系列革命实践经验教训总结后的又一次伟大实践。首批黄埔军校学生聆听孙中山的教诲，传承至今的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遗产。黄埔军校成立至今已届97周年，黄埔军校及其灵魂——黄埔精神，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引为骄傲的宝贵遗产，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

13年武装实践的失败是建立军

校、培养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动因

孙中山革命的一生，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武昌首义前，以武装暴动推翻满清统治的民主革命实践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次年2月，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起义前夕消息泄露，导致起义流产，孙中山避走日本。之后16年间的十多次武装起义，均因斗争经验不足、军事力量悬殊等原因，以失败告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武装暴动建立民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二、第二阶段：武昌首义后，以保卫民国胜利果实为核心的军事革命实践阶段

武昌首义成功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3年袁世凯复辟，发动反革命内

战。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先后围绕积极反袁的护国运动，和反对军阀统治的两次护法运动为主进行。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幻想借助西南军阀的力量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结果失败，让孙中山彻底认清了军阀的实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三、陈炯明叛乱彻底打破孙中山依靠地方势力推进革命的幻想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被迫退避上海。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旧军队都是不可靠的，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革命事业难以成功，若想革命成功必须有“明了党义之军队，方能服从本党之指挥，尤必须有信仰党义之干部，方能造成革命之武力”。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旧军队，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辛亥革命前，为推翻清朝统治，在手无军队的情况下，孙中山的军事实践主要是依靠外力，要么依靠会党或华侨的力量，要么依赖在新军的思想工作。辛亥革命后，更多的是依靠地方派系的力量。这种手无军队，过度依靠地方派系的做法，始终潜藏危机。地方派系自身诉求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有诸多背离，给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带来诸多隐患。这种终极目标上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随时都会酿成大祸。

这就是孙中山革命实践遭遇失败的直接原因。

建立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军事革命实践的必然选择

一、统一广东奠定统一全国的基础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把自己的大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同时也将暂时拥有的军队交了出去，这是创建黄埔军校前，孙中山建立一支可以掌控的军事力量的唯一机会。尽管孙中山让出了总统的位置，自己退居实业救国战线，但他没有放弃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武装暴动、革命救国的想法。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不断地调整军事斗争的策略，形成和发展了坚持武装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北伐统一全国等战略思想。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统一广东是统一全国的基础。1923年初，孙中山策动滇、桂军驱逐了陈炯明叛军。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3月，建立了名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就任大元帅，恢复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二、新三民主义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国民革命新局面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不断遭遇挫折，他深刻感受到拥有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的重要性。经历多次

武装斗争的失败后，晚年的孙中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对自己往昔斗争的失败作了深刻反省，从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对革命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下令在广州黄埔长洲岛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三、黄埔军校是应时代发展之呼唤而生

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新估量，对苏联红军军事院校、军事制度的主动学习，改组国民党等一系列大动作，为掀起国民革命的新高潮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组织基础。而作为在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组织建设之后的必然结果，是整个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需求，无论是中国革命，

还是中国现代化，抑或是整个中国的转型，都需要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其革命实践的必然。

从1895年2月广州起义到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立，正值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30年。近30年的革命军事实践让孙中山深刻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政权、政党与军队互为犄角，缺一不可的重要性。

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创建黄埔军校

经过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利用军阀三个阶段，孙中山军队建设思想逐渐成熟，对武装斗争方式的认识不断加深，到其晚年终于认识到借他人力量终不可靠，要建设新国家，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

一、建军校的目的就是建立革命军，建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统一中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开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黄埔军校是在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认真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而创办的。尽管向苏联红军直接

学习了一系列比较进步的建军方针和原则，但军队的灵魂、军人的培养等核心构想均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筹建国民军的规划中就强调，对三民主义持“矢志不渝，有始有终”的坚定信念，是参加国民革命的起码的和第一条件。他还强调，革命军必须具有全军一致信仰、追求的主义。所谓“主义”既是指进步的社会理想和学说，又特指三民主义。

二、军队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机制，与中国旧式军队本质不同

有无主义是革命军队与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有主义的军队是为民族、国家而打仗的正义之师，没有主义的军队只能是被金钱、权势所驱使的雇佣，是暴力工具。

黄埔军校的机构设置与中国旧式军队的不同体现在，军队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机制，以确保军队的革命性，确保所教育出来的军人能为国民革命、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目标奋勇牺牲。通过党代表制度，保证党的主义、方针得到贯彻执行，防止革命军队蜕变成个人独裁专制的工具。通过政治教育，增强黄埔学生军的战斗力和为主义奋斗的自觉性。军校除开设政治课程之外，还特邀校

外名人来校作专题演讲，通过讨论会、演讲会、报刊、学生社团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形成了“军政并重”的教育特色。

三、黄埔军校成绩斐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在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埔1期师生为例，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国共两党黄埔师生在平定商团叛乱、消灭滇桂军阀，东征、北伐历次战斗中，展现了与旧军队迥然不同的面貌，所向披靡，战功赫赫。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埔师生再度携手，并肩作战，无役不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集体功绩被载入史册。黄埔军校的革命教育、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支撑所有黄埔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遗产

一、打造出了一所具有革命精神的军校，培养出一支国民革命军

孙中山一手创办的黄埔军校，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革命意义的军事学校。孙中山对第1期生寄托了厚望和期待，通过第1期生践行并实施他的军事构想

和建军路线。他对于黄埔军校第1期生的谆谆教诲，他的建军思想及对革命军的要求，在黄埔军校代代传承。

实践证明，孙中山打造出了一所具有革命精神的军校，军校又培养出一支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在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中，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黄埔军校的学生，虽然入学时间并不长，但得益于黄埔军校的训练和熏陶，在战场上表现得无比英勇顽强，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在一代代黄埔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升华。

二、对中国共产党军校、军队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宝贵的革命实践经验

1921年，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参与了黄埔军校的酝酿和筹备，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促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谈，会谈中马林提出了创办革命军官学校的建议。1923年，中国共产党帮助“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以俄为师，学习创办军校的经验。1924年，中国共产党帮助黄埔军校筹委会招收学生，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多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

革命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抱着挽救国家危亡的理想奔向黄埔。据专家考证，在黄埔前6期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有近千人，对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中山仿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红军的军政制度及建军原则，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机制，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方针不仅铸就了黄埔军人出众的军政素质，也为此后红军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革命实践经验。

三、黄埔军校影响力延伸至全社会，起到推动社会进步作用

在国家动荡、民族衰微、民生凋敝的年代，黄埔军校仿佛一块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胸怀大志的革命青年。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更延伸至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当时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缺少政治规范、纪律严明的组织，黄

埔军校在国家分裂、民族危亡的时刻，被时代推动着担起了重任。军校师生胸怀革命理想，勇立时代潮头，其崭新的精神风貌、为国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为社会各阶层民众树立了榜样，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

重温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推动祖国统一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习近平主席指出：“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确保国家完整不被分裂，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意志，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应该学习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突破局限、不断革新的优秀品质。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精神财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

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感言与反思

□ 郑旗生(台湾)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战后日本逼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自主，默许朝鲜由日本宰制；割让奉天南部及台湾澎湖；赔款二万万两，分七年付毕；另订商约，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日军占领威海卫三年，以待赔款交清和商约批准，且占领军费五十万两并归中国负担；等等。此后，日本不仅仅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且最为凶狠。其后，日本还与俄国缔结密约，共同侵略东北。《马关条约》割让台澎，造成二战后，台湾问题成为国家统一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道难关，美日持续运用台湾战略地位，而台湾竟成为棋子，殊可喟叹。

综观19世纪末，中国历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严重挫败，国人皆有时政日非、必须改革之感。康有为等进京赴试的举人上书清廷，希望光绪帝下罪己诏、即行迁都，以与日本决一死战。但清廷官员不此之图，反与慈禧发动政变，维新者多成亡命，光绪帝也失去自由。当时许多热血青年参与各地革命组织，除孙中山在广东及海外组织的兴中会外，东南各地的会党也组成共进会，另有浙江光复会、湖南华兴会、湖北日知会等。这些组织汇成历史洪流，终于迸发成辛亥革命。从历史发展轨迹看，任何大规模政治变动都会伴随几十年阨阻不安。秦始皇统一，虽结束战国以来长期混乱，但十余年而亡。汉高祖建国后，仍有白登之围与吕后用权，直到文帝继位，政局才稍安定，成就文景之治。依此，民国肇建，前后50年动乱尚属历史常态。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重新发现自我”，并在学习与反思中，找到适合中国永续发展的途

径。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不断实验各种政治主张，逐渐理解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适合当时国情，学习西方必须有所取舍，而“发扬固有文化”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最大共识。孙中山推行三民主义时，虽“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也未曾舍弃中国文化，甚至将许多中国传统融入其政治理念。辛亥革命以后，三民主义成为重要的思想指导与学校教育内容，但有许多调整：“驱逐鞑虏”改为“五族共和”；政治组织仍以官僚体系为主。“三民主义”最重要的议题聚焦于“民生主义”，这又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圭臬《礼运大同篇》所揭示的世界大同若合符节。《礼运大同篇》包含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的完整理念，是传统中国的价值核心，对“均”极为重视。这种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将经济活动建立于掠夺、自利基础的核心价值差异甚大。近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基础，反倒是社会主义更适合国情，这正是民初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倾向的两个重要因素。三民主义的思想系统集中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目标是“国计优裕，民生乐利”。这种将国计与民生结合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成了日后几个世代的共识，“国父遗教”思想已经顺应中国传统思想，符合时代潮流，而且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主张的部分理论或因思虑不周，或因仓促推出，未必周密，必须修正，但经过百年来的实证，菁英分子不断添加证明其能符合当代中国所需。庆祝辛亥百十年之际，正可以回顾辛亥以来种种思潮的发展过程，仍可为后世指示明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成效有目共睹，为政者则明确指出“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后疫情时代增强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 意愿的思考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黄信瑜(台湾)

海峡两岸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青年是民族与时代的希望，更是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虽然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正处在艰难复杂、诡谲多变之际，但却有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选择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西进祖国大陆以谋求更好的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岛内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广大台青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大陆也

积极创造更多优化的政策措施、资源平台与便利条件，让更多的台青能抓住大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机遇，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藉由吸引更多的台青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也能影响和带动岛内广大台青对大陆真实发展现状的了解和增强赴大陆就业的意愿，深化两岸经济社会紧密融合。

一、大陆的惠台政策与同等待遇措施强化台青赴大陆的发展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两岸一家亲”理念引领下，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两岸青年在学习、就业、创业及交流活动等方面，提供更多机遇、创造更好条件。应当承认，大陆近年来出台的各项惠台政策与同等待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积极克服两岸关系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努力为台胞创造更加实在的利益和福祉，同时也强化了广大台青到大陆工作发展的意

这种发展方向与三民主义的民生与民本概念相应，也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重要精神，更是辛亥革命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可贵之处。

今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年，两岸同胞除缅怀先烈牺牲奉献精神，更必须把眼光投向现在与未来。当前，中国大陆正逐步迈向国富民强境界，尤其成功解决贫富差异，蔚为奇观。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主席曾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革命继承者，我们继承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大家仍记得中山先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山先生口中的同志散布于海内外，尤其提醒台海两岸同胞，同志必须捐弃成见，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共中央从毛泽东时期即已推崇孙中

山，认同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理念。中共尤其强调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符合孙中山理想，毛泽东也因此推崇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历史斑斑可考，正是以史为鉴最佳例证。

中山先生毕生从事革命最大心愿就是完成中国统一、复兴民族、恢复中国国际地位。今天两岸有志之士深刻反思，中国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者缺一不可。大陆改革开放后实施社会主义融合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能于近期内适时以国家分配机能导正资本主义偏失，均衡财富分配，这些动能效益即将发挥磁吸效应，对台湾及两岸关系发展必将展现难以想象之影响，这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给两岸中国人最重要启示，台湾民进党当局纵然冒险走“独”，终将徒劳无功。■

愿。根据2018年8月台湾《远见》杂志的“2018西进人才满意度调查”发现，有6成台青想来大陆发展。30至39岁台青是西进大陆主力，其中有五成具有硕博学位，并有高达76.1%的台青会因各项“惠台政策”而强化在大陆工作生活的意愿。

事实上，广大台青到大陆工作生活之后，不仅有助于改变和拓展他们以往仅以岛内为中心思想和视野，认清个人前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也有利于两岸青年积累相互的信任与情感，从而提高台青融入大陆当地社会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以及深化台青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台湾地区大学以上学历者的失业问题及其成因

众所周知，台湾地区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迟滞，导致失业问题严重，广大台青普遍对就业发展前景充满忧虑。此也正如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2017年的《人力运用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造成岛内台青失业问题的首位因素是“没有就业机会”（非自愿性失业者66%），而自愿性失业者（即有工作机会但未就业）则为34%。此外，2018年公布的失业人数统计资料显示，大学以上学历程度的失业者高达近20万人，占总失业人数44.21%（大约

每3位失业者中，就有一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而高居其他学历之冠）。

多年来，台湾地区就业者的平均年所得并无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起始平均月薪仅约为新台币2.5万左右（约为6000多元人民币），导致青年世代落入所谓“青贫族”（青年贫困族群）的处境，而“高失业、低薪资”成为岛内就业市场的普遍现象（若想维持基本生计，就要面临从事“低薪”或“高风险”工作的两难选择），也是最受舆论媒体关注的社会问题。总体而言，台湾各界普遍认为高学历青年失业主要有以下原因：1. 广设大学后导致大学生增多；2. 学校授课与现实脱节（学用落差）；3. 高不成低不就，造成部分自愿性失业。

有鉴于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大陆有关部门应把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与显著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进而提升对台工作的实际效能，让更多台青能参与、分享大陆发展的历史机遇。为此，有关部门实有必要创新思维，科学合理出台因应政策，精准配置有限的“对台资源”，认真对待和协助解决岛内广大台青群体“就业难”的问题。

三、应鼓励和引导长三角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提供台青工作岗位

根据2018年8月台湾《远见》

杂志调查显示，台青西进大陆的6个主要理由为：1. 大陆市场广阔、潜力大，有较大发挥空间与未来成长潜力；2. 依据所在公司的规划需求，配合短暂外派大陆或长期到大陆出差；3. 大陆福利薪酬比台湾优渥；4. 台湾经济前景不如大陆；5. 趁年轻愿意到大陆接受挑战，提升职业生涯竞争力；6. 多年来台湾的薪资停滞不前。另外，在大陆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满意44.6%，普通尚可49.1%，不满意6.3%。由此可知，岛内台青愿意来大陆发展，其中部分主因就是看中大陆的薪资待遇、便利政策、广阔的发展前景及能拓宽人生视野等。

事实上，大陆有关部门也看到了上述岛内台青“失业”及“就业难”的问题现状，近年来更积极出台各种政策予以应对（截至2018年7月底，国台办已授牌设立99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近年来，大陆各地方更是大力宣传和出台政策支持台青创业。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相较于就业而言，创业所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极高，可说是“创业维艰”，这也可从《远见》杂志（2017）的报道得到佐证。调查发现，有6成的台青想来大陆发展，但实际上上来的比例较少。此外，台青到大陆创业面临着五大障碍：1. 信

息障碍；2. 制度障碍；3. 人脉障碍；4. 成本障碍；5. 竞争障碍。再者，《远见》杂志（2018）也进一步揭示：有超过8成的台青创业者并未得到预期的资金补助，以及最令他们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大陆法令繁杂及较难申请到补助款。

实践证明，创业项目能否成功落地，更多的是需要经受“市场”无情的竞争考验而非过度依赖“政府”精心的政策扶持。此外，若将有限的对台“政策资源”挹注和惠及“少数”台青“创业者”，则将很难满足现实中更为“广大”台青“就业群体”的迫切需求。长远看，若岛内台青群体先选择来大陆就业，待一段时间过后，在他们了解当地市场需求（接地气），积累了一定经验与实力，并做好充分准备时，或许他们就会找准合适时机自行“理性”创业，而这样成功的几率也会比一开始就选择创业来的高。因此，有关部门实有必要从实际出发，转变理念，勇于打破现有不甚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推出更有利于广大台青“就业”群体的“就业政策”举措。也就是将由“政府主导”+“政府支持”的“创业政策”扶持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引导”+“民营上市公司支持”的“就业政策”合作模式。通过高效的“官民合作”方式（民间力量是自发

表 1: 2019 年台湾地区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人数一览表(单位: 人)

统计	学士		硕士		博士	
	全日制	在职进修	全日制	在职进修	全日制	在职进修
人数	179,033	33,830	38,795	15,551	3,367	1
合计	212,863		54,346		3,368	
占总人数比	79%		20%		1%	

自发的、最可持续的支持动力来源，同时也不挤占政府对台有限资源），鼓励和吸引岛内广大台青到大陆“就业”，帮助他们在大陆实现理想抱负与施展才华。相信他们在工作过后，也会更加审慎客观地评估自身条件，理性地选择继续就业或创业。

（一）台青就业政策的服务对象：有关部门初步可以先选取台湾地区“硕士”毕业生群体作为台青“就业政策”的服务对象（取得大陆硕士学位的台青也可一并纳入）。这是因为台湾硕士毕业生是自1997年岛内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属于较高学历群体代表。他们有别于大学毕业生过多而面临所谓“学历贬值”问题，以及取得博士学位者人数少且大都会选择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较少选择进入民营公司）。所以，选择此部分群体作为今后大陆实施“就业”政策的服务对象，应是较为合适的（如表1）。

（二）台青就业政策的配

合对象：根据《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发展报告》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大陆A股沪深两市共有3558家上市公司，其中民营上市公司2273家（64%）。应当说，民营上市公司已然成为大陆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力量，且其地区分布也与大陆整体区域发展现况是较为相符的（表2）。其中，长三角地区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民营企业 and 现代服务业发展增速最快，是大陆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及综合实力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地及台胞工作、定居的主要聚集地。此外，民营上市公司的薪酬福利较好，并有良好的发展空间，若以此地区为试点，定能吸引岛内广大台青前来求职。

所以，有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就业政策，鼓励和引导民营上市公司提供广大台青工作岗位（初步可以长三角地区的1125

家民营上市公司为试点，之后再根据实践成效适时地予以调整、扩大)。倘若每家公司每年可以提供2个工作岗位，那么每年就可协助解决约2250位台青的就业问题。此举不仅能满足民营上市公司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其社会责任及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贡献的最佳体现(政府部门、公司和台青三赢)。

可以预期，此政策若能顺利实施，不仅让广大台青有更多获得感，同时也将吸引岛内广大媒体的关注，更能对两岸关系发展起到更为良好的正面效应，进而也能让广大台青与大陆的血脉亲缘更好地联结与巩固，日后也能自觉成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智力支撑与动力来源。

为此，具体可行的做法为：

1. 有关部门每年可协助长三角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举办优秀台青人才招聘活动。民营上市公司也可在各自公司网页的人力资源栏目，增设一个长年招聘台青(征才)广告。同时，也可充分利用大陆现有的对台相关网站(公众号)，或在岛内选取民间组织或陆配团体进行相关宣传。

2. 台青在民营上市公司工作，享有同等待遇(如工资、休假、五险一金及职务升迁等)。此外，有关部门或民营上市公司也可通过专项政策，每年(或隔

表 2: 2018 年中国大陆民营上市公司地区分布一览表(单位: 家)

地区统计	华东(长三角)地区	华南地区	华北地区	西南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
数量	1125	575	283	134	81	75
占总数比	49.5%	25.3%	12.5%	5.8%	3.6%	3.3%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自大陆《2018 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发展报告》。

几年)提供在公司工作满几年以上台青一定的补贴经费，让台青用来邀请其岛内好友或同学来大陆相聚、参访所在公司，增强他们到大陆走访了解和工作生活的意愿，从而起到对岛内台青更为明显有效的就业宣传效果(类似于“口碑效应”)。

3. 有关部门应对提供台青工作岗位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民营上市公司，给予税收优惠、表彰和奖励，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其产品或服务(政府用最小的资源投入而实现政策目标最大化的效益产出)。

4. 有关部门应尽快针对各行业服务系统或 APP 平台无法使用“台湾居民居住证”的情况加以解决(如办理银行卡、银行贷款、健康码 APP、手机购买商业保险、在线问卷 APP 及支付宝的人脸识别功能等)。事实上，台胞“居住证”政策实施至今已快3年，但从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该政策具体的实施成效离当初中央设置的目标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些本应提供台胞“同等待遇”

的日常生活便捷服务，却因各单位、业者的系统、平台未能提供台胞证件的“兼容”功能，而造成广大台胞工作生活的不便，同时也明显违反了居住证政策的规定(台胞有权使用“居住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不得拒绝)。

综上所述，有关部门实应积极对台青“就业”政策进行统筹规划，鼓励引导、结合善用民营上市公司现有的丰沛资源，更好地调动广大民间社会力量的积极性，进一步为岛内广大台青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发展平台，形成台青在大陆就业普遍和稳定的发展格局，并使之成为后疫情时代另一股台青赴陆“就业”风潮(同时也能对岛内台青产生“磁吸效应”)。长此以往，不仅有助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也能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外溢效应”更加显现，进而为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推进统一进程，提供源源不绝、积极有益的新生力量。■

(作者为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唤醒台湾华夏魂,共谋和统新论述

□ 许志宏(台湾)

我们家到台湾六代了,是台湾所谓的“本省人”。我在台湾出生成长以及完成所有的教育过程,后来在美国工作了7年,2018年后举家搬迁到大陆工作定居。我是个大中国主义者,从小就非常希望中国早日统一,民族复兴能早日实现(这里特别提一下,在人类过去的五千年之间,中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世界首强。过去百余年来刚好是中国国运的低谷,所以重回高峰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个人对“中国崛起”这个词不是很赞成,中国只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及位阶,所以我们是复兴而不是崛起)。而在台湾、美国、大陆三地的长期生活经验,让我有机会切身感受及理解由台湾视角、西方视角和大陆视角来看待两岸问题。

基于个人长期的观察理解,我总结了造成目前两岸僵局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台湾的统一支持者缺乏论述;第二是台湾百姓的民族认同不足且缺乏自信。我对解决这个僵局的思考就是“唤醒台湾华夏魂,共谋和统新论述”。



/ 许志宏。

先从“和统新论述”谈起

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和平统一论述”和方向。一个明确的论述对凝聚力量以及指导群体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对一个群体来说,一个明确的论述代表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也代表着一个对未来目标的追求。以台湾来说,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随着时代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台湾有过几种主要的路线。从蒋中正时代的“反攻大陆”到蒋经国时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虽和

大陆有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仍以追求国家统一,复兴中华为目标,台湾社会在这个时期也因有明确的方向而团结并稳步发展。但近30年来,台湾社会的主要论述变成“不统、不独、不武”或“维持现状”,这可以理解是应对那个特殊的时空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模糊论述,可为两岸创造一些交流及运作的空间。但是这些都不是一个明确的路线或方向,也由于这个模糊的论述,让“独”派有可乘之机抢占话语权,使得整整一个世代的台湾年轻人失去对自身定位的明确认知。而偷换概念的“台湾本土化运动”更是变本加厉地直接斩断对中国身份的认同,造成今天台湾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诡异状况。因此,集思广益,提出一套情理兼备,且能被台湾百姓理解支持(接地气)的和平统一新论述是当务之急。

然而,要形成一套可被两岸同胞广泛接受的论述除了学术理论之外,关键在于彼此的“民族认同”,大陆这边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普遍

不足，甚至是对“中国”抱有反感。台湾百姓不论在血统上、历史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人，但是，在西方以及“独”派势力的不断“洗脑”之下，让这些在台湾居住的中国人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这确实相当荒谬，但这的确是台湾的现状，非常可悲。我觉得“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不足”是目前两岸困境的关键因素，因此，重新唤醒沉睡在台湾百姓心中的“中国心”及“华夏魂”，应该是两岸融合工作的重中之重。

此外，回顾中华五千年来的历史，分久必合，目前两岸是种过渡状态，我坚信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我对“统一”的理解是这是个长期而动态的工作，包含统一前的各种协商和统一后的治理。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不足不但对于推进统一是巨大阻碍，对统一后的治理更是巨大的隐患。对一个国家而言，国民是否能团结一心是国家盛衰的关键。因此，唤醒台湾民众的“中国心”及“华夏魂”，对统一后整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唤醒台湾百姓的华夏魂”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总结成以下八个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前所说，在“独”派和西方势力的不断洗脑之下，目前台湾百姓的中华民族认同不足且非常缺乏自信。在民族认同上，我们要拨乱反正，“晓之以理”，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言语，破除“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谬误。

血统上，台湾95%以上都是汉人，都是来自大陆。“独”派巧妙地用来台的先后区分台湾人为“本省人”和“外省人”以划分族群进行政治操作。但是，族群分类是个假议题。“本省人”不过是早到台湾几代的“大陆人”，其实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所有汉人都是“外省人”。也就是在血统上，我们都是中国人。

历史上，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满清末年中国国运衰败，在马关条约中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试问若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又如何能割让给日本？而后来对日抗战胜利，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的受降仪式，台湾省正式在国际认证下回归中国。就是从历史上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文化上，两岸同宗同源，不论是哪个时代移居到台湾的“大陆人”，都把其生活方式、习俗制度、文化礼节一并带到台湾，而这些也都很好地被传承

下来。住在台湾的百姓说的是中国话、写的是中国字、过的是中国庆典、拜的是中国神明。也就是在文化及生活上，我们都是中国人。

政治上，目前两岸分离是国共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但严格来说，两岸并未签署正式的停战条约，也就是说，虽然两岸情势缓和而不处于热战状态，但就法理而言，目前仍是属于“中国内战”的状态。也就是两岸目前虽分治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但都属于中国。

虽然“独”派不断利用“话术”将台湾百姓去中国化，但是，要说服在血统上、历史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人的台湾百姓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难度较大，还是要唤醒在血统上、历史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人的台湾百姓的中国魂难度大？我相信答案很明显，只要统派能坚持行动，必定能重新唤醒台湾百姓的中国心。

在“动之以情”上，这里的“情”指的是“情绪及感受”，希望唤醒台湾百姓对台湾成就和自身价值的认同及自信。个人认为，两岸交流的困难一部分原因在于台湾百姓的不自信。这个部分确实较为复杂，但我们以美国为例便可以很好地理解。


过去美国很自信，所以中美的交往很顺利，对双方都有极

大的好处。而现在的美国非常不自信，整天担心被中国超越，只想着如何围堵中国，国内保护主义盛行，“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些其实都是由于不自信而产生的焦虑及自卑，进一步转变而成的攻击性思维，因此导致中美交流困难重重。如同月有阴晴圆缺，国运也有兴衰起伏，清末正是中国国运的谷底，我们花了百余年时间走出谷底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其实，综观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中，中国都是世界首强，因此中国的复兴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都无法阻挡的。反过来说，美国在近代确实拥有无与伦比的国力，在各项建设上也取得惊人的成就，也就是说美国人根本不应该自卑。中国的复兴其实本质上不影响美国是个伟大的文明，相反地，中美都有自己的短板和长处，若能继续交流，互助借鉴，除了有利于中国复兴的速度，也有助于美国的发展。

目前台湾的情况有些类似，但更为复杂。过去台湾经济好，台湾人充满自信，以一种充满余裕的方式和大陆交往。这几年两岸经济情势反转，台湾百姓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大陆时，情绪是矛盾且复杂的。一方面乐见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道路，一方面担心台湾失去影响力，也有担心台湾被大陆并吞等情绪。面对日益强大的大陆，在各种复杂情绪的支配下，保护主义就会兴起。因此“独”派提出的“台湾优先”“台湾本土化”等便能迅速占有市场。然而，“独”派刻意偷换“台湾本土化”的概念，导致许多台湾年轻人的国家民族认同出现了偏差。一般来说，在正常状况下，强调本土化或本地发展是正常现象，某地居民特别关心某地的发展，并以特定的地名称呼自己是常态，例如上海人、杭州人、东京人、纽约人等，然而对乡土的认同并不影响对国家的认同及热爱。但“独”派偷换概念的“台湾本土化”是直接以乡土认同取代国家

认同，导致台湾百姓有种生活于“台湾(国)”的迷思，甚至很多年轻人直接说出“台湾是我的国家”这种离谱的认知。

因此，要破解这种僵局，个人认为要“动之以情”，唤醒台湾的自信。其实，台湾是值得骄傲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取得了国际瞩目的各项成果，在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台湾百姓也助力不少。根本不需要因为大陆的快速发展而觉得相形见绌，因为大陆的发展并不会影响台湾已取得的各项成果，相反的，两岸的融合可以助力台湾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再往上推一个台阶，并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而闭关自守则只会让台湾的众多成果成为历史。两岸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统一而复兴的中国本来就应该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奋斗目标，台湾的百姓不应也不能在这条路上缺席。

让我们一同努力唤醒台湾华夏魂，共谋和统新论述！

(作者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沿着“天路”进西藏，看70年经济民生巨变

□ 李晗雪

沿着318国道进藏，芒康、波密、林芝、拉萨、日喀则……串连起西藏奇绝的美景。许多人说，这是中国“最美国道”。

318国道，起自上海，终点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全程5476千米。其中最早开始修建的，是成都—拉萨线。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历史使命时，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1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在4年多时间里，修起了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公路。

1954年12月，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成为进出西藏的两条“大动脉”，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也创造了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这，是中国修筑的“天路”的组成部分。

今天，从“天路”进西藏，可以看到，和平解放70年来，这片曾经封闭滞后的雪域高原，已经打通了经济民生从无到“全”

的发展血脉。

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消除

曾经，西藏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旧西藏，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封建农奴制下，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 and 人身自由，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恶劣封闭的自然环境，更让生活改善难上加难。

“1951年之前，西藏的社会制度是非常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当时的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也导致西藏的经济基础一直非常薄弱。”藏族学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格桑卓玛谈道。

西藏和平解放后，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现政教分离；废除生产资料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

身自由。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约280多万藏克（约18.67万公顷）。随后，西藏建立起第一个供销社、第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医疗卫生机构。

如果说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制度一步跨千年，近年开展的脱贫攻坚，则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连续5年召开深化对口援藏扶贫工作会议，通过精准施策、精准帮扶，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例如在农牧区，大力发展青稞和牦牛产业，扶持深加工，创新产品供给，扩展产业链。2020年，西藏共有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62家，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57亿元，比2015年末翻了一番。

在有旅游资源的地区，创新升级“藏文化体验游”，打造“最美318线”，推出“冬游西藏”等。截至2020年，西藏农牧民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就业8.6万人（次），年人均增收4300余元。



/ 2020年10月18日,西藏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农牧区脱贫致富家庭的四世同堂合影。贡桑拉姆 摄

传统文化的市场化开发也受到大力扶持,唐卡、塑像及传统手工技艺如纺织、服饰、家居装饰等供需两旺,已形成颇具规模的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农村危房改造、异地搬迁等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工作也在推进。格桑卓玛对曾去调研的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印象很深。嘎措乡海拔5000多米,许多村民因为高寒的气候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甚至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近年,嘎措乡村民在政府组织下向海拔较低处搬迁。其中一个搬迁点就设在海拔3800米左右、有温泉资源的拉萨市羊八井镇。村民们不仅住了新房,还能在家中用上温泉水,村里更设有温泉疗养中心。羊八井离拉萨市中心近,就业机会也多。“民众搬迁后,身体、生活的改善很明显。”格桑卓玛说。

2008年以来,西藏39.97万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告别了破旧的夯土房、石砌房等危房,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全房。截至2020年,西藏在海拔较低、适宜生产生活的地区建成了964个易地扶贫搬迁区(点),26.6万曾居住在藏北高海拔牧区、南部边境地区和藏东横断山区等海拔高条件差、远离腹心市场的地区居民自愿搬迁。全区产业扶贫资金5%用于安置点产业发展,确保每个搬迁户至少“一户一人”就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多数地方生产生活条件一直十分恶劣。在党中央关怀下,边境地区投入逐年增加。截至2020年年底,边境一、二线行政村公路通达通畅,主电网延伸到全部边境乡(镇),实现村村通邮,移动

通信网络全覆盖,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截至2019年年底,西藏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70年来西藏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但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历史性成就,我认为就是消除了绝对贫困,与全国人民一同迈入小康社会。”格桑卓玛说。

产业发展,为美好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是西藏粮食主产区之一,有“藏东粮仓”的美誉。洛隆盛产的青稞是藏族牧民传统主食糌粑主要原料。

过去的传统手工作坊里,青稞仅有做糌粑一个用处,一天产量仅200多斤。2006年,洛隆县成立了洛宗特色产品开发公司。公司成立后,随着流水线的引入,糌粑日产量达到5000—8000斤;公司还开发出青稞挂面、青稞糕点等特色产品50多种,销往全国各地。洛宗特色产品开发公司总经理泽仁顿珠告诉媒体记者,目前公司有员工45名,其中38名曾是本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年收入可达近4万元。

拉萨哲蚌寺附近,西藏美术馆正在建设中。而其建筑基础,正是昔日的拉萨水泥厂。

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

的工业企业，仅有一些传统家庭作坊式的民族手工业。民主改革后，西藏先后建成了电力、煤炭、机械修理、化工、建材等80个中小型工厂。而1960年建立的拉萨水泥厂，为新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当时，拉萨水泥厂和拉萨皮革厂、林芝毛纺厂、西藏火柴厂，共同形成了新西藏工业文明的象征。

不过，西藏由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遵循传统工业化模式。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因此，服务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则在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目标下适度、绿色发展。拉萨水泥厂，正是因工艺技术老旧退出历史舞台，并即将重生为西藏美术馆。这是西藏工业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见证之一。

70年间，西藏形成了以优势矿产业、民族手工业、藏药业、农畜产品加工业、高原特色生物和绿色食(饮)品业、水电能源等工业为主、富有西藏特点的工业生产体系。而旅游文化、高原生物、绿色工业、清洁能源、现代服务、高新数字、边贸物流7大产业，成为西藏经济发展主引擎。“十三五”期间，7大产业实现增加值超1900亿元。

5月发布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介绍，西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65年的2.64

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3.5亿元。2020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仍达9.6%，居全国首位。市县乡村四级电商服务全面推开，网络零售额累计突破200亿元。高新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突破330亿元。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西藏的产业发展为西藏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天路”，已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

今天，许多西藏旅行攻略分享着骑行、自驾、火车和飞机进藏的不同体验。而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形容西藏的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解放前，从青海西宁或四川雅安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格桑卓玛说，青藏铁路修通前，还有句玩笑话，出国容易进藏难。

玩笑背后的严峻事实却是，原始封闭的交通极大限制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严重阻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把铁路修到西藏去！近代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在和平解放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西藏人民庄严兑现的承诺。

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青藏铁路列入国家铁路建设议程之

内。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盐湖、大风、干旱……其中面临的困难几乎都是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许多工人、铁道官兵、科技工作者为修筑青藏线而长眠高原。经过多年攻关，2006年7月1日，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藏自此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一首《天路》，让全体中华儿女铭记了这份震惊世界的传奇与感动。

今天，“天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而是由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织起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1965年，北京—成都—拉萨民用航线正式通航，西藏迎来空中交通新天路。几十年间，拉萨贡嘎、昌都邦达、林芝米林、日喀则和平、阿里昆莎5座机场渐次建成，国际国内航线达到140条，通航城市66个。西藏建制村已村村通公路，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88万公里。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已建成通车，川藏铁路正开工建设。所有行政村都有移动信号，光纤宽带通达率99%。2020年，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西藏实现主电网全区覆盖。

一条条公路、铁路、航线，将机械和商品送进西藏，将活力和繁荣送进西藏，也给雪域的物产和人才带来了更开阔的远方。

西藏金塔建设集团，从2004年仅5人的小型农牧民施工队，成长为今天注册资本约6亿的大型民营企业，其成长可谓随西藏经济民生变革而起，也推动着这一变革。金塔集团参与了西藏许多公路桥梁的修建，但集团董事长扎塔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修建自己家乡日星乡到日喀则的通乡油路。“心情特别激动，从没想到老家有一天还能通柏油路。”扎塔或许也未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经常往返于西藏和全国各地的杰出企业家。

2016年年底，林芝市墨脱县门巴族村民拉杰在京东商城购买的冰箱送到了家。“冰箱虽不是稀罕东西，但以前不管哪家网站，大件货品都不送墨脱。”2020年11月，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民众，也首次收到了快递包裹。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西藏家用电器整体下单金额同比2017年增长359%，品类数量增加60%。并且，若是身在拉萨，许多商品，京东物流已做到当日达、次日达。

今天，山不再高，路不再远。

来西藏，看看今天的美好生活

如今来到西藏乡村，会看到自然风光绮丽依旧，人居环境整洁。购物、上学、旅游、去外地工作发展，都已不是难事。



/ 2021年6月25日，川藏铁路拉林段（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也是复兴号动车组首次开进西藏。民众在拉萨火车站复兴号车头前拍照留念。江飞波摄

扎塔回忆，小时候，日星乡的土坯房不通自来水也不通电。夏天出去放牛放羊可以顺便在河里洗个澡，“冬天就谈不上洗澡了”。为了节省点灯的酥油，家里经常早早就吃晚饭。半年或一年，人们会坐着拖拉机去江孜县、日喀则市购置物品。而现在，日星乡的房屋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楼为主，家家通水通电，家家有小轿车或摩托车，“天天都可以去逛日喀则”。“现在农村很舒服的。”扎塔说。这些年来，金塔集团参与了不少乡村“厕所革命”、庭院改造、污水纳管、垃圾分类、人畜分离等建设项目。

来到拉萨这样的西藏城市，大概更让第一次到西藏的人吃惊：城市道路上车水马龙，道路两边是居民小区、街心花园、共享电动车、来自世界各地的餐饮美食、电子产品旗舰店、大型商场……超市中果蔬品类丰富、日

用杂货选择多样，甚至有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星级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周到服务和24小时热水。绛红或雪白的砖墙下，转经的人群仍在缓步虔诚念诵经文，布达拉宫和诸寺庙依然宁静庄严。但偶一仰头，又能看见飞机划过苍穹，今天西藏与世界又有怎样的往来呢？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在西藏融合出独特的迷人气质。不经意发现的藏装摄影工作室、设计师首饰店和小酒馆，则为西藏城市更增一分国际化艺术气息。很难想象，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西藏还仅有一座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这里的城市面貌已与中国其他省份城市不相上下。

70年，西藏的变化伟大壮阔，却也具体细腻。或许，感受巨变的最好方式，就是即刻背上背包，沿着“天路”进西藏走一走。■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1年8—9月

□ 吴亚明

8月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美国防部安全合作局4日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7.5亿美元的武器计划。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中方敦促美方重信守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反制措施。

台湾7月对大陆出口同比增长逾两成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9日公布数据显示，受电子零部件出货畅旺影响，台湾7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155.8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占台湾总出口的41%。大陆持续位列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

外交部发言人10日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国台办：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有台媒报道，台美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了海巡联合演练，但台相关部门称并非事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了相关报道。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玩火，必将自食恶果。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涉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案答记者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日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涉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案答记者问。她说：“我们敦促美国国会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中国驻美大使就台湾问题明确向美方阐述中方立场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12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舍曼明确阐述了中方立场。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启动，参选人谈两岸关系受关注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12日、13日办理参选人领表，卓伯源、江启臣、朱立伦、张亚中4人12日完成了这一程序。近日，多位参选人分别谈及两岸关系，受到关注。

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创3月以来新高

民进党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16日公布，截至2021年7月底，台湾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含可转让定期存单）为2420.05亿元，较上月增长7.68亿元，为3月以来新高。

断崖式暴跌：台湾观光产业变“惨业”

台湾新冠疫情5月本土大暴发，三级警戒持续两个多月，对旅游观光产业造成重创。台观光部门统计，6月境内各大游憩据点游客数同比大减84.5%，多数县市衰退超过90%，金门、马祖游客人数更挂零。疫情使台湾观光产业变“惨业”。

国台办：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计划与台湾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安全对话”。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0日应询表示，日本政府和有关人士一段时间来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系列错误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立即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一切涉台错误言行。民进党当局妄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台湾“高端”疫苗安全性持续引发质疑

台湾自产“高端”疫苗8月23日开打以来，短短3天已有4人在接种后死亡。这一得到民进党当局大力“护航”却一直争议缠身的新冠疫苗，究竟是否安全，再次引发岛内舆论的质疑与批评。

9月

上海启动12岁至17岁在沪港澳台同胞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上海市于1日启动12岁至17岁在沪港澳台同胞新冠疫苗登记

预约接种。

上海复星医药供应台湾地区首批复必泰疫苗在卢森堡启运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第一批93.2万剂 mRNA 新冠疫苗复必泰，北京时间9月1日下午在卢森堡机场启运，9月2日早上运达台北。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议会外委会涉台报告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驻欧盟使团1日表示，强烈反对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当天通过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认为该报告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国台办：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民进党当局拉拢美日等国人员举办所谓安全对话，就台海局势大放厥词。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日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两岸书画交流展在京举行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两岸书画交流展3日亮相北京台湾会馆，共展出300余幅两岸艺术家创作的书画作品。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企图在国际上离间生事是不自量力

有媒体报道，洪都拉斯总统竞选人称若胜选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民进党当局借此对大陆污蔑攻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7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政治本性，颠倒黑

白，自欺欺人，企图在国际上离间生事，更是不自量力。

两岸企业家：大陆工业互联网迅猛发展为台商台企创造丰厚机遇

2021两岸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研讨会10日在福州举行。本次研讨会主题为“两岸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两岸企业代表认为，大陆工业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台商台企创造了丰厚机遇。

台湾舆论：民进党当局操作驻美“代表处”改名是“台独”色彩的豪赌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派员赴美商谈将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一事。消息传出，台湾舆论和有关专家纷纷发出警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高度敏感、重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不可退让的红线，民进党操作这一改名议题，颇具“台独”色彩，是以两岸和平、台湾安全及人民福祉为筹码的豪赌。

国台办：已有15.6万余名在大陆台胞接种疫苗，累计逾29万剂次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截至9月13日，大陆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1.52亿剂次。截至8月31日，有15.6万余名在大陆台胞接种疫苗，累计接种逾29万剂次。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疫苗接种统一安排，已开始为12至17岁的在大陆台湾学生接种疫苗。

国台办：今年以来两岸贸易额增速逾三成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应询介绍，今年以来，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两岸贸易、投资大幅增长，金融合作持续深化，

经贸交流热度不减。今年1至8月，两岸贸易额2088.2亿美元，同比增长31.8%。

昆山迎来新一轮台资潮，总投资额516亿元台资重大项目签约开工

2021昆山市台资重大项目签约开工活动16日举行，36个台资重大项目签约开工，总投资额516亿元，昆山迎来新一轮台商投资热潮。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外部势力谋“独”难逃失败下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询表示，斯洛文尼亚应切实履行其与中方建交时就台湾问题所作严肃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谨慎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外部势力谋“独”难逃失败下场。

国台办：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美英澳所谓“印太战略”严重违背一中原则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询表示，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美英澳所谓“印太战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损害。

国台办：敦促欧洲议会及有关委员会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

欧洲议会近日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包含消极涉台内容，民进党当局表示感谢。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8日应询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敦促欧洲议会及有关委员会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

国台办：暂停输入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科学合理、完全正当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2日应询表示，大陆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和莲雾输入，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保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是科学合理、完全正当的。海关总署已通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联系渠道向台方进行了相应通报。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针对台湾当局宣布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香港各界举行大会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23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以视频方式致辞。

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中国国民党25日举行党主席选举，候选人朱立伦获得85164票，得票率为45.78%，当选新任党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6日致电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大义，戮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

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

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

汪洋出席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

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五届台胞社团论坛开幕式26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第五届台胞社团论坛主论坛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

第五届台胞社团论坛主论坛27日上午在北京举办。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岛内、香港、澳门和海外的300余名台胞参加论坛，围绕“推动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促进民间交流，实现心灵契合”“引领两岸青年，扛起时代责任”等议题进行交流。

国台办：愿与中国国民党共同推动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愿与中国国民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保持良性互动，加强交流合作，就攸关台湾民众安全与利益福祉的议题进行沟通对话，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造福两岸同胞。

国台办：我们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绝不是嘴上说说的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9日应询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国会推动、审议含有涉台内容的议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无权干涉。民进党当局切勿误判形势，任何企图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行径终将失败。我们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绝不是嘴上说说的。

一波三折的印度航母之路

□ 石稼

2021年8月4日，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出港，开启了首次海上测试。一时间，印度媒体“一片沸腾”，欢呼印度已经成功进入有能力建造现代航母国家的“精英俱乐部”，吹捧这艘航母的国产化率高达75%，是“印度制造”的典范之作。印度海军发言人表示，“对于印度来说这是一个自豪的历史性时刻”，并吹嘘“印度加入了有能力自主设计、建造和整合先进航母的国家行列，尽管面临着新冠疫情的挑战，印度仍然达成了这一里程碑”。

多年来，印度一直走的是购买、改造和自行研制的发展路线，每条路一开始都走得风风火火，但一路走来都是一波三折，一些规划和承诺总是一改再改，让人看不到希望和结果。

买来的雄心壮志

美国著名海军战略家马汉有一句名言：“不论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印度洋是通向7个海洋的要冲，21世纪的世界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印度作为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国家，自1947年摆脱英国的殖

民统治后，一直在做着控制印度洋的大国梦。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公开表示：印度要么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而印度要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受英国皇家海军的影响，印度一直认为要称雄南亚、控制印度洋，对周边各国特别是对巴基斯坦形成强大威慑力，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尤其要像英国一样拥有一支航母舰队，这也是印度海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和风向标。因此，印度在海军初创时期，就在做着“航母梦”。

印度在“航母梦”驱使下，在独立建国后的第7个年头，也就是1957年，即通过决议，拟拨出近1500万英镑的巨款，从英国购进“大力神”号航母。该航母属“尊严”级航母，是英国二战期间建造的轻型航母，属于早期的“巨人”级航母的改进型，比原先的“巨人”级航母增加了排水量和舰载机、防空舰炮的数量，作战能力明显提高。首舰于1943年4月开工建造，随后又陆续建造了5艘。“大力神”号航

母是英国“尊严”级航母的6号舰。印度对该航母进行改装后重新命名为“维克兰特”号航母。1961年3月，“维克兰特”号航母加入印度海军服役，从此，印度成为二战后亚洲第一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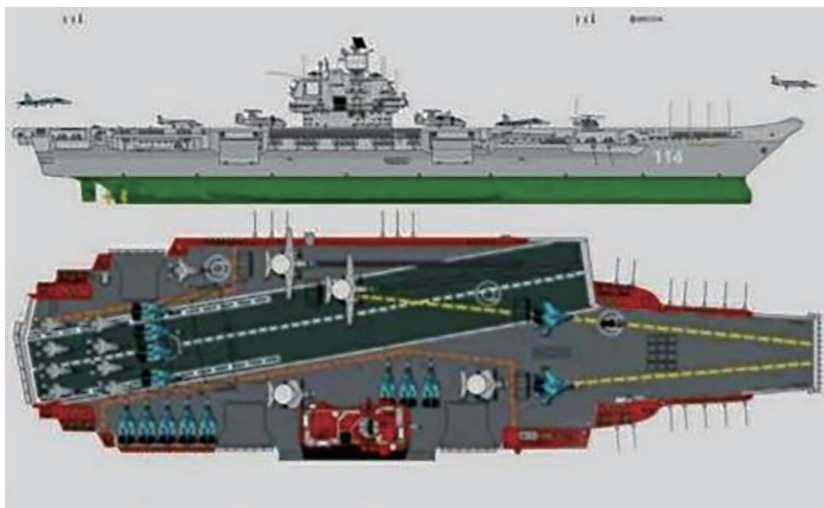
“维克兰特”号航母标准排水量15700吨，满载排水量19500吨，舰全长213.3米，宽24.4米，飞行甲板长210米，宽39米，吃水7.3米。动力装置为4台蒸汽轮机，总功率4万马力，双轴双舵，最大航速25节，续航力约1万海里/14节，舰员编制1340人。舰上最初搭载英国“海鹰”战斗轰炸机和法国“贸易风”反潜机，配16门（后减为8门）40毫米博福斯舰炮。

“维克兰特”号作为印度的第一艘航母，曾在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大显神威，舰上的“海鹰”战斗轰炸机和“贸易风”反潜机累计出动4300多架次，投掷各种炸弹300多吨，成功地袭击了东巴海港及军事基地，并对巴海空进行了成功封锁，取得了战区制空、制海权，共击沉巴海军舰只8艘、击伤5艘，尤其是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时，还炸

沉、俘获巴方商船43艘，可以说是为印度赢得此次战争的胜利立了大功。同时，该航母的服役，也为印度海军培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官及士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航母作战、使用和维护经验。

印巴战争结束后，“维克兰特”号航母又历经数次现代化改造：1983年采用多用途“海鹞”飞机取代原先的“海鹰”飞机。1984年安装了滑跃甲板、着舰灯光系统和跑道对准系统等。1997年1月，因该舰舰龄过大、舰况太差，印度海军将之除役，改造成一个海上博物馆。2014年11月22日，“维克兰特”号航母开始拆解，参与航母拆解的工人有200多人，拆解工作持续了半年多。

航母在印巴战争中的卓越表现，让印度愈发坚定了发展航母的决心。为此，印度一方面不断改进“维克兰特”号航母的作战性能，另一方面又将目光锁定在英国退役的“竞技神”号航母上。该航母为英国皇家海军“半人马”级航母的4号舰，1944年6月21日在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开工建造，1953年2月16日下水，1959年11月25日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85年除役。印度看好该航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该航母曾参加过1982年的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并作为



“维克兰特”号航母效果图。



正在建造中的“维克兰特”号航母。

英特混编队的旗舰参战，是一艘有实战经验的航母。在历时74天的马岛海战中，“竞技神”号航母所搭载的“海鹞”战斗机大显神威，共出动2300多架次，拦截了超过150架次的阿空军突袭，取得击落21架敌机的战绩，不仅有效保护了英国舰队的安全，还参加了对阿地面目标的攻击和对英国登陆部队的空中火力支援，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7月，英印两国签订“竞技神”号航母的出售协议，印度以5000万英镑的价格获得这艘航母，将其命名为“维拉特”号，同时还支付了1500万英镑的改装费，主要是对航母的结构、武器、雷达电子设备等进行改进。

改装后的“维拉特”号航母舰长227米，舰宽49米，吃水8.7米，标准排水量23900吨，满载排水量28700吨，最高航速28节，

巡航速度14节，续航力6500海里/14节，全舰人员配置为1350人，其中航空人员450人。舰载机总搭载数量为30架，但在实际使用中，舰上搭载的舰载机数量不超过20架。1987年5月20日，改装完成后的“维拉特”号航母正式进入印度海军服役，母港设在孟买军港。“维拉特”号航母的加入，使得印度短暂实现了“双航母”的愿望，一度对南亚各国形成压倒性海、空优势。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维克兰特”号航母状况越来越差，其出航训练、巡逻等次数越来越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航母主要时间是停泊在军港中维修，印度海军只有“维拉特”号航母活跃在海上。

“维拉特”号毕竟是二手航母，即使不断改进，依然逃脱不了和“维克兰特”号航母一样的宿命，该航母在服役30年后，舰体的全面老化，使其很难再承担海上作战任务，很多时候其存在只剩下了象征意义。为保证印度海军在21世纪仍具作战能力，购买或自己建造航母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2004年，印度与俄罗斯签约，购买俄罗斯退役航母“戈尔什科夫元帅”号，由俄罗斯帮助进行现代化改装。该航母被命名为“维克拉玛蒂亚”号，于2013年11月16日正式交付印度海军服

役，但印度花巨资买来的这艘退役航母改装后一直问题频出、事故不断，一度沦为国际笑柄。目前，印度在役的就是这艘航母。

雄心勃勃的“建造故事”

印度购买航母的心酸历程，也让其军方意识到总是当冤大头买二手航母不是办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印度就已经开始考虑发展国产航母问题了。80年代中后期，印度开始投入力量，展开航母的设计工作。但由于印度国内政局的变化和印度国防部的朝令夕改等因素影响，印度在国产航母发展方面问题不断，笑料也不断。

1989年，印度委托法国DCN公司花巨资设计了一艘25000吨的航母，设计完成后，印度又觉得25000吨体量太大，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白花了一大笔设计费。两年后，印度又瞄上了意大利的“加富尔”号航母，委托意大利“加富尔”号航母的设计和建造者——意大利芬坎蒂尼公司承担设计任务，比原来的小1万吨，结果设计完了，受印度国防部人员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该计划又无疾而终。几经折腾，印度终于在1999年正式启动了国产航母设计建造计划，代号“71号工程”，并将首艘国产航母命名为“蓝天卫士”，后来为了纪念印度从英国采购的第一艘航母，

又改名为“维克兰特”号。该方案经过多次修改后于2002年11月基本确定下来。2003年1月，印度议会通过了总耗资达300亿卢布的国产航母建造计划，并开始正式建造前的材料准备和设施改造工作。该舰由印度海军设计局承担设计工作，科钦造船厂负责建造。2005年4月11日，印度煞有介事地在科钦造船厂举行了第一块钢板切割仪式，算是正式启动了“蓝天卫士”计划。2009年开始建造铺设龙骨。

按照印度海军的设想，这个航母基本模样是：航母舰体长为262米，最大宽62米，高59米，14层甲板，上层建筑有5层，最大船员乘量为1700名，拥有超过2300个隔间，包括可容纳女性军官的舱室。满载排水量4万吨，属中型航母，动力为四台LM-2500+燃气轮机，单机轴马力为4万马力，总轴马力为16万马力，最大航速28节，巡航速度为18节，续航力约为7500海里。按照印度海军的说法，该舰在机械操作、船舶航行和生存能力等方面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设计。“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最上层为飞行甲板，其次便是机库甲板，紧接着是供应其他储物或者其他非战斗空间的两层甲板和底层的支撑船体甲板。“维克兰特”号航母部署的是俄罗斯制造的米格29K战斗机，约24架。

这个航母在外形设计上，是按照现代意义的大甲板中型航母设计的，整体设计风格类似意大利的“加富尔”号航母。舰体由47个模块组成，其中科钦造船厂完成70%的工作量，其余的由印度国内的造船厂完成，最后在科钦造船厂内完成总装。在舰内机库、弹药舱、燃料舱以及作战指挥中心等重要部分加装防弹装甲，以提高抗毁和生存能力。舰岛位于舰体右侧，长50米，倒三角形设计，前后两个塔式整体桅杆安置了多种雷达和电子设备，各电子设备之间可实现电磁兼容。舰岛上布置了四阵面的EL/M-2248 MF-STAR多功能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也是印度海军“加尔各答”级导弹驱逐舰和“维沙卡帕特南”级导弹驱逐舰的主雷达。EL/M-2248 MF-STAR雷达集合3D对空监视/搜索、平面搜索、多目标同时追踪、警告、目标分类、武器指挥射控能力，对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发现距离为250公里，对低空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的发现距离为250公里。

当世界都以为印度的航母建造进程将大大提速时，印度因为政策不连贯、经费跟不上，加上材料、技术不过关等因素，后续的一系列神操作让世人大跌眼镜。该航母曾三次下水，其中两次是被科钦造船厂拖下水的，

这在国际航母建造史上绝无仅有，因此在国际造船界成为笑谈。

第一次是2011年，当时该航母还是一个空壳子，原因是钢材不够，拖出去是为了给造船腾地方，因为科钦造船厂毕竟还要生存。第二次是2013年，被拖出去的原因是停工待料，建筑材料跟不上。当时仅完工了30%，连舰岛都没有安装。

第三次下水是2015年，科钦造船厂长介绍称：“所有的主要设备已经装入了航母，现在它看起来已经具备了一艘航母的外形和完整的船体。除了上层建筑上的一小部分还在施工外，结构建造已经全面结束，内部间隔也已经全部焊接完毕。”但当所有的下水庆典搞完以后，航母却出不了船坞，原因是淤泥淤住了航母，这让参加庆典的印度高官们尴尬不已。

“维克兰特”号航母下水后，仅仅因为在水中浸泡，动力系统就被海水腐蚀，导致还没交付使用就得大修。更奇葩的是，2018年“维克兰特”号在船坞维修改造时，因几名船厂工人抽烟，烟头点燃了旁边一艘也在维修的钻井船化粪池，从而引发爆炸，十几名工人遇难，“维克兰特”号也深受其害。

第二年，“维克兰特”号再度上演传奇事故。2019年9月，停

泊在柯钦造船厂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上四台电脑被拆开，电脑内的硬盘、内存及处理器等设备不翼而飞。发现被盗的原因是科钦船厂在对“维克兰特”号航母的电子设备进行初步测试时失败，检查失败原因时，才发现舰上的计算机系统硬盘等设施被盗，这让世界军迷们忍俊不禁。

另外，该航母的制造成本也不断攀升，让人咋舌。该舰最初的预算不超过5亿美元，后来增加到28亿美元，再后来印度总理莫迪说将投资31.8亿美元建成该舰，而最终该舰的预算则可能高达40亿美元。

目前，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已经开始进行海试。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曾表示，“维克兰特”号航母预计将于明年服役，它将为印度的海军力量增加卓越的作战能力、航程和多功能性，并称“明年投入使用的本土航空母舰将是对印度独立75周年的恰当致敬，它拥有近75%的国产内容，从设计规格到建筑用钢材，从关键武器到传感器”。尽管拉杰纳特·辛格说得信心满满，但届时会不会服役，各国军事专家和媒体都不看好，印度人自己心里也没底，可谓是前途无“亮”。

到目前为止，印度仍只有一艘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在印度洋游弋。即便如此，印度还扬

言要建造第二艘国产航母，且将标准定得很高：全通式甲板、吨位6万吨以上、核动力装置、弹射器系统，等等，以此证明印度才是亚洲第一航母大国。只可惜，印度雄心勃勃的航母计划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解码“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是由前苏联第二代“基辅”级载机巡洋舰4号舰“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改装而来。“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于1978年开工建设，1988年进入苏联海军服役。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该舰在1995年被迫退役封存。2004年，俄罗斯名义上将该舰免费赠送给印度，改名为“维克拉玛蒂亚”号，并开始进行现代化改装。2014年，“维克拉玛蒂亚”号再次服役，舷号R33，部署在印度海军西部舰队，改造总费用约为23.5亿美元。

一、舰船结构

（一）整体结构设计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的改造工程非常浩大，除了保留原有的舰体、舰岛、升降机、烟道和烟囱等基本结构外，拆除了甲板上所有武器装备、舰岛上大部分电子设备、约20%内部舱室以及近2000吨装甲钢板，更换了舰艏球鼻艏和飞行甲板，全舰水密结构进行了调整，舰体抗毁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的后部升降机。

伤能力显著降低。舰艏为加装滑跃起飞甲板而向前延伸8米，舰艏为保证降落区安全而向后加长2米，左右舷飞行甲板也适当向外扩展，舰岛左侧加装了向外突出的航空指挥舰桥，舰岛后侧加装了1座独立桅杆。完成改装后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全长283.5米，舰体宽32.7米，飞行甲板最宽处59.8米，标准排水量

34200吨，满载排水量45300吨，属于中型常规动力航母。该舰经过改造后，全舰重心有所升高和前移，由于没有装备稳定鳍或自动配重系统，导致该舰在5级海况时纵摇幅度就会超过 1.5° ，因而无法起降舰载机。全舰包括航空人员总共编制员额约为1600人，所有内部舱室全部重新设计和装修，官兵生活保障条件

有了明显提升，军官和士兵的人均居住面积位于世界现役航母前列，各等级居住舱都设有独立卫生间，配套的厨房、餐厅、娱乐室、医院等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

（二）飞行甲板设计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采用全通式斜角飞行甲板和滑跃起飞甲板设计，滑跃起飞甲板上翘 14.3° ，飞行甲板总面积约10200平方米，比改装前的甲板面积增加近60%，分为起飞区、降落区、停机区和保障区等多个板块，固定停机位可停放9架舰载战斗机，其余临时停机位需要统一调度使用。受甲板宽度限制，该舰仅有2个起飞点，左侧长起飞点横穿了降落区，长度约180米，右侧短起飞点位于前部升降机的前侧，长度约160米，由于米格-29K舰载机属于中型舰载机，因此该型舰载机在两个起飞点均可以保证满载荷滑跃起飞。飞行甲板左舷设有舰载机着舰引导室和光学助降设备，飞行甲板后部设有3根拦阻索，每根间距13米，比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4根拦阻索间距还要长1米，加上舰部摇摆幅度较大，导致阻拦成功率较低，复飞次数较多，飞行员容易出现判断失误。2014年6月，一架米格-29K舰载机降落挂上最后一根拦阻索后误以为着舰失败，随即加速复飞，最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飞行甲板舰载机展示。



米格-29K从“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滑跃起飞。

终导致飞机严重受损。由于飞行甲板的起飞区与降落区存在大面积重叠，加上该舰没有在起飞点后侧安装尾焰偏流板，因此，该舰舰载机的实际出动率很低，无法同时进行舰载机起降作业。

在飞机起飞或降落时，前部升降机均无法使用，从而导致“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甲板作业流程复杂、时效性较差，战斗力有限。

（三）机库区域设计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



/ 印度国产的 LCA“光辉”轻型舰载机成功着舰。

母舰的机库在改装后有所扩大，长130米，宽22.5米，高6.6米，面积约2930平方米，机库内保留了牵引轨道和旋转设备，最多能够容纳14架米格-29K舰载机和6架直升机。该舰的典型配置方案为30架米格-29K舰载机、2架卡-31预警直升机和6架卡-28反潜直升机。“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在原有的2台舷内式升降机位置重新换装了全新的升降机，1台位于舰岛左侧，1台位于后部独立桅杆左侧，每台升降机平台长19.2米，宽10.3米，最大载重30吨，每次仅能搭载1架米格-29K舰载机。该舰在下层甲板保留了原有的后部弹药库，增加了一个前部弹药库，极大增强了航空弹药的携带能力，保证了舰载机的海上持续作战能力。2台直通飞行甲板的弹药升降机均布置在甲板右舷后部的停机区内，因此所有舰载机的甲板挂弹作业均需在无舰载机起飞的情况下进行。

二、动力系统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的动力系统原本没有进行

任何改动，采用“四轴四桨两舵”设计，搭载了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同样的8座KVG-4增压型重油锅炉和“现代”级驱逐舰使用的4台GTZA-674型蒸汽轮机。但是，在2012年9月海试期间，该舰动力系统发生了严重事故，直接导致7座锅炉报废，因此俄罗斯不得不推迟交付时间，对所有锅炉进行全面更换。新的8座KVG-4改进版锅炉由波罗的海船厂生产，燃料从重油改为柴油，有效提高了燃油利用率，增加了该舰的续航能力。同时，更换了6台全新的柴油发动机组，作为应急动力系统。该舰的动力系统设计与“库兹涅佐夫”号基本相同，更像是“库兹涅佐夫”号的技术验证舰，同属于1143级舰的后期版本。在换装新锅炉后，该舰推进系统的总功率约为18万马力，最高航速29节，最大续航力13500海里/18节，远超“库兹涅佐夫”号航母8500海里/18节的续航能力。

三、船电装备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拆除了原舰岛上的“天空哨兵”多功能相控阵雷达和所有火控雷达，加装了1部“顶板”三坐标对空/对海雷达和1部“平网”三坐标远程搜索雷达，保留并升级了1部“蛋糕台”战术空中导航雷达、2部F频段的MR-320M“双撑面”对海雷达以及全

新的电子战系统。其中，“顶板”三坐标对空/对海雷达安装在舰岛顶端，最大探测距离300公里，对低空小目标探测距离50公里。“平网”三坐标远程搜索雷达具备大气波导探测能力，对海空大型目标最远探测距离达500公里。电子战系统由巴拉特公司生产，主要包括2座箔条干扰弹发射装置和1套雷达对抗设备。为了保证电子设备互不干扰，在舰岛后侧设置了1个独立桅杆，用于安装卫星通信天线、战术数据链设备和光学导航设备。本舰换装了新的大尺寸球鼻艏，安装了俄罗斯新型的MG-355舰壳声纳。在交付服役时，“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没有安装任何武器系统，后期改进时，加装了1套以色列制造的“巴拉克-I”防空导弹系统和4套由退役护卫舰上拆卸来的AK-630型6管30毫米炮。“巴拉克-I”防空导弹系统采用垂直发射方式，备弹48枚，射程12公里，飞行速度2马赫，属于典型的近程点防御导弹。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虽然是一艘已经建造近50年的老旧航母，升级改造潜力和船体使用寿命已难有大的突破，总体作战性能明显落后于现代标准，但是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该舰仍是大幅提升海军实力的关键武器平台，并对周边国家也起到一定威慑作用。■

“布衣元帅”徐向前之子徐小岩： “公私分明的家规不能忘”

□ 刘畅

2021年11月8日，是徐向前元帅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徐向前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是黄埔军校第一批毕业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的巩固建立了卓越功勋。

生活中的徐向前心灵手巧、爱好广泛：通摄影、喜戏曲、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爱读书、好书法……平常，他话语不多，生活简朴，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元帅”。

“父亲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原名‘象谦’改为‘向前’，表明了自己为党的事业奋勇向前，永不回头的决心。”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回忆道。

在徐小岩家的会客厅右侧，挂着一幅醒目的墨宝，上面写着：“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落款是“习仲勋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时四十分”。徐小岩告诉记者，这幅墨宝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是在父亲去世当天的凌晨，习伯伯赶到医院



/ 习仲勋看望徐向前后所题的墨宝。

送别父亲，回家后悲痛万分，立即写下了这两句话，也是对父亲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徐小岩是徐向前唯一的儿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他指着父亲题写的“人民的公仆”几个字，向记者回忆起心中“平凡而又不凡”的父亲。

深厚的“黄埔情结”

黄埔军校是徐向前革命的

起点。

徐小岩告诉记者，从记事起，他就常听父母亲提起黄埔军校，因而他自幼就对黄埔军校这个特有名词耳熟能详，并渐渐形成了深厚的“黄埔情结”。

1901年，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1924年5月，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并当过教员的徐向前辗转上海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1期学员。徐小岩记得父亲常给自己讲，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



/ 徐小岩。



/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时的徐向前。

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黄埔师生的革命热忱。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军事课内容主要是从单兵运作到营连排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当时的训练和生活都很紧张。每天，学员们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到紧急集合不能超过3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10分钟，大家必须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但照样要出操。

1925年2月，徐向前在1期学成毕业，留校在第3期学员中当排长，并参加了攻打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那时候，他们这支学生军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在战火中大显



/ 徐向前缝补衣服的油画(孙会忠绘)。

军威。同学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他们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东征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3万多人，迫使其率残兵败将逃往福建。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的产物，大多数学员日后都成为国共双方的重要将领。徐小岩曾问过父亲，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有没有与国民党将领打过交道。徐向前元帅回答

说，那实在是太多了，从校长蒋介石到同是第1期学员的胡宗南都曾有过接触。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经常以谈话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政治亲信。谈话时，蒋介石坐在办公室，学员站在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大部分学员都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当然弄不懂蒋校长这样做的真正目的，许多人还以能与蒋校长谈话而倍感荣幸。一天，轮到徐向前被召见。一进门，就见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一脸严肃，这让没有见

过什么世面的徐向前有点不知所措。谈话开始，蒋介石就用浓浓的浙江奉化口音慢条斯理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啦？”“山西人。”徐向前对答一口山西五台话。浙江方言对山西方言，蒋介石不免皱了皱眉头。接着问：“在家都干过什么？”“当过教员。”一问一答，机械而无趣。校长没有得到惯常的吹捧，学生也没受到校长的勉慰。于是，寥寥数语，蒋介石就挥挥手将徐向前打发走了。因此，在蒋介石的最初印象里，徐向前就是个“没出息”的学生。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紧紧团结在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小集团“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徐向前及黄埔1期中的同学陈赓、左权、蔡申熙、许继慎、周士第、吴展、李之龙、王尔琢、宣侠父等，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位“没出息”的学生，短短7年之后，竟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他率领的红军，从鄂豫皖大别山反“围剿”作战，到创建川陕根据地，再到艰苦卓绝的西征，消灭了国民党10余万军队。

任务重于生命



/ 解放太原时期的徐向前。

战争年代，徐向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任务重于生命！”他要求指挥员“指挥靠前”。在重大战役中，徐向前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指挥员们看见“总指挥”士气倍增，就更加一往无前。曾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的李先念回忆说：“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恶仗，与徐向前的指挥风格分不开。

从1947年10月到1949年4月，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连续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解放了山西全境。这期间，他一直是带病参战。晋中战役

中，他常常冒着烈日酷暑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晋中战役刚结束，他又抱病主持了太原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号召全体指战员搞好整训，尽快完成攻打太原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对徐向前十分关心。晋中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在致徐向前的电报中指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及中央一谈。”根据中央指示，徐向前抵达石家庄后，住进了医院。此时，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呼吸困难，还时常咳血，消化功能也很差。医生建议他最少休息3个月，但他只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就前往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1年，徐向前（第二排左一）、黄杰（第二排右二）、徐小岩（前排右一）等摄于颐和园（照片为徐向前亲自冲洗）。

1948年10月6日，太原战役打响后的第二天，徐向前不顾重病未愈，提前出院，昼夜兼程赶往太原前线。10月7日凌晨，他到达阳泉以西的坡头村，因旅途劳累，病情突然加重，咳嗽不止，头疼欲裂，不得不暂时停止前行。10月10日晚赶到太原前线总指挥部，他连夜召开太原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攻打太原的外围作战。在紧张激烈的东山争夺战中，他经常躺在担架上冒着枪林弹雨到阵地前沿巡视，以了解最新战况，及时调整部署。由于操劳过度，徐向前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肋膜炎造成胸部大量积水，高烧不退，连睡觉翻身都十分困难。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得知徐向前的病情后，立即派两名医生赶到太原前线，同时致电徐向前，要他早日回后方休息。徐向前说太原没有攻克，自己绝不能离开前线。后经周士第等人反复劝说，他才同意暂时到榆次峪壁村小住，一面治病，一面继续指导太原前线的工作。1949年3月，彭德怀由西柏坡去西北战场途经太原时，专门去峪壁村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因病重无法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故挽留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经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得到批准。

太原解放后，为了总结太原战役的经验，徐向前强忍病

痛，查看缴获的大量军事档案，并前往双塔寺等重点要塞查看。之后，他在审定太原前线委员会战后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大胜后容易骄傲，有成绩也就容易掩盖缺点。故各部均应于整训前三评工作中，着重注意自己尚有缺点的研讨与发现弱点！”徐向前指示太原警备区，一定要依靠人民把太原“接好、看好、交好”。他说：“我们攻打太原，解放太原，就是要让人民来接管太原，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

徐向前带病指挥作战，感动了他身边每个人。一位同志写道：“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任务重于生命！你说到了，也做到了！在太原前线，身体力行。你不能吃也不能动，却硬逼着我们将你抬到前线，因为党的任务还未完成！生命是最珍贵的，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你病成那个样子，发着高烧，而心中装着的却是党的使命！”

“父亲一旦确定信仰决不随波逐流，而是执着地追求真理。”徐小岩告诉记者，“父亲参加革命后，只回过四次家乡，其中两次的意义尤为重大。”1937年，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派徐向前随同周恩来、彭德怀一同去做阎锡山的工作。经商榷，阎锡山最终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

总动员委员会。这一次，徐向前只在家乡停留了3天。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战场作战，则是徐向前最后一次回家乡。他率领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解放了山西全境。“父亲用解放山西这样的特殊方式，回报了养育他的土地。”徐小岩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部长。1985年，他主动提出辞职，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徐向前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徐向前担任首任会长，这也是他晚年担任的唯一职务。他的爱国热忱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感动了海内外的黄埔同学。在他的感召下，许多台湾和海外的黄埔同学都成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积极支持者。1988年创刊的《黄埔》杂志，特选用徐向前元帅亲手书写的“黄埔”两字作为刊名。30多年来，《黄埔》杂志一直认真实践徐向前元帅提出的“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办刊宗旨，在引导黄埔同学发扬黄埔精神，开展反“独”促统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1983 年的徐向前。



/ 1984 年 6 月，徐向前（前排左五）与其他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在北京合影。

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

徐小岩的母亲黄杰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黄杰报考了国民革命军武汉军政干校女兵队。这所学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后，在原广州黄埔军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黄埔军

校在广州办了5期，因此曾长期在黄埔军校任教的叶剑英元帅亲切地称它为“黄埔六期”。徐小岩告诉记者，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母亲带他去看电影《赵一曼》，电影结束时，一向性格坚毅的母亲满脸是泪，把他吓了一跳。母亲告诉他：“这电影中的

主人公赵一曼烈士，就是妈妈当年在武汉黄埔6期时的同学……”

作为家中的独子，徐小岩虽然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但每当有人问起“首长”父亲的非凡之处，他总是无言以对。“可能这就是父亲，他在家中很平凡，我丝毫感受不到父亲是多大的官，我们的相处就像其他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

徐小岩说，“公私分明”是家中永恒不变的家规，“我的父母是这样要求孩子们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父亲虽是军人，平时话不多，但对母亲却非常体贴。”徐小岩回忆道，每次同母亲散步，平日走路大步流星的父亲，总会特意放慢脚步。“母亲晚年用的拐杖，也是父亲特别制作送给母亲的。他怕竹拐杖太滑，专门找来胶条，一圈圈地缠在上面，还专门在拐杖底下安上防滑的橡胶头……”在徐小岩记忆中，疼爱归疼爱，即便母亲，每天也都和普通人一样坐公交车上下班，从不使用父亲的专车。

人们提起徐向前，总忘不了他“布衣元帅”的称呼。他一生简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80岁高龄，对家中用的每一滴水、一滴油、一度电都非常注意。“五谷杂粮、粗茶淡饭，父亲吃了一辈子。”每年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柳树发了嫩芽，徐向前都

会叫炊事员采来“加菜”。“我爱人第一次到我家吃了‘野菜席’，回去以后还闹了笑话。她母亲问她徐老总家吃了什么？她老实地说，‘说不清是啥，就记得吃了‘一堆草’。”说起这些往事，徐小岩感慨不已：“老一辈的这些品质，真的值得我们反思。”

有一年夏天，徐向前在北戴河疗养，胡耀邦等几个老部下前去探望，徐向前留他们吃晚饭。“一大锅稀饭，再放一点面条、大块土豆、豆角和一些肉一起炖，大家就穿着背心，‘呼噜呼噜’地吃开了。这就是当年的高级领导人聚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小岩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别山老区的几位同志来北京看望徐向前，当时徐向前已经生病，在躺椅上接待了他们。老区来的同志担心他的身体，一开始只报喜，不报忧。徐向前越听越不高兴，问道：“群众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吃不饱饭的？”这一问，顿时冷了场。最后，一个小伙子告诉徐向前：“您还记得七里坪吧？我们下去做调查，那里群众生活依然很苦，有个姓王的，全家7口人，只有6个碗……”徐向前听了，不自觉地躺椅上慢慢坐了起来，嘴里喃喃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徐小岩告诉记者，打那之后，父亲一直闷闷不乐，一谈起老区人民，

满是愧疚之情。后来，他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国务院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应运而生，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

大别山老区同志走后没几天，是徐向前82岁寿辰。“父亲那天发了很大的火，因为我们要给他做寿，他一再念叨，还有‘7口人，只有6个碗’的老百姓！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过过生日，只是85岁大寿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照了张合影。”

铭记家风传承

投身黄埔走上革命道路的父母，对后辈的教育始终抓得很紧。1947年，徐小岩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于山西长治呱呱坠地。那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已经46岁，在家乡的土地上喜得贵子，他兴奋地将儿子的小脚丫含在嘴里。徐小岩上小学时，全家已经来到北京，住在史家胡同。

“我那时在八一小学读书，同学中大部分可以说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谁的家长官大的，但我对此毫无概念，不知道‘首长’具体是多大的官，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权。”徐小岩只知道，他从家里到学校的路程很远，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

钱。“每次家里会给我3毛钱，但因为嘴馋，在放学路上，我经常把车费拿去买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有一天，徐小岩一直走到晚上7点才到家，天都黑了。徐向前见到儿子，着急地询问晚归的原因。“我说因为肚子饿，用车费买吃的了。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是只给3毛钱车费。”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徐小岩一直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最终在2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徐小岩又前往加拿大进修，专门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徐小岩认为将来计算机必定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加拿大的那几年，徐小岩见到了西方世界的繁荣，他很震惊，也很羡慕，但是他并不留恋，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让中国人民也过上这样富足的生活。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徐小岩进入国家研究所工作，专门研发中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对于微型计算机的开发，徐小岩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那一批人之一。一次偶然的机会，徐小岩接触到了英特尔计算机处理器，当时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可惜国外管控比较严，国内也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参考。无奈之下，徐小岩的团队只能照着说明书进行研究。经过众人的努力，

硬是在计算机处理器中塞入了汉字系统，国家军用的第一代计算机处理器就此诞生。上世纪90年代，徐小岩成为解放军通信部部长，47岁时获得了少将军衔。2011年，59岁的徐小岩擢升中将军衔。徐向前功勋卓著，徐小岩也没有令自己的父亲和国家失望。

徐向前一生性格耿直，很反感言行不一的人，曾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句，表明做人、做事的立场。他最厌恶靠阿谀奉承和搞小圈子向上爬的人，这点对徐小岩影响很大。“我在总参通信部做了6年的部长，在我任内成长起来的副师以上的干部就有近百人，但是谁也不会说我有什么圈子，提拔过哪个大家都觉得不应该上的人。我觉得这点还是继承了老爷子的作风，做事对得起良心。”

在徐小岩家的客厅中央，挂着一幅徐向前补衣服的油画。“这是父亲有一次补衣服被抓拍了下来，之后一位画家看到照片，专门画了这幅作品送给父亲，我们就一直挂着。”徐小岩告诉记者，“父亲爱好很广泛，通摄影、喜戏曲、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爱读书、好书法……他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和子女，所以我们在他身边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温暖”。徐小岩忘不了父亲为自己缝扣子。“红

军时代，身为总指挥的父亲就自己缝补丁。小时候，顽皮的我住校一周回来，扣子总是掉光了，父亲就把细线搓成几股，把扣子缝得相当结实，以至于后来扣子磕掉了一半，另一半还牢牢挂在衣服上。”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还给我们做过木头的玩具小手枪，还会用扑克牌做望远镜。父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长征时，他的马背上就驮着一只猴子……”

徐帅的家风，在每一位后代中都得到了传承。徐小岩的大姐徐志明后来当了医生。“别人都说，以大姐的资历，应该安排个领导职务。但直到退休，她还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二姐徐鲁溪，是我们几个孩子中最聪明的，她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是我国第一代研究生。她主持的项目，还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姐一家三口都挤在8平方米的小屋子，后来赶上单位调整住房，父亲好一顿‘审问’，‘审’得二姐委屈得差点哭了，直到了解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父亲才安下心来。妹妹小涛也是一位平凡的医务工作者。”

徐小岩永远忘不了1990年6月，父亲因为肺结核住院治疗的那一天。“出门前，父亲无比留

恋地望着小院，轻声说‘这次去，就不回来啦……’此情此景，我一想起来就鼻子发酸。”住院后不久，徐向前发起了低烧，病情日渐加重。也许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去世前一个月，他在医院里郑重地给儿女留下遗言：“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深入研究军史，唤回“红军精神”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代民族英雄、政治家于谦借一首《石灰吟》托物言志，表达了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徐小岩说：“父亲非常喜欢这首诗，总是用它教育我们从小要清白做人，清白做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徐小岩似乎越来越能读懂和体会父亲。

在父亲等老一辈人简朴生活的熏陶下，徐小岩一直非常关注军队的作风建设。目前，中央和军委的严抓严管让徐小岩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像我父亲那一代人，怎么可能出现爬山时就封山、不让其他人走这样的事情？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容忍的。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在斗争最

艰苦的时候是人民群众养育了红军，支持了革命。”

徐小岩回忆，父亲在外地疗养时，发现外出有警车开道，非常不高兴，说：“我是来休养的，也没有什么急事，为什么要打扰群众？”从此再也不许警车开道了。由于交通拥挤，车子有时走得很慢，他之后索性减少了外出。

徐向前平时很喜欢看电影。但他发现，每次去大院看电影，他一进来，全体指战员都会起立欢迎。他晚到，就推迟播放。于是，他索性偷偷跑到家附近的电影院，等电影开始了，才悄悄地走进去。“他们那一代人，和人民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习近平主席的切身体会，毕竟我们的父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他血液里的东西。”

这些年，已经退休的徐小岩一直在深入研究“红军精神”，希望尽己所能弘扬红色文化。他曾深入四川阿坝藏区金川县考察。红军长征时，在那里建立过一年多的苏维埃政权。让徐小岩震撼的是，数十年过去了，在当地民众心中，红军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由于路途遥远，徐小岩到当地时，天色已晚，但当地藏族老乡都穿着过节的民族服装，一直殷切地等着见徐总指挥的后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支持红军创建苏维埃政权的那批藏民肯定早就不在了，但红军的事迹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一代代传播着这种精神。”徐小岩深受感动，他还记得当时在途中遇到塌方，一个当地孩子给家里打电话，说他和红军的后代在一起，让家人放心。“那种信任和感情，值得我们反思。一个政党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怎么赢得民心的？红军从川陕出去后，条件那么困难，到了当地，藏民觉得他们来了就是真心为民，就这么一条。这些历史我想记录下来，这是我还能做的。”

在徐小岩看来，历史有多面性，需要研究，也需要百家争鸣。“你不深入研究，不讲清历史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掌握话语权，就可能使敌对势力有机可乘。相反，我们好好研究我党我军革命的艰辛历程，才能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走上今天这条道路。研究我们犯了哪些错误，原因在哪里，才能取信于民。”

采访结束时，徐小岩告诉记者：“父亲出身黄埔，他们那一代人身教胜于言教。正如黄埔军校大门上挂着的那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句话，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应该做到。这也是对父亲120周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宋时轮

(上)

□ 蒲元

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人，黄埔5期生。全面抗战期间，历任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团长、第120师雁北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等职务；抗美援朝期间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副司令员、东海岸防御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务。

辗转入黄埔

1907年，宋时轮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丁姑山下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庭负担很重，但是长辈们还是在他6岁时将他送进私塾接受文化启蒙。1918年7月，宋时轮转入醴陵北乡兰谊高小读书。次年，他与左权同时考入醴陵县北联高小，并同在第八班学习。在老师的带领下，宋时轮和同学们手执写有“誓雪国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的小旗子，走乡串户，唤起民众。他们还到各商户检查，对凡是标明日制的商品，当众进行销毁，并在店铺门口贴上“常怀国耻，莫用日货”的标语。14岁时，宋时轮高小毕业，考入醴陵县立中学。1922年，宋时轮与左权、陈



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平西。

恭等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同学们经常聚集研讨时事，大家各抒己见，阐发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经常争得面红耳赤。1923年，宋时轮因参与反对学校贪污的活动，被开除学籍。

这年冬天，宋时轮投考到吴佩孚军官教导团当学兵。他认为：“只要学好军事后，就可以带着军队来反抗社会上的恶势力，以扫除其黑暗，展开灿烂的光明。”然而，“在该团学习不到两个月，有一次教练单杠时，我

的姿势不准确，遭教员拳打脚踢，以致被伤吐血，因而感觉旧军队生活的不能忍受，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同时感觉着个人的孤军无力，团体力量作用的重大。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决心逃脱这个部队跑到广东去”。

广东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宋时轮十分向往。很快，机会就来了。1923年冬，广州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派柳漱风前往醴陵，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生。得到广州方面招生的消息，宋时轮和左权等同学均感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投笔从戎或许是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他与左权、蔡申熙、邓文仪、张际春等20多人秘密报名，经初步考核后均被录取。

宋时轮告别家乡，与左权等会合，踏上了奔赴广州的行程。从湖南到广东的路程本不远，但由于军阀混战，铁路中断，宋时轮等只得由长沙经汉口绕道上海乘船去广州。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问题出现了。

宋时轮回忆这段经历曾这样说道：“我们这些学生娃子上路的时候，谁身上带的钱都不多。……当大家发现路费不够的时候，路程还没走上一半。有的同学提出了边打工边赶路的建议，但这样路途的时间要拉长，耽误到广州考试的日期。我急中生智，说：能不能把每个人剩下



/南石头监狱大门。

的钱集中起来，由一个人专门管理，负责安排大家的生活，继续赶路。我回家乡筹钱，再去广州找你们。这个提议一致通过了，我身上的几个钱也全部充公。”宋时轮仗义疏财之举赢得同学们的一致赞许，甚至在几十年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邓文仪还多次请返回大陆的亲友代其看望他。

同学们走了，身无分文的宋时轮只身返乡，一路上历尽艰辛，直到春末才回到醴陵，却因为过度饥饿和疲劳染上了痢疾。宋时轮一边治病，一边筹款，由于病情反复，直到1925年秋才算基本痊愈。这年冬天，宋时轮在长沙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得知广州黄埔军校在湖南秘密招生，立即决定报考，并与好友沈仲文、龙家勋等一起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南下广州的行程。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了招生考试，21日参加复试。不久，张榜公布录取学生名单，宋时轮榜上有名，被编入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队。从此，宋时轮真正走上了从军救国的道路。

狱中识熊雄

宋时轮考入黄埔5期的时候，当初和他一起南下的左权、蔡申熙、邓文仪、张际春等同学，不仅由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1期，而且均已毕业，并参加了平叛、东征、北伐等战斗，已经崭露头角。原本也应该是1期老大哥的宋时轮，却阴差阳错地成为5期的小弟。

不过，宋时轮并没有抱怨，相反，他刻苦学习、积极训练，很多军事科目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正当宋时轮准备有一番作为

时，却因感染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不得不离开学校，前往广州东山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半年后病愈出院时，因缺课太多，被转入第6期当入伍生，编在第1团第4营（营长陈明仁）第16连。在医院治疗期间，宋时轮由张一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院后不久，他随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太平圩，又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事变爆发，风暴很快波及黄埔。宋时轮因“共党嫌疑”的罪名于4月20日在广州东山被捕，关入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突然遭此劫难，刚刚20岁的宋时轮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正在这时，他遇到了同样身陷囹圄的熊雄。

熊雄，1892年出生，江西省宜丰县人。1925年9月进入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政治教官，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主持军校政治教育工作长达一年多，工作卓有成效，在黄埔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熊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四一二”事变中首当其冲被捕入狱，5月初，被转入南石头监狱囚禁。

熊雄的出现在监狱内引起一阵轰动，当时也在狱中的杨南邨事后回忆：“第三天早晨，不

知道是哪些同学在东、南、北巷道里大声叫道‘我们的熊老师来和我们一起了！’……于是大家不管狱卒的呵斥，尚活下来的约200多个同学像一道急潮涌到西楼巷道去，塞得无法移动半步。……熊老师来了，大家心底好像有了一位领头人，感觉都有了点希望似的。”

熊雄的牢房和宋时轮的并排，中间隔着两个房间。两人在狱中曾有过三次交谈，50多年后，宋时轮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谈话，是宋时轮利用放风的机会，站在熊雄单间的房门前，从小窗口向熊雄打招呼，自报了家门，并且透露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两人约定下次利用放风的机会再详细谈。第二次谈话，宋时轮介绍了狱中同学普遍存在的恐惧和不安情绪，熊雄则从了解宋时轮的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入手，最后引导宋时轮明白了只有联合工农劳苦大众，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第三次交谈时，熊雄向宋时轮介绍了做思想工作的一些要点。最后，他说：“我们黄埔是干什么的？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为了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的穷苦人得到翻身和解放。”与熊雄接触的时间虽短，但对宋时轮触动很大。熊雄曾对宋时轮说过，“熊雄虽死，将会有千百万个更好的熊

雄继续革命事业”。宋时轮感到，“我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可以说我就是他讲到的‘千百万个’继续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员之一”。“熊雄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拘禁期间，由于南石头监狱阴暗潮湿，加上营养不良，宋时轮双腿关节严重发炎，红肿疼痛，行走困难，由此落下终生的疾患，但他始终坚定信心、坚持斗争。1929年初，宋时轮以“被涉有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判“感化处分一年”。4月，经组织营救，得以保释出狱。

此后，宋时轮先是返回家乡组织游击队，后于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参与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他随红军干部团长征，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又参与指挥东征、西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

挺身御日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中外，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就此爆发。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3个主力师。贺龙任第120师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宋时轮为第358旅第716团团长。9月2日，宋时轮率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参加第120师抗

日誓师大会。第二天，全师起程，经韩城县芝川镇向山西抗日前线开进。9日，从芝川渡口渡过黄河。11日，进入山西。下旬，进至晋西北宁武、神池地区。

9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先后突破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面对这种局面，第120师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宋时轮率领第716团2营为骨干，组成独立支队，北出长城至雁门关以北敌占区开展游击作战，拖住日军后腿，迟滞其进攻。

会议第二天，宋时轮即率领由900余人组成的支队，从晋西北向雁北朔县、平鲁、山阴、右玉等地进发。雁北地区，位于雁门关外，古长城以南，同蒲铁路以西，北接绥蒙，东连晋察冀边区，西连绥蒙，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部队行进过程中，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宋时轮信心倍增，同时暗下决心，“到达雁北后迅速抓紧战机，争取先打几个胜仗”。10月初，宋时轮支队先后袭击井坪等市镇，收复平鲁县城，还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进行破袭，引起震动。另一方面，宋时轮派出一批干部、战士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不到一个月，便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宋时轮支队的威名逐



/ 2017年，作者（蒲元）在忻口战场考察。

渐响彻雁北地区。

10月初，日军进占阳明堡并围攻崞县，忻口会战拉开战幕。此役，卫立煌、郝梦龄、陈长捷、李默庵等一批将领率部与日寇激战。2017年8月，笔者前往忻口南怀化主阵地考察，时隔整整70年，在我军阵地所在山岭上，还随处可以看到泥土中的炮弹和子弹残片。仅十几分钟，笔者就挖出了大约二三十块各类残片，当年战况之激烈，日军火力之凶猛，由此可见一斑。

破坏日军后方公路交通，打击日军的辎重补给，是对正面战场友军的最有力支持。战役期间，宋时轮指挥部队活动于日军的主要运输线——同太公路一带，利用一切机会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打击日军。北周庄战斗，他们击毁敌辎重车辆13辆，毙敌30余人，俘敌3人。安荣村战斗，他们烧毁了横跨桑干河两岸连接同

太公路的安荣大桥。不久，南沙桥和木瓜河上的四孔铁路桥也被他们拆毁。此外，驻岱岳、马邑、尚希庄、南周庄、安营等地的日军也都遭到了宋时轮支队的袭击。日军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专门抽出部分兵力，沿公路各段驻扎下来进行守护。宋时轮针对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又组织了多支突击队，寻机打击、歼灭敌人。由于兵力兵器均十分有限，宋时轮支队单次战斗的规模都不大，但活动频繁，一度切断了日军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延缓了日军兵员、弹药、给养的运送，对配合支援友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时轮支队的抗日活动引起日军高度重视。自1938年1月上旬起，日军连续三次以2000—3000人的兵力对其发动“围剿”，但均被宋时轮以灵活战术所击退。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0月至

1938年5月，宋时轮支队在同蒲线以西、京绥线以东，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击毁日军汽车390余辆，歼灭日军2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000余件。打击敌人的同时，宋时轮支队自身也得到了扩充和发展，扩编为3个营、1个骑兵大队、8个挺进队（连级），总兵力达2000余人，成功创建了雁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黄埔学长、第120师副师长萧克对宋时轮开辟雁北根据地给予了很高评价：“宋支队在雁门以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大同、岱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引起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分子的极端恐慌与仇视；引起全国军民无限的同情与赞扬……他们屹立于敌人侧后方，成了被敌人摧残的千百万同胞的灯塔；在敌人侧后方占领巩固的阵地，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

1938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从华北山地进入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从山地到平原，失去了可资凭借的有利地形，日军武器装备的优势大幅度提升，这对于本身就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冀东平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地

带。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首要谋取的目标就是冀东。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一步加强对冀东的控制，铁路、公路、电报、电话网络相继建立，军事据点不断强化。进占冀东，不仅可以解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当地同胞，扩大敌后游击战争范围，也必然对华北日军形成一定牵制，对于正面战场友军而言，亦是一个相当有力的策应。故此，毛泽东提出，红军可以派出一部兵力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1938年4月，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0师派宋时轮支队东进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挺进冀东。5月，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6月8日，第4纵队集中于西斋堂，誓师东征。随后，部队挺进冀热辽长城内外，当地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日军惊呼“延安触角伸进热河，令热河行政无法行使”。

7月6日，在第4纵队的大力配合下，中共冀热边特委决定发动暴动。饱受日伪蹂躏的广大群众对于武装暴动反应热烈，参与者逾20万，范围波及整个冀东地区，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来势之猛，大大超出组织者的预料。暴动武装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日伪政权，先后解放乐亭、

宝坻、平谷、蓟县、迁安、卢龙、玉田等7座县城和广大村镇，并初步形成了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然而，冀东地区是华北日寇的核心区域之一，八路军第4纵队的东进和人民群众的暴动洪流，引起日伪的极大恐慌，日军连续向第4纵队发动袭击；另一方面，暴动武装尽管数量庞大，却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秩序混乱，纪律性差，没有形成整体战斗力。特别是冀中在燕山山脉以南全部是平原，缺乏地形掩护，面对日军的围攻，纵队损失不小。等到秋后青纱帐一倒，唯一隐蔽的屏障失去，纵队生存将更为困难。冀东暴动组织者之一的姚依林也指出：“冀东是敌人势所必争的地方，是敌人的心腹的地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任何一方面来说，敌人是不会放松这个地区的……在我们活动区域的周围，敌人开始配置了封锁线，准备着秋季青纱帐倒后的大进攻。在这个时候，用我们现有的力量，在冀东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条件都不充分。”

9月中旬，第4纵队研究认为“按现状支持下去是很困难”，应当把主力撤到潮白河以西的平西根据地，依托晋察冀边区，进

行休整、训练，明年再来。在等待上级批示的过程中，宋时轮率领部队活动于蓟县、平谷一带，再次遭到日军袭击，他本人受伤，电台也被打坏。不久，宋时轮率部撤至潮白河以西。

11月25日，中央军委致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暴动，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至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正式成立。同时，成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萧克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宋时轮为委员之一。长期的残酷战斗和戎马奔波，使得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宋时轮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几乎无法工作，经上级批准，宋时轮前往延安休养。

来到延安，宋时轮一边治病，一边参加马列学院的学习。1941年调入新成立的军事政治学院任军事教员，军事政治学院后来并入中央党校。



陈赓(左一)、宋时轮(左二)、莫文骅(左三)三位黄埔同学在延安。

令宋时轮没有想到的是，在延安，他还参与了一次与黄埔有关的活动。1941年9月，经上级批准，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徐向前和总参谋部第一局局长郭化若等人，从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和互相团结的目标出发，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筹备委员会推选吴奚如负责宣传工作，方治中负责组织工作，宋时轮负责总务工作，并拟定《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会章草案》。10月4日上午，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重庆会友陈宏谟等莅临大会。大会选举徐向前、

陈宏谟、郭化若、宋时轮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会章》，徐向前、萧克、林彪、左权、宋时轮等15人为理事，并通过《致蒋介石校长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宋时轮和战友们一起迎来了这个激动万分的时刻。

解放战争期间，宋时轮参与指挥了津浦线和鲁皖苏豫地区系列作战，以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其间，还曾担任过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执行处处长。■

黄埔老兵苏长禄：国家兴则百姓兴

□ 肖燕萍

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有一个幽静的村庄叫赤马村。盛夏时节，村庄荷塘里荷叶田田，荷花从叶间探出了脑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荷香。距离荷塘百米开外，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苏长禄就居住在其中一幢小楼里。

苏长禄，1921年11月出生于云南玉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成为黄埔军校五分校16期学员。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老人，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如今，在家乡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安享晚年。

百岁高龄，保持锻炼好习惯

在赤马村见到苏长禄时，他正在移动着一个四角“拐杖”，在村子里散步。虽然是夏天，苏长禄仍然戴着一顶写着抗战胜利73周年纪念的棉帽。

苏长禄喜欢打麻将，他经常到大营街找老朋友们打麻将、唠家常。一年前，他在家门口摔了一跤，后来躺在床上养了半年，再次站起来时，只能依靠这“拐杖”行动。腿脚没有之前利索，苏长禄便没有再去逛街、打麻将。可他依旧保持着运动的习惯，



/ 苏长禄。

每天早、中、晚，他都要在村子的附近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和乡亲们聊聊天，讲讲自己长寿的秘诀。

如今，苏长禄垂垂老矣，但聊起往事仍然思路清晰，眼里放光，跟着苏长禄的回忆，我们走进了他的那段烽火岁月。

抗战爆发，放下笔扛起枪

1921年，苏长禄在赤马村一户人家出生，家里十兄妹中，他排行老二。

苏长禄回忆说，那时，玉溪

盛产石灰岩，人们烧石灰卖，村子里的百姓安居乐业。由于祖父曾在满清做官，因此家境殷实，幼时的苏长禄得以在学堂上学，他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稀有的文化人。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也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的罪恶行径，让远在云南边陲的中华儿女也奋起抵抗，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那一年，苏长禄16岁，正在上初一，他跟着学长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也就在那年，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抗日。“那时要3丁抽1，5丁抽2，我家有5个兄弟，我和老三都被征去当兵。”苏长禄说。

花样年华，奔赴前线指挥作战

苏长禄回忆道：“那个时候，国家贫弱，能读到书的人很少，前线的战争非常残酷，牺牲了大量的士兵和指挥官。”因抗日前线需要有文化的人，到部队后，部队举行了一场考试，苏长禄顺利地考入第1集团军干部训练班步兵科，该校归黄埔军校五分校管理。

原计划3年的学业，也因战争被迫缩短了。苏长禄说，在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后，前线需要指挥人员支援，他便被分配到新3军183师548团2营机枪连3排任少尉排长，奔赴江西抗日前线指挥作战。

“日本人用的武器很先进，我们用的是落后的汉洋枪，力量悬殊。我们只能挖壕沟，躲守在里面，日本人进攻，我们再出来打。”苏长禄回忆，到达江西后，苏长禄随部队在高安、奉新等地开展防御战。

“那时，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长到七八岁的孩子都没有裤子穿。那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看不到一丁点希望，不知道能活多久。”辗转在各地作战的苏长禄亲历了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场景。

在高安驻守半年后，苏长禄被分配到重庆军政部教导1团训练学生兵，这些学生兵后来被编入中国远征军，从昆明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达支援英国军队。苏长禄因体检不合格，没有随队出行。1943年，他被调到182师544团驮载连任上尉连长，驻防蒙自芷村，负责给部队运送粮食和武器。

抗日胜利，不打内战回家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国军队分数路



/ 苏长禄。

向越南北部挺进，苏长禄所在的部队也随卢汉将军到达越南。他们在法国人建造的兵营里，举行了日军的受降仪式。随后的3个月里，部队在越南进行了整编，听闻整编后的部队将开往东北打内战，绝大多数的士兵都不愿意打。

“中国人打内战，就像亲兄弟互相打，很多士兵都不同意。”苏长禄说，“我们是来抗日的，日本人打败了，我们就该回家了。”之后，苏长禄随部队返回云南，并借机留在了家乡。聊及往事，苏长禄乐观且豁达，他说，因出生在地主家庭，又参加过国民党，在之后的“四清”运动中，自己虽吃过很多的苦，但如今儿孙满堂，长寿又健康，相比以前的艰难日子，他对现在的幸福生活很满足。

信仰感召，后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长禄有3个儿子，两个女儿，如今，他和大儿子苏本鸣居住在一起。苏长禄依旧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对《黄埔》杂志以及与养生相关的书籍爱不

释手。闲暇时，苏长禄还会练练毛笔字、看看电视剧。随着年龄的增加，苏长禄的视力开始模糊，走路也吃力了，但他依旧坚持每天在村子里走走。

苏长禄说：“我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像以前偷鸡摸狗的事也没有了，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都比不了的。旧社会的人病了，都是到田埂上找点薄荷、臭叶子放蜂蜜和米汤蒸了吃，用来治病，长寿的人基本没有，现在生病都是到医院找医生看病开药。旧社会都说‘山中难找千年树，世上难找百岁人’，如今，能活百岁的人已经不稀奇了。现在村里绝大部分的人家都买了小轿车，家家住进了小洋楼，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国家强大，别人不敢欺负我们，老百姓才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的孙女很优秀，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大学毕业了，她还要继续到北京学习深造；我的孙子也很优秀，他在石林教书，前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他们回来跟我说，我支持，我拥护。”回首往昔，苏长禄对自己读到初中便奔赴抗日前线有些遗憾，但聊起自己的后辈们，苏长禄神态慈祥，目光坚定。■

他是怎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小妮

1936年春，赖坚（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以前十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福州马尾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成立于1866年，由左宗棠、沈葆楨创办，前身是福建船政学堂。学校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衣、食和住，采用英式教育，高年级还有英国籍教官授课。课程设置有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和中文，其中中文的学习内容还包括四书和古文。马尾海校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设有训育主任和学监，学校还制订了打学生手心等体罚制度。学生每日早晚站队点名，周日方可请假外出。入学后要经过3个月的甄别时期，甄别后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才能留校。之后每学期还要考试，总分数不及格者要被开除。学校分航海与轮机两科，航海科毕业后成为军舰上的指挥人员，可升职至舰长。轮机科则只能升职至大副。学校里有国民党特别党部，其成员全是教职员，学生则要毕业后才能加入。该校当时被海军中当权的福建派军阀掌握，为此，学生多是福建人及海军军官子弟，外省学生在校内则常常被歧视。



少年时期的赖坚。

在马尾海校学习期间，赖坚与同班同学何康、何进同宿舍，三人都爱好阅读进步书刊，便逐渐要好起来。1937年初，他们组成了名为“三人”的读书会，后将读书会改名为“海啸”，同学张俊奇、谭毓枢也加入了进来。同时，其他年级同学也成立了读书会，如黄汉基等人成立的“突击读书会”。那时，学校对学生阅读的书籍控制得不严，他们订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和小说，如邹韬奋主办的《抗战三日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高尔基的小说也都进入了学员们的阅读范围。此外，他们还

阅读一些社会科学类的书籍，如拉法格（法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起源论》、沈志远（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思想得到启蒙，开始认识到社会不合理现象来源于阶级剥削，对共产党及其主张有了初步了解，并向往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他们还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集成册子，办成刊物，每半个月一期，自己写自己抄，互相传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尾是我国东南重要军港，设有军港司令部、海军学校、海军练营、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和军舰、火药库、仓库等，很容易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马尾海校搬到福州附近的鼓山涌泉寺，教官借住僧房，学生打地铺。由于日机来往频繁，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敌机来了，大家立即停止学习进行躲避，等敌机走后，解除警报再复课。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都不能安静地读书，学生们义愤填膺，屡次要求到抗日前线去打日寇，但均未获准。学生们也由此对国民党的不



/ 抗战时期, 军委三局电台。

抵抗主义从不解不满到奋起反抗。为此, 他们在鼓山树林里举行抗日歌咏和演讲活动, 由开始的每周3次发展到每天晚上都举行。福州其他学校学生也来参加抗日演讲。国民党当局知道这个情况后, 专门派了一个党务教官给海校学生进行“精神演讲”, 内容是“效忠党国”“攘外必先安内”之类, 令学生非常反感, 许多学生提出各种诘问并与之辩论, 逼得这位党务教官理屈词穷, 最后不得不下山去了。

后来, 赖坚他们在一份杂

志中看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院的介绍及招生广告。“离开海校到延安去”的想法开始在学生之间传播开来。然而离开海校到延安去谈何容易, 为此, 他们费了一番心思。直接与学校商量投奔延安, 非但不被批准, 还会受到处罚。擅自离校, 在战时要按临阵脱逃处理, 这是大家不能接受的。最后, 大家商议决定以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和故意犯错误的办法“被离校”。为了做好去延安的准备,



/ 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期间的赖坚。

他们通过爬山、洗冷水澡等方式锻炼身体, 还将棉被送到裁缝铺改成棉大衣。后来,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更坚定了他们去延安的信心。转眼到了期末考试, 考场上, 谭毓枢因一点小事被学监劈头盖脸地殴打, 何康挺身而出, 一把抓住学监的手臂进行阻止。为此, 何康“成功”地被开除。其他同学故意考试不及格被学校开除。这次考试总成绩如此之差让许多老师不解。训育主任周宪章找到何进问: “你平时学习一直很好, 这次怎么考这样差?” 何进说: “我没心思读书, 我的家乡沦陷了, 我都不知道家里人是死是活, 我哪里读得下书呀!”

1938年1月3日, 赖坚与何进、张俊奇、谭毓枢以及航二班的何澄石、田里、彭协中、黄汉

基、黄炎、陶丙坤、陈光一起离开了马尾海军学校。他们身着海军军装，打着“海军学校抗日宣传队”的大横幅，敲着锣鼓走进福州城。他们时而停下来做抗日演讲，时而散发抗日传单，在福州引起轰动。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辞去两个挑夫，自己背行李，还卖掉了一些日用品作为盘缠。从福州乘船到南平，之后就开始了步行，没有钱住旅店，就借宿农户家。后来，他们在武汉见到了何康和谭毓枢，何、谭二人已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演剧队。何康还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共产党中央给他派了重要任务。另外有两位同学不愿意去延安就留在了武汉，其他人继续前行。到了西安，何进与其他同学进入了共产党主办的陕西三原县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培训结业后去了延安。赖坚则进了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了一个月后也到了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5月至11月，赖坚在军委通讯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通讯方面人才。后转战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军工部门工作，制造并组装电话机、发报机、步话机。1951年至1953年，赖坚被派往苏联学习电机、电器制造。回国后，他从事电机、电器的技术



/ 赖坚夫妻合影。

管理工作，推动了我国电机、电器的技术与开发。1962年，他调到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在“两弹”研制过程中参与“两弹一星”的中央专委工作。为此，赖坚经常到试验基地，帮助解决各种具体困难。1967年，恰逢核潜艇研制工作处于关键阶段，为解除“文革”对工厂、科研单位的干扰，他手执中央军委颁发的“特别公函”赴天津、东北进行宣读和贯彻，并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落实配套设备和新材料的研制工作，与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一起解决核潜艇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有力地保障了核潜艇的研制进度与质量。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展对导弹驱逐舰、气垫船等的研制工作，推动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此外，他对双水内冷发电机组、舰

船动力设备、秦山核电站设备的研制做了大量工作，在我国的电机、能源动力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其间，赖坚还担任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中国电机技术学会第一、二、三、四届副理事长。他还被派往越南，帮助开展电力方面的工作，并获得嘉奖。离休后，赖坚仍为我国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以及电动汽车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

赖坚始终关心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2003年以来，赖坚先后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副会长。他积极参加两岸黄埔同学交流活动。与何进多次组织两岸海军学校的同学及其家属聚会，请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观考察祖国建设的新成就，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的黄埔老师皮天钊

□ 杨大昆

皮天钊来看杨大昆

2008年10月13日上午，门铃响，我开门，见来人陌生，但有些面熟。他说：“我是皮天钊（黄埔11期），你还认识我吗？”我一听，原来是队长来了，热情握手说：“皮老师，请进。”

几个月前，通过同学联系，得知皮天钊老师在美国，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听说他要来北京。今天突然见到相别60多年的皮老师，真是意外之喜。他是在60多岁的儿子陪同下，一路打听找到我家的。94岁的皮老师来看84岁的学生，真是十分亲切！

皮老师曾任17期队副，他在我家还给17期的誉声谷打了电话。

1943年在湖南洪江，机械北学校，30岁的皮天钊是第4学生队队长，20岁的我是学生。每天早点名，晚唱歌，队长和学生天天见面。皮天钊还兼任坦克驾驶教官，我们学习坦克驾驶时，教官常在旁指点。“打野外”进行战术演习，皮队长要进行战术讲评，师生们长期接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3年5月28日，我拆炮弹信管发生爆炸，左手三个指头短



/ 杨大昆与皮天钊(左)。

了一半，皮队长送我去医院，还派两个同学在医院照顾，皮队长还多次到医院看我。

1943年7月，我刚出院，去看小河边的游泳比赛，小河宽50米，水很深。我们4队和6队先比速度，看谁游得快。当时没有秒表，就分组比赛，看谁先到河对岸，结果6队5组领先。然后比哪个队能过河的人多。由于大多数人能过河，实际上是比哪个队不能过河的人少。我当时刚出院，左手包着纱布，不能下水，就成了不能过河的一个。我

决心不当不能过河的人，以免给4队拖后腿。我左手举在水面上，活动右手和双腿，仰泳过了河。大家看我举着左手过了河都为我鼓掌。结果，4队只有梁彰德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过河。梁彰德，北平人，从小没有下水游过泳，在洪江虽也下水洗澡，但仍不会游泳。6队有5个人没有过河，我们4队得了第一。皮队长表扬我说：“你真行！”

皮天钊来看梁彰德

皮天钊老师来看我的那天

下午，我陪他去邮局给美国家中打电话，他打完电话抬腿就走，忘了拿拐棍。可见皮老师身体很好。然后，我和皮老师一同去看和我同是19期的梁彰德同学。

梁彰德夫人说：“老梁刚从医院回来，不能起床。”于是皮老师与我就和梁彰德在病床旁边交谈。

我们谈到了当年4队和6队联合演出话剧《精忠报国》的事，这是表现岳飞爱国抗敌的故事，同学李留淑演岳飞，梁彰德演岳飞的大将牛皋。由于梁彰德表演的牛皋很生动，得了个“老牛”的外号。我们越谈越兴奋，梁彰德病也好了，从床上坐起来，热烈地和我们交谈。

为结合当时爱国抗日的宣传，岳飞抗敌的故事剧《精忠报国》不仅在机校演出，还到数十公里外的洪江和安江演出。我是布景组成员，随同演出到洪江和安江，按剧情发展更换布景。

由于《精忠报国》的演出，岳飞的《满江红》词在国人中得到广泛的传唱，在抗战中起到了炮火不能起的作用：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



杨大昆(左)与梁彰德。

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后来，皮天钊老师来信说：“通过《精忠报国》的演出，我又学了岳飞的另一首词，在我一生中吟唱不已。”这首词是：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同学之间的情谊如同知音。随着岁月的流逝，知音渐渐消逝在海峡

两岸。“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每当想起这些同学，惋惜与伤感萦绕心头。

坦克教官皮天钊

1944年8月，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急需，19期装甲兵科提前毕业，由皮天钊带队，离开湖南洪江（我和梁彰德留校），前往昆明。到昆明后，毕业学生被分配到青年军207师，带参军的大中学生去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

皮天钊完成带学生到昆明的任务后回到机校，此时机校已离开湖南洪江，搬到四川潼南。1945年，皮天钊任坦克驾驶训练教官。从湖南洪江运到四川潼南的坦克有苏联 T-26B 坦克



/ 1946年在四川潼南训练21期学生用的意大利CV33坦克。

4辆，意大利菲亚特 CV33坦克5辆。皮天钊教官就在潼南双江镇的嘉陵江对岸沙滩设教练场，进行训练。

学生要学开坦克，首先要学会开汽车，再掌握坦克和汽车的不同，用履带代替车轮，用操纵杆代替方向盘。坦克转弯时，用左边的操纵杆使左边的履带减速或暂停，坦克就向左转；用右边的操纵杆使右边的履带减速或暂停，坦克就向右转。如果把左边的履带完全停住，开动右边的履带，坦克就在原地转360°。能够在原地转360°是坦克的特点。但是在原地转向时，履带和地面剧烈摩擦，把土都翻



/ 湖口兵变的主角赵志华。

起来，容易损坏履带，此种操作要尽量少用。

1946年夏天，嘉陵江涨大水，把对岸的沙滩都淹没了，坦

克驾驶教练场也淹没了，坦克停在公路上。但是坦克训练不能在公路上进行，因为坦克在公路上来回碾压会损坏路面。后来，皮天钊找到一段因改道而废弃的公路作为训练之用。

这一年，黄埔21期400多名学生的坦克训练，就在皮天钊的指导下完成了。1946年底，21期学生毕业，皮天钊也由少校升为中校教官。

在徐州初见赵志华

1947年2月，21期学生在四川潼南完成毕业分配，机校奉命离开潼南，搬至徐州。经过400多名学生的训练使用，所有坦克已完全损坏，所以搬家时只搬人员和资料。而且得知徐州有美国坦克，所以搬家时一辆旧坦克也不搬，人员到重庆乘船到南京，再转火车到徐州。皮天钊在船到汉口时，请假两星期，回湖北黄安老家探亲。

机械化学学校到徐州后，1947年3月，改名装甲兵学校，在徐州招收22期学生50名，送到成都中央军校进行入伍训练和步兵科目的训练。

皮天钊的坦克教练组在徐州没有坦克，就想到战车第1团借一辆坦克。

装甲兵学校搬来徐州，战车第1团副团长赵志华听说装甲兵学校有几个人留过洋：教育长



/ 1947年在徐州战车1团使用的M3A3美国坦克。

胡辟群留学英国，教育处长蔡清华留学法国，教官史久华留学英国。今天面前这个中校皮天钊不知道是不是留洋的。赵志华会见皮天钊，两个中校见面，讲话比较随便。赵志华就问：“你是哪个学校的？”皮天钊回答：“南京中央军校11期。”一句话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赵志华说：“我是10期的。”1935年，赵志华和皮天钊都是中央军校的学生，1936年赵志华毕业，1937年皮天钊毕业。谈起同时在中央军校上学的情形，两人越发亲近，一再握手。

赵志华问：“你今天来我团，有什么事？”皮天钊说：“我是坦克教练组的，现在没有训练学生用的坦克，想借一辆，3个月就够。”赵志华立刻就批：“借给装甲兵学校一辆M3A3坦克，时间半年。”

从此，两人成了朋友。

装甲兵学校搬到台湾

1948年，装甲兵学校迁往台



/ 1949年在台湾大肚山训练22期学生用的M5A1坦克。

湾。在路途中发现美军遗弃的坦克数十辆，皮天钊挑选了5辆搬到台湾。装甲兵学校在台湾最初的驻地是台中西屯农校，由于农校四周都是水田，坦克进出不方便，皮天钊就叫坦克开到大肚山。大肚山地面开阔，便于训练。

此时22期50名学生已在成都受训完毕，来到大肚山。5辆美军坦克是在太平洋作战的M5A1，战斗全重15吨，有两个发动机。

1949年5月至8月，在大肚山，皮天钊用这5辆坦克对22期学生进行驾驶训练和战术训练。1949年9月，22期装甲兵科50名学生毕业。大陆的22期学生已于1949年2月毕业。

1952年，装甲兵学校在西屯农校的部分也搬到了大肚山。

蒋纬国将大肚山改名清泉岗。从此，装甲兵学校在清泉岗

驻扎了12年。

1954年，台湾编成两个装甲师，赵志华任第1师师长，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士兵从大陆来台已经5年，乡愁日深。面对严格的训练，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

1956年1月，赵志华来清泉岗装甲兵学校任校长，晋升为少将。与此同时，赵志华将中校皮天钊提升为上校教官。

管学生和管士兵不一样，学生要上课，晚上还要自习。赵志华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篮球比赛，既活跃了学校生活，又增进了学生健康。9年前徐州的两个中校朋友，现在成了上下级。作为下级，皮天钊对赵志华的管理措施都积极配合。1959年4月，赵志华升为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1961年，皮天钊离开装甲兵学校，任装甲2师参谋长。

湖口兵变的主角

赵志华在湖口装甲兵司令部是第二副司令，大事有司令管，小事有第一副司令管，赵志华的事情不多。

赵志华是篮球运动员，非常喜欢蹦蹦跳跳，现在每天在这里枯坐办公室，一坐就是4年，每天胡思乱想，结果出事了。

1964年1月21日，赵志华趁司令不在，带领机关人员来到湖口基地，以“战备机动测验”为名，召开大会。

上午9点，装1师两个战车营的坦克停在大操场两边，因为是“战备机动测验”，只有坦克乘员参加，后勤人员都不在。战车营的人员从车上下来，排队站在中间，前面是两个师的机关人员，总计约六七百人。当时没有麦克风，赵志华叫全体人员就地坐下，开始讲话。赵志华讲话声音很大，后面的人都听得见。

赵志华批评政府贪污腐化，风气败坏，还讲了行政院长的丑事，等等。接着，他命令5营本部连连长把本部连带到司令台右侧站立，还情绪激烈地要大家跟他一起走。这使台下的人大吃一惊，这不是要造反了吗！大家都惊呆了，台下一片安静。

此时，报警电话打到蒋经国处，由于湖口距台北53公里，坦克如从湖口出发，一小时可到台

北。蒋经国立即命令空军：“轰炸机立即装炸弹，准备轰炸湖口到台北的桥梁。”电话打到蒋纬国处，蒋纬国命令参谋张慕飞守住电话，自己立即坐吉普车出发，准备阻拦湖口开向台北的坦克。

此时在湖口司令台上，赵志华向台下问：“谁愿意跟我去台北？”先后有两个人表示愿意跟赵志华去台北，赵志华叫他们二人上台站在一边。

赵志华又将第1师师长叫上台来表态。第1师师长说：“此事很大，要从长计议。”赵志华说：“我们是老朋友，你不要敷衍我。”举起手枪，对空放了一枪。第1师师长不作声。赵志华就直接喊话战车营长：“那个战车营长，你来跟我走。”战车营长说：“我不跟你走。”此话赵志华没有听清楚，就把手枪放在桌上，走近问：“你说什么？”营长大声说：“我不跟你走。”

此时，刚才上台站在台边的第二个人快步上前，把手枪抢到手里。赵志华刚听完营长不跟他走的话，一回头，黑洞洞的枪口顶在面前。接着，台下上来的第一个大个子和这个握着手枪的人一起，把赵志华押到后台去了。


台下二三十米处，皮天钊站在装2师军官队伍里，亲眼目睹了赵志华搞兵变的过程。这次事件叫做湖口兵变。

事后审查赵志华，首先查是不是共产党指使。赵志华在淮海战役中曾经被俘，当时都穿战车工作服，军官和士兵分不出来，但其实从年龄上也可以分出来，军官年龄比较大，30多岁，士兵一般只有20多岁。

但经询问，当时解放军忙着收武器，赵志华没有和解放军干部接触，就逃脱了。而且如果赵志华受共产党指使发动兵变，至少要有团级或营级支援，现在赵志华一个人单独起事，不符合共产党的一般做法。因此和共产党有关的怀疑，可以排除。

从赵志华个人身上找原因，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缺钱买房，找不到借钱门路而产生怨恨。还有就是赵志华想当装甲兵司令，但是现在是第二副司令，短时间内没有提升的希望，因而心生不满。蒋纬国说赵志华是“精神分裂，神经病”。但是，经医院检查，赵志华精神正常。结果，赵志华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个夺取手枪的人和战车营长都升了两级。

蒋纬国因用人不当，从此离开部队到指挥参谋大学去当校长，在那里一待就是18年。

皮天钊在湖口兵变两年后退役，时年52岁。当时正逢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皮天钊也当了几年企业老板，然后移居美国。

恽代英对黄埔军校的贡献分析

□ 李立

恽代英(1895—1931),青年运动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恽代英在1926年至1927年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投身黄埔军校,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恽代英既身体力行革命实践,又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生著述甚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到1927年,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先后发表130多篇文章,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新老右派和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展开猛烈进攻,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指导青年的学习、生活和革命斗争,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青年时代的恽代英积极借鉴西方先进文化,从中寻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利器,形成了初步



/ 恽代英。

的民主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后,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终身为之奋斗。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期,积极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著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恽代英的思想主张在黄埔军校时期形成体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郭沫若曾经说

过:“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二是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与战斗力。恽代英批判国家主义派、新老国民党右派的论著,短小精悍,文锋犀利,常使他的论敌十分敬畏。三是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导向性和系统性。比如,早在1922年,恽代英就提出了“纸老虎”和“真老虎”的概念;1923年10月,他写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驳斥了“农业立国”的观点,主张“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可以自存”。再比如,关于农民问题。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讲道:“‘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随后,恽代英进一步指出,广大农民“最应当渴望革命”“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当

全党集中力量专注于工人运动的时候，恽代英就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实属难能可贵！这显示了他的思想的敏锐和对中国实际的重视。再比如，关于帝国主义问题。1924年11月22日，恽代英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文中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外国势力并非不可战胜。只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并积极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注意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能够赢得胜利。“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中国青年》第54期）恽代英揭示了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这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精神条件。

恽代英提出的“帝国主义是一戳就穿的纸老虎”的论点，比起毛泽东同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早了22年，这是很了不起的。也许，相比毛泽东，恽代英的论证还不够充分，但他们的基本看法完全一致。这也说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概括了革命先驱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

事实上，毛泽东对恽代英在政治方面的评价是非常高的。1929年党中央要求毛泽东和朱德

离开红军队伍，毛泽东虽不愿意，但又不能违背中央的决定，最后决定亲自写一封回信给党中央。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政治，两人如能前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可见，恽代英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理论水平之高。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探索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黄埔军校是1924年创办的，其办学特色借鉴苏联经验，既注重军事教育，也重视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反映了时代潮流、充满了革命气息。1926年5月，31岁的恽代英受党委派，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注：1926年3月1日，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时任黄埔军校中共特别委员会书记，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四人为委员。恽代英任教黄埔军校时，正赶上第4期学员学习，他在《第四期同学录序》中盛赞黄埔军校，他说：“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黄埔’，青年几乎没有人不希冀能够做一个‘黄

埔’的学生，‘黄埔’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黄埔’的学生人人都预备牺牲他们的精力生命，为被压迫的中国四万万人杀开一条血路。……敬祝这三千健儿的胜利！你们是‘黄埔’队伍的主力军，你们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战士！你们的胜利，便是中国全民族的胜利。”同时，他也谆谆告诫黄埔同学：“一个人便令到黄埔去了，若是他没有很合当的态度去过黄埔的生活，与很合当的方法去利用黄埔的机会，仍旧未必因为到黄埔去便能解决中国乃至自身的问题，这是投考黄埔的青年所必须知道的。”

恽代英一到黄埔军校即努力工作，积极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拟定规程、编著教材、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使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更加体系化、规范化、现代化，深刻影响了黄埔同学的革命思想、奉献精神、素质养成。这段时间，恽代英勤奋笔耕，教材和政治讲义主要有《政治学概论》《政治讲演大纲》《国民革命》《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等。主讲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国际政治，他讲授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是关于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早系统论述。这体现了恽代英知识

之广博，视野之开阔，教学研究与时局结合之紧密。恽代英以他敏锐的思想、流畅的文章、热情洋溢的演说，赢得了黄埔学子的热爱。那时，广州几乎每天都可听到他的讲演，羊城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有他的文章。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原顾问韩浚这样写道：

恽代英的才华和文采非常好，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1926年3月初的一个周末，那天是星期天，正好军校放假。我们乘船去广州，恽代英也在船上。开船不久后，有个同学说：“后天是三八妇女节，听说‘孙文主义学会’准备发表一个宣言纪念。我们是否也应该发表一个纪念宣言？”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是谁来执笔呢？这时有一个同学说：“恽教官就在船上，何不请他代劳呢？”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于是我们一起去请恽教官。当时恽代英还未吃早餐，见同学们来请，就满口答应了。他找来纸，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着馒头，就这样边吃边写了起来。从开船到广州，不过短短20多分钟，恽代英就将1200字的文章写好了，内容简明扼要，文字紧凑。我们回校后把文章交给“青年军人联合会”，当天印好就散发了出去。而“孙文主义学会”的那篇宣言，直到两天后才印出来。

恽代英的才华还表现在他的演讲上。《中国的红星》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恽抵广州以后，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鲁易，即请其往该校讲演，一般学生见恽衣冠垢敝，貌不惊人，目为乡下土老儿，不愿聆彼之讲演。不意恽一上台讲演，即彩声四起，盖恽固具有煽动天才，讲演尤为其之特长。当时武汉广州各处，革命空气高涨，演说为一种必要工具，据一般公评，当时最好之演说家，恽代英与汪精卫二人而已。恽之讲演，既受学生欢迎，校长蒋介石乃请恽在学校任政治主任教官，盖此时黄埔军校已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颇注重政治训练也。时周恩来任东江行政委员，召集东江各县县长，开行政会议，邀恽代英往汕头参加演说，恽乃离广州，作潮汕之游，除出席行政会议外，复到处作煽动演说，于是东江人民心目中，乃深印一恽之印象矣。恽在广东，因所负职务繁多，故其忙特甚，平均一日之中，须出席各种会议六七次，而来会之客，几乎座上常满，因此恽对于“向导”“中国青年”等规定之文章，常于午夜瞌睡之际，始奋其天才，振笔出之。又恽在如此忙碌之中，往往无暇整容，须发怒张，常如猬戟也。

在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军校的政治部如同虚设，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建立了政治部工作制度，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才步入正轨。“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工作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李良明、申富强《论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恽代英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他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编写、撰写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党纪与军纪》《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等教材、论文，阐发了军队建设等问题。其中由他起草刊载在《黄埔日刊》上的《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简称大纲）一文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尤为突出。在《大纲》的总纲中，恽代英认为军队的学生应该依据十个条件来计划施行政治训练，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责任，达到国民革命军的水平标准；二是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三是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本党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

宣言决议案之要点，尤其是本党党部组织与对农工运动之态度；四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控制了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了弱小民族本身的农工生产事业时，所发生的反抗运动；五是使学生彻底了解各种与革命运动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六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与问题；七是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努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八是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九是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与军事锻炼，对于革命意义之重要；十是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以上十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就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所要达到的总目标。

恽代英在大纲的总纲开头就明确指出：“我们国民政府创立这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目的，是要完成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使命。所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一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下列遗训为最高原则。”（《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李良

明编辑《恽代英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就是说，黄埔学生必须服从总理遗训，自觉认识到开展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还强调黄埔学生服从党章和军纪的重要性，懂得服从是对革命军人的必然要求。他说：“一个革命党员要为革命的利益牺牲所有的个人自由，在军队组织上说，把他的自由献给军队，在党的观点上说，把他的自由献给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屑遵从党章与军纪，便是叛党叛军的行为。”恽代英还在《大纲》总纲中明确要求：“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努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恽代英认为，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义，党的主张才能很好地贯彻。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工农群众，要教育官兵懂得联合工农商学各阶层群众。同时，也要让广大官兵明白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怎样打仗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是国民革命军与旧军队区别的显著标志。

可以说，恽代英是中共早期注重人民军队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早在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民治运动》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组

织作战的军队”的思想。他在文中写道：“时机危急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这是中共领导人最早阐述武装斗争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到黄埔军校工作后，恽代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一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军队、群众，……使武力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应该组织学生军，编练农军。”在此期间，恽代英撰写了大量教材和论文，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设，特别是人民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一是“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二是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三是军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四是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四是军队要谦虚谨慎，反对暮气和骄气。恽代英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论述，使我党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更趋完善，他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主持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工作，培养军事政治人才

1926年11月，恽代英奉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

1927年2月12日，恽代英亲自主持在两湖书院大操场举行的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员和首批女生队的开学典礼。他说，女生与男生一样，要学习军事理论课，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中勤务令》等，他还制定教学方案，为女生队开设了《妇女解放运动》《世界妇女运动史》等课程。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将武汉分校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恽代英和谭延闿、邓演达三人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工作。由于谭延闿是武汉国民政府负责人，邓演达同时任武汉方面总政治部主任及农民部部长，恽代英成为军校内国共两党合作时的主要负责人，实际主持军校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力量与影响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所以，军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积聚武装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恽代英亲自抓军校政治工作，他每周要集合全体学员训话。他说，学生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要学习先烈不怕牺牲为革命奋斗的精神，要以俄为师，彻底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强调：军事斗争与宣传斗争要结合起来，要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奋斗，要使革命武装成为人民的武装。恽代英也很重视军校政治大队女生队的教学与建设工作，他指出：“军校成立


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

在党内，由恽代英、陈毅、施存统组成中共武汉分校党委（陈毅任书记），领导全校的党团工作。在黄埔军校和武汉分校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恽代英对两校的军政建设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在武汉工作期间，恽代英在国共两党中都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1927年3月，恽代英参加了反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被邓演达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常务委员。4月4日，被毛泽东聘请为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教员，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4月14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恽代英被委任为省政府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4月27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5月，鄂军独立第15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恽代英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将武汉分校几千学生改编成中央独立师，侯连瀛任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配合叶挺部队，英勇

反击叛军，巩固了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7月20日，恽代英主持全校师生大会，这也是他在黄埔军校主持的最后一个会，他向全校同学宣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至此结束了，并勉励同学们：“勇敢抬起头来，无论环境如何险恶，终有一天会雨过天晴，革命一定会成功的。”7月23日，恽代英结束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工作，离开武汉抵达九江，是八一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期间的思想非常丰富，形成了一些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观点主张。这些观点主张不仅为军校政治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一代英杰、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黄埔军校杰出政治教官恽代英在狱中留下豪迈诗篇，于1931年4月29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周恩来对恽代英曾高度评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浅谈中央军校人事训练班

□ 单补生

人事一词是指人类在社会里所有的活动，也就是“人”与社会团体发生的“事”，事是人类满足欲望的一切方法。我国自古建国以人事、经理、教育同为必备的三大要素。此三者，尤以人事为首要。圣贤云：“为政在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云“人存则政举”“有治法，无治人”，由此可见人的重要了。为什么圣哲谈到“为政”，把人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任何法令制度，其运用可以说完全靠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人尽其才，其意义可谓得一良吏，胜于十万甲兵！是人事之良否，影响于国家盛衰和与日俱进，历史证明以军人人事为尤甚也！

民国军队人事制度

我国军人人事，在清末及民国初元，虽亦粗具规模，然所订法规，枝节琐碎，无相互之联系与一贯之精神。时各地军阀，视军队为私有，割地称雄，一切人事全凭个人好恶进退。从士兵以至将校，自军属以至军官佐，每有终其职而不一迁，或终其身而不一退者。亦有学识浅薄，而一年数晋其级，或同级而数易

其职者，此皆才与位不相称，资与职无所关。其重要者，如补充退役等项，尤多缺略未备，且不能随时代而改善，因之积久越散漫而越紊乱，军人之进退没有依据，身份也缺乏保障，军队素质日益低落，国内现象亦显不安定。

1928年北伐初定奠都南京之始，国民政府恪遵孙中山建国大纲，筹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建立五权宪法之基础。1929年6月，中央制定治权行使之规律，其第三条：“在考试院成立以后，一切公务员之考试权，皆属于考试院，其不经考试或不遵考试法所特定之办法，而行使考试权者，以越权论；考试院不提出者，以失职论。”考试院是最高人事机构，下设考选委员会，掌理考选行政事宜，设铨叙部，掌理铨叙事宜。国家设官分职，以文武之区别，就纵的而言，文官特任以下分简任、荐任、委任3等。简任8级，荐任12级，委任16级，共36级。军官分将官、校官、尉官3等。每等分上、中、少3阶，共9阶。就横的而言，文官分行政司法官等项，武官分军官佐等

项，此文武官大致相同也。

建国必建军，建军当自整理人事开始。1934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施行《陆军人事法规》等条例细则，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总掌全国陆海空军官佐人事业务（任免考核，进退升调）。就军官一方面言之，军队有陆军、海军、空军之别，军官官阶上所冠名称，亦随之而异。其属于陆军者，就兵科言，分宪兵、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均谓之军官；就业科言，分军需、军医、司药、测量、军乐，均谓之军佐。但军佐名称，最高者曰总监，视同中将；次曰监，视同少将；再次曰正，分一二三等，视同上中少校；再次曰佐，分一二三等，视同上中少尉。其属于海军者，除海军军官及轮机军官外，余则分造械、造舰、军需、军医、测量、航务、电信各业科。军佐其名称亦分为监、正、佐各等阶。其以属于空军者，军官不分兵科，统于官阶上冠空军二字，如空军少尉、空军中尉等；军佐则分机械、军需、军医，其名称亦与陆海军同。此外，还有军属，系指军用文官法官、军用技术人员而言，其阶级



/ 同学录书影。

则比照军官佐任用之。此为军队设官之大概情形也。其他如部队师长以下，旅团营连排各长，机关中之部长，及厅司处科各长或员，均谓之军职。军官自学校出身以后，必叙任以官阶而逐级递升者，大概表示其资历之属于某种程度，而确定其身份也！有某阶官，即得任以某阶职者，军官对国家应尽之职责也。有某阶职必须以某阶官任之者，求其才能与职相称也。故欲为整理军队计，必先从整理军队人事入手；人事云者，盖指从服役以及叙官、任职、考绩、惩奖、抚恤诸事务而统言之也。铨叙者，实为人事之一大部分，不曰人事而曰铨叙者，举一以概其全也！设铨叙厅以监督管理其事者，也如同文官所应通晓者，逐项讲明于后，凡单称陆军者，大抵海空军属之；单称部队者，大抵机关属之；单称军

官者，大抵军佐与军属属之；盖国军以陆军为主体，而部队与军官，又为一般军队之主体也。铨叙厅以公、平、明为着眼点，修订各种人事法规，确定人事制度；任免考核，权为中央，进退升调，悉有准则；如果能善于动用，切实推行，不仅纳入人事于正轨，奠定国军之基础，且可使国家济于强盛之域。孰料，七七事变爆发，因全国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致使人事制度推行受阻而缓慢。

人训班同学录

几年前，笔者在旧书店购得一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人事经理训练班第一期同学录》（又名：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附设人事经理训练队第一期毕业同学录），此录为纸质32开42页，1948年2月台湾出版。内有

总理遗嘱，蒋中正肖像，校旗校训校歌，青年守则，军人读训，班主任孙立人、副主任唐守治题词，照片22张，本班教职员简历册及同学名录。

关于本班成立之经过，照录副队长刁文斌代序详述如下：

建国必先建军，建军必先建人，而人事者，驭人用人之先驱也；盖任何组织，无不依人而成，而业务之推进，亦无不仰赖于人，即所谓“为政在人”是也。我国以往对于军队人事之管理，从未臻合理合法之境域，因而人员数字亦乏正确之统计，以致一切补给不能配合实际之需求，于是各种业务之推行，均受极大影响；我最高统帅洞悉此弊，以其关系建军前途，至大且巨，必须急图改进，以为一切军事行政改革之先声；特令国防部拟具合理



/ 同学录书影。

之文案，经召集陆海空联勤各有关单位，几经研讨，并采纳美国顾问团之建议，历数月之郑重考虑，再三磋商，乃创立现行“人事计算制度”；为求推行顺利，复命各部队遴选干才，分赴南京嘉兴两地，由军官训练团施以人事计算之训练，俾成改进部队人事经理之基干；我司令部孙公立人，鉴于新军未来使命之重大，特令既205师，保送现职军官40员，前往接受人事经理之训练，以备在台湾部队先期实施新制，而作全国军队之示范。

此40员军官，于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结业后，应美国顾问团之建议，继续留训，加强造诣，以养成推行新制之教官；举凡前后留团三期，需时三阅月，迄12月10日，始学成返台；并另由顾问团建议国防部，选派在团任教之教官6员，同来本部，专任新制教

育之指导。诸指导官曾先期接受美顾问新制之训练，复在团任教四期，不惟学术优良，且教育经验充沛。到台后，即协助本队长胡序荃，着手成立本班；并区分人事、经理、财务三组，各组教官亦夜以继日，努力研究，准备教材，不遗余力，热诚可佩。嗣以胡队长因公他调，继由龚厚齐接任，龚队长为人坦率，鉴于本队初创未就，即以大刀阔斧之精神，披荆斩棘，排除万难，未几使本队一切事务渐入范畴，旋即开始教育。

第一期：训练对象为部队长，先就第四军官训练班校尉两大队学员共427人，施以新制训练，因各学员均非专门业务人员，仅摘要讲述，使对人事经理财务获得基本常识，俾得协助新制度之推进为目的，故教育日数仅为一周，自1947年12月22日起至26日止。

本期为第一期：训练对象为业务人员，系由陆训司令部及第四军官训练班，与青年军205师，各级业务官佐中，选调来班，共计145人。教育日数为三周另四日，自1月5日开始，至29日结业；训练课目，除一般课程讲授外，复区分专门课程，联合作业，及问题讨论研究等；故所授课目较前为多，对于管理亦极严格，各同学全以此项新制度，与个人切身业务攸关，学习情绪特别浓厚；各课问题研究，更不厌其详，探源溯始，必求根本了解而后止；于是深获各级长官与美顾问好评，誉为“成绩最优之队”诸同学在队受训既有如此优异之精神，毕业回部，执行业务，亦必谨慎努力，使新制得以顺利履行，良堪嘉慰。诸同学相处一堂，朝夕切磋，怡怡融融，方幸其乐无涯，诂时不我待，骤赋骊歌；以其时间虽暂，但同为推进新制之干部，彼此休戚相关感，今后执行业务彼此联系，极为重要，遂有印制同学通讯录之议。文斌与诸教官同在首都受训归来，又委充本队副队长之职，对本班情形较为熟悉，诸同学筹制斯录，索叙于余，爰将本班成立经过，及两期训练情形略述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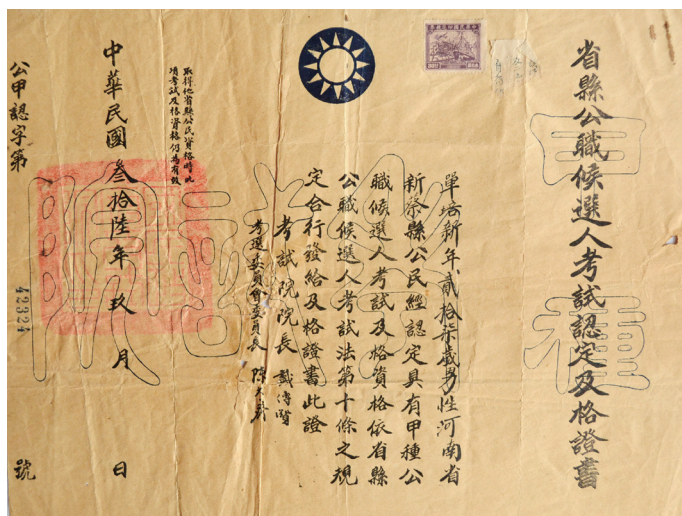
顾新制，为划时代之创举，良机难再，深望诸同学，今后各自努力，坚守岗位，重理智，遵法规，更本分权负责之旨，精神



/ 退役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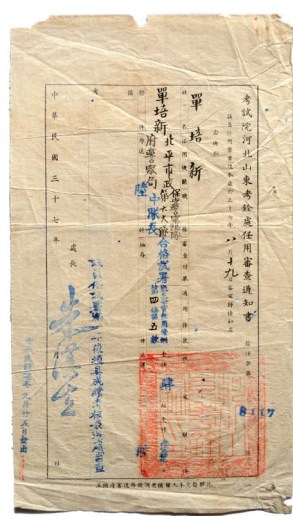
/ 中央训练团毕业证书。



/ 甲种公职候选人认定书。



/ 派令。



/ 考铨处通知书。

联系，技术互助，纠正昔日人事经理财务，预算互不衔接之积习，来完成推行新制之神圣使命，为部队之师祿，树建军之新猷，以达成整军建国之重任，有厚望焉。

刁文斌，1948年1月29日叙于台湾凤山，人事经理训练班队本部

党政军人训班沿革

党政军人训班，全称中央训

练团党政军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1940年派遣欧美人事制度考察团回国以后，国民党认为要建立中国人事行政制度，首先要加强对办理人事业务人员的领导，因此铨叙部就计划训练人事人员。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在中央政治学校附设人事行政人员训练班，就中央与地方各机关人事行政人员选调受训，并奉蒋介石命令对于直接主持各

机关之人事行政人员先行调训。自1941年6月开班，至1942年3月共毕业4期，每期训练时间一个月，班主任由铨叙部长兼任，班址设在重庆南岸小温泉仙女洞，距中政校本部约10里左右。凡在人事行政班结业的，特准视为中政校毕业同学，可以参加各地同学会活动，由中政校毕业生辅导处领导。以后改名为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附设在中央训练团。



委任状。

同时，并确定中央各院部会人事机构其主管人员，应由铨叙部考核选派。1941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制定党政军各机关人事机构统一管理纲要，其丙项第六条规定“关于党政军各机关人事管理人员之训练，由考试院负责统一办理，并限三年内办理完竣”；意义至为重大。

考试院根据前项纲要规定，为达成党政军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目的，先后召集筹备会议两次，拟定党政军人事管理人员训练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并以戴传贤、翁文灏、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陈果夫等21人为委员，以戴传贤为主任委员，于12月2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以军事部分人事管理人员之训练，已于中央训练团设班办理，遵照蒋介石指示，名为第一训练班；其党务及政务机关人事管理人

员之训练，仍由中央政治学校办理，名为第二训练班，均于1942年12月开始训练。并决定在1943年6月以后，中央训练团能容纳时，再将第二训练班移入，与第一训练班合办。至1943年4月，第二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即照原议准备合办事宜。7月17日，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修正党政军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组织规程。8月1日，班本部正式成立。9月，合并训练开始，统一训练，至此始名实相符。又教育委员会委员亦有更迭与增加，原任吴思豫、张嘉璈、傅秉常三委员，因本职变更辞职，国防最高委员会另派林蔚、曾养甫、吴国祯三氏接替，并加派王东原、张道藩二氏为本会委员，将原定委员名额21人增为23人。

溯人事管理人员之训练，关于军事方面，曾在南京举办3期，在中央训练团第一训练班举办者亦有3期。关于政务方面，曾在中央政治学校附设人事行政训练班，举办4期，第二训练班继续举办两期，兼及党务人员之训练，故在合并以前军事与党政实各已办6期，合并后的第一二两期，即以第七第八期称之，以示统一。至此前各期，虽均系分班分地办理，然自遵奉统一管理纲要规定，统一办理以来，两班之教育方针，形式内容，即已趋于一致，再推至于战前南京

之军事人员训练，中央政治学校之一般人事行政人员训练，其目标与精神是一致的。抗战胜利以后，中央及地方各机关人事管理机构亟须普遍设置，人事管理人员更须大量训练储备，始能适应需要，乃于1947年1月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召集第九期，是为还都后之第一期。

国民政府在人事方面制定的法令有二三百种，办理人事业务的过程约可分为三个步骤：一、储才；二、任用；三、人事管理。1945年抗战胜利还都南京，考试院又把考试业务中的普通考试和以委任职任用的特种考试，下放到铨叙处。原来的铨叙处是部属机关，因增加了考选委员会主管的考试业务，须受部、会双重领导，感到名不副实，故改名考试院考铨处，隶属于考试院，管理委任职的铨叙和普通考试业务。国民党时期的考试制度，分为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三种。高等考试及格，以荐任职任用；普通考试及格，以委任职任用，录取名册送由铨叙部分发各机关，遇缺尽先补用。特种考试，多由各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请准举办，及格者按章任用。^[5]

本文参考资料：《陆军人事法规》《陆军官佐服役任免调补条例》《陆军军籍条例》《陆军官佐各级进阶规则》等。



1926年4月13日,唐生智派代表 前来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1926年4月13日,唐生智派代表前来黄埔军校参观,并与校方领导举行会议,联络关于北伐事宜。唐生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曾历经和参与过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湖南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深刻的影响。作为国民党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他在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没有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解放军作过战。在这里,本文仅从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中摘取几个片段加以归纳整理,呈现给读者。

建立“佛教军”

1923年12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任命唐生智为湘南善后督办,率领湘军第4师驻扎衡阳。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唐生智遂决定采取“南亲孙中山、共产党,北拂吴佩孚、赵恒惕”的政策。他在衡阳办有军官讲习所,大力培养基层官佐,提高部

队战斗力。当时他兼任湘南督办,他将水口山铅锌矿矿产收入的大部分充作军费,并从汉阳购进大批枪械装备自己的部队,扩充实力,逐步脱离了赵恒惕的控制。

正当唐生智积极筹划整军施政,励精图治之时,一位佛教居士来到衡阳。这位居士名叫顾畴,字伯叙,号子同,法名净缘,笔名谢畏因,1889年生于江苏淮安县。

顾畴幼年曾拜名士傅梅根为师,学习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并学习了佛家经典。长大后顾畴游历各省,结交仁人志士,先后在武汉、东北、湖南等地经营工业、金融、矿产,谋实业救国,并赞助革命志士从事反清活动。

1922年,顾畴与梁融觉(即梁壁垣)、李又岫(李淑一之父)等在长沙结社,创办“二学园”,用以研究佛理,教化众人。1924年秋天,唐生智借赴省开会之机,前往“二学园”听顾畴宣讲佛学,对顾的学问深为折服。据说唐生智请顾畴在长沙饭店吃饭时,出了很多问题,向顾畴请教,顾畴却笑而不答。唐生智不解其中玄妙,告辞后向“二学园”中的人

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顾畴认为他“满脸色相”,不像是专门来求教佛法的。唐生智闻言大惊,因为他当天晚上确实有别的重要约会,所以在交谈中不时流露出“着急的神情”。唐生智于是放弃当晚约会念头,再次走进“二学园”求见顾畴,专心求教。两人交谈甚欢,从此成了好友。在顾畴的引导下,唐生智笃信佛教,取法号“法智”,诚心学佛修身。

唐生智学佛后,“精神面貌一新,气质大变”。不久,唐生智便接顾畴到衡阳,并亲率部下诸将刘兴、李品仙、何键、周斓等人拜顾畴为师。

顾畴教导唐生智:一个学佛者的人生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应该“无我为人”“为众生造福”,佛门弟子需要遵守“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淫邪、戒妄语、戒酗酒。他还根据唐生智是名军人的特点,把“戒杀生”与军人的打仗联系起来,认为佛家的“戒杀生”的意思是“戒妄杀”,即不杀无辜,对于盗贼土匪,你不杀他,他就要危害众生,使人不能成佛。他还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自由、平等、博爱”是一回事，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

唐生智听后恍然大悟，认为要首先自我革命，方能为人民大众做事，方能改造客观世界，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而改造自己。唐生智还认为：“佛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也是要解决人民大众的生老病死问题。真正学佛的人应该是积极地为人民大众，是应该安心在般若上，而尽自己为人的责任。”不久，他就把自己对佛学的领悟和解释用来治理军队。他在1925年末、1926年初出巡湘南各地时，带着顾畴，到处给部下讲经说法，散发宣传佛法的传单，同时将顾畴编的“佛学大纲”发给军官，到处张贴宣传佛法的白话告示，号召大家“莫妄作、莫乱想、不造罪孽，省下精神，念阿弥陀佛”。

在进行了一段佛法教育后，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让所有的官兵一律受戒。1926年1月7日，唐生智令全体官兵摩顶受戒当佛教徒，所有士兵，均发愿学佛，受三皈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酗酒）并发纪念章，一面刻一“佛”字，一面刻“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八字。然后在各个营房设置佛堂，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要求官兵依照“佛法”首先做到“无我”，

“革自己的命”，忘却“私念”，牺牲个人，然后才能“为人”，“救人救世”，“为人民大众做事”。阅兵的时候，唐生智的部队都会吹响法螺，高声颂扬佛号。唐生智以佛教治军，“实以此系军心、系民心，稳定乱世”。不久，唐生智得到了“佛教将军”的称号。

从此，唐顾二人相交一生。唐生智多次请顾畴从政，均被谢绝。唐生智出资帮助顾畴办了两湖佛化讲习所、上海威音佛刊社等机构。顾畴后来襄赞唐生智北伐、抗日，后又在唐生智的家乡东安同办耀祥书院、耀祥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顾畴追随唐生智积极与共产党人合作，从事“和平自救运动”和策反工作，遭国民党桂系逮捕，拷问摧残，幸免于死。1950年定居上海，由唐生智与周恩来提名，出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四度武力反蒋

早在1926年北伐军攻克两湖初期，蒋介石便担心唐生智势力膨胀，便指使亲信对其进行打压、掣肘，对此，唐生智深为不满。1927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武汉国民政府“分共”后，任武汉国民政府第4集团军总司令的唐生智称“长江各省之痛苦，皆中正所造成”，积极主张讨伐在南京的蒋介石。8月，唐生智率部东征，令第4集团军夹长江东

进讨蒋，进至芜湖、合肥、蚌埠一线，还宣布“以前蒋中正所委命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均应无效”，在占领地区安插己方人员，想将安徽完全收入自己囊中。当时，正值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斗争激烈，其指挥的部队在徐州被北洋军打败，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把军事失败的责任推给部下王天培，以“与唐生智勾结”等罪名予以枪决，并宣称“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唐生智受到排挤。唐生智表示，如南京方面对他不满“即武力周旋”，结果被控制南京的桂系下令讨伐，唐生智被迫步蒋介石后尘，宣布下野，远走日本，其大部分部队被桂系“收编”。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唐生智由日本回到上海。1929年4月，蒋桂战争起，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5路军总指挥。唐欣然接受，并携150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以“打倒桂系，返回湖南”为口号，一举收回对旧部的控制权，接收了驻扎在平津的旧部。不久，蒋冯战争起，唐生智又率领部下进入河南，打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蒋介石随即让唐生智继续进攻，将西北地区收入囊中。唐生智知道这是蒋介石挑动他和西北军互相厮杀、从中渔利的伎俩，一面婉言谢绝，

一面通过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改组派”和各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组成“护党救国军”，秘密准备倒蒋。1929年12月1日，唐生智等70余名将领通电反蒋。对此，蒋介石调集军队进行讨伐。原与他商定共同倒蒋的各地方实力派均按兵不动。尤其是阎锡山等人禁不住蒋介石的威逼利诱，竟放弃与唐生智的口头约定，调转枪口，出兵攻打唐生智。阎锡山改变态度，立刻引起全局的变化。原来在唐生智的通电上列名的将领，纷纷发表声明，否认他们参与反蒋，连唐生智的老部下何键，也否认他曾同意列名反蒋，反而列举唐的罪状，通电声讨。唐生智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宣布下野。1930年1月13日，唐生智化装逃至天津租界，又流亡香港。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联合冯玉祥的东北军、桂系和地方实力派，掀起反蒋的中原大战。3日，唐生智在海外电贺阎锡山就职。5月21日，唐生智自香港到天津。27日，唐生智赴石家庄谒阎锡山，被阎锡山委任为“第六方面军总司令”。由于各派之间的不信任，加上反蒋部队很快崩溃，唐生智并没有机会施展出其军事指挥才能。中原大战结束前，唐生智已经被迫流亡海外。

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

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唐生智积极参加，被推选为广州非常政府国府委员及军委三常委之一。广州政府成立后，首要的问题是整顿武装，准备与蒋军作战。但是，参加非常会议的人各怀异志，不能形成团结的力量。他们的口号虽然是“救护党国，打倒独裁”，但他们都只顾本派和个人的私利，尽量捞取更大的权力。在这个联盟里，谁的实力大，谁就指挥一切。唐生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但手中没有军队，于是提出要收编旧部。他于9月以湖南宣抚使名义，携带巨款跟随桂系军队进入湘南，收编民团和小股部队，委任了一些团长、县长，一时间湘南各县军政皆为其所控制。何键惧怕唐生智分化他的部队，急忙把原唐生智的部下调开。蒋介石也唯恐何键与唐生智重新联合起来，急忙派刘文岛、顾祝同、周佛海入湘。9月6日，三人与何键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顾祝同部固守衡阳，必要时从江西抽调3个师入湘助战。何键的湘军集中于长沙附近，名曰保卫长沙，实际是将桂、粤军与何键部隔开，防止他们串通。又决定把唐生智派到何键部的代表扣押起来，广东问题未解决以前不予释放。9月13日，蒋介石又令何应钦

率蒋军一部入湘增援。何键为表示对蒋介石忠诚，特电南昌行营，欢迎何应钦入湘。结果，双方部队在衡阳以南地区形成僵持状态。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同时唱出和解的音符。蒋介石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然后“以中委资格辅佐国是”。唐生智被选为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为一致对外，终于与蒋携手言和，但始终不参加蒋介石的反共、剿共活动。

领导参与湖南和平解放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力，开始暗中与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1948年春，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就和唐生智取得了联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问候，希望唐生智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力。11月中旬，唐生智在去南京见蒋介石途经上海时，通过其弟唐生明的关系，会见了中共上海市委与民革领导，表示：“决心拥护共产党，把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作为对人民的一点贡献。”

1948年底，唐生智返回家乡湖南东安，立即着手联络国民党地方进步势力，鼓励和支持他们高举反战求和的旗帜，引导各界人士走团结自救的道路。他还着手建立写作班子，连续在湖南各报刊上发表反战求和的文章，

号召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民主与和平。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渡江南下。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国民党湖南省参议会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后改名为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大团结”“实行自保自卫”等主张和口号，并公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刘寿祺与唐生智联系，请他出任湖南省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与白崇禧的“联省自治”作斗争。

4月29日，唐生智来到长沙，程潜、陈明仁等率领省府文武官员及各人民团体代表共约300余人冒雨在车站迎接。5月2日，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了省会各团体各界人士的欢迎会。唐生智在会上，号召全省人民为生存而团结起来自保自救。会议根据唐生智的提议，决定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改组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仍推举唐生智为主任委员，计划在各地都建立自救会组织，并掌握地方武装。唐生智向程潜推荐了一批旧部担任县长、专员、司令等职务，以便在湘中、湘南发展地方武装，准备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的后勤补给线和退路。

鉴于形势险恶，1949年5月底，

经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商定，唐生智暂避故里。回到东安后，他积极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准备自救起义。唐生智直接安排旧部通过永宝警备司令部联络和组织武装，经常招集地方武装、保安队、警察局、路警、矿警的一些头目于家中，反复给他们讲解形势，指明正确的道路；又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与湘南的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互相配合，为解放军就地全歼桂军作好准备。在唐生智的策划和组织下，湘南的地方武装纷纷袭扰白崇禧的部队，截断了桂军的后勤补给线，拖住了桂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有效阻截了桂军从湘南溃逃广西的退路。


湖南解放前夕，以金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湖南地方代表团于8月初进行了谈判，唐生智派弟弟唐生明为代表出席。4日，由程潜与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领衔，湖南30余名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由唐生智领衔，湖南100余名各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湖南和平起义，并呼请西南、西北速采取一致行动。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接着，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唐生智被推为委员会委员。

策反旧部，组织地方武装一直是唐生智争取实现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重点。唐生智首先做交警总队周伟龙、黄克虎的工作，策划交警总队起义。唐生智特意

找衡阳警备司令欧冠谈心，要他对共产党重新认识，对大局的变化作好思想准备。此后，唐生智还经常派人与欧冠联系，对他进行启发和教育。9月初，唐生智的旧部，湘桂边区绥靖司令、新7军副军长曹茂琮前往东安。唐生智当即作了曹的策反工作。在唐生智的循循劝诱下，曹茂琮表示一旦时机成熟，立即通电起义。在组织新7军指挥部时，曹茂琮按照唐生智的意见任命熟人担任部队中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大多是唐生智的旧部，也是曹在衡阳军官讲习所的同学和好友。

9月17日，白崇禧派人以“搜匪”为名，进驻离唐家只有8里地的芦洪司，层层包围，搜捕唐生智。唐生智白天躲藏在妹妹家的柴堆中，依靠其子与外界联络，只有夜晚才能出来活动。白崇禧部没有抓到唐生智，便将唐生智的妻子霍福光和6个儿女抓走。他们饱受流离、监禁、折磨之苦，在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方回到家乡。

唐生智在东安迎接了家乡的解放后，仍继续在湘南做策反工作。11月，唐生智配合中共地下党成功策反了湘南国民党军欧冠、曹茂琮部起义，其中仅跟随欧冠一道通电起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人员就多达2万余人。

1950年，唐生智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 (四)

□ 熊子杰

第四章

台湾有些人以“番薯”代表他最本土，其实“番薯”是外来货，代表外省人的“芋仔”才是真正最本土的

在台湾，有人喜欢用“芋仔”（以闽南语发音）表示外省人，指1949年随国民党当局迁来台湾的人及其后裔；用“番薯”表示所谓的本省人，指1949年前就在台湾的人及其后裔。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分化台湾族群以谋取个人政治利益。因为在台湾闽南人占大多数，如你能分化台湾族群让大多数闽南族群支持你，你就能谋取个人最大政治利益。这族群分化手段选举时很有用，尤其是李登辉及陈水扁主政时期，族群冲突及矛盾最烈。不同政治主张的，在外吃饭、坐车甚至在家都会一言不合吵起来，有的还可能动粗打起来。2016年6月，台湾高雄有一位洪素珠就用言语羞辱一些外省籍老先生，说他们是难民，要他们滚回大陆去。这种偏激言论在台湾是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最后洪素珠弄到家都不敢回。这些不入流的

族群分化者事实上只是个棋子，真正危害台湾人民的是那些野心政客，尤其是李登辉及陈水扁之流，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撕裂族群，挑拨两岸人民情感，甚至不断“去中国化”（文化），造成台湾许多年轻人曲解两岸关系及历史，造成认知偏差。洪素珠之流就是这些政客毒化的产物。

这些政客一直处心积虑标榜自己才是最本土的“番薯”，而外省人是“芋头”，是外来的，没资格在台湾享受权利。在台湾，如果“芋仔”与“番薯”结婚组成家庭，生出来的小孩，就叫“芋仔番薯”。

以前台湾选举竞争很激烈。如果“芋仔”与“番薯”的家庭父母支持的是不同政党，那可危险了！吵架是小事，有的还大打出手，甚至还有闹离婚的。如今不会了，政治热情过了，人民素养也提高了，一个家庭父母是蓝绿，儿子女儿是橘黄，媳妇女婿可能是红白。家庭里外大家懂得彼此尊重个人立场，这种冲突新闻几乎听不到了。那些当时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离婚的、分手的，现在都后悔了，甚至有的也

复合了。

但是，这“芋仔”与“番薯”的战争是谁造成的？又为什么会发生呢？为什么要称“芋仔”与“番薯”？政治可以打混仗骗选民，但科学知识是不能乱扯的，必须交代清楚。到底“芋仔”与“番薯”哪一个才是本土的呢？

1945年日本战败，二战结束，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来台进行接收工作。由于台湾长期在日本统治之下，有些台湾人已分不清自己的祖先是谁，不过有志节的台湾人还是充满着对回归祖国大陆的殷切期望。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受到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将近60万台湾人被杀死。荷兰人压榨台湾人，是要你做苦工为荷兰人赚钱；日本人压榨台湾人是让台湾人吸毒让日本人赚钱。日本殖民统治时，只准许台湾人做低贱的工作（当然有少数台湾人卖祖求荣，可以过得好一些）；日本在台湾的建设也不是为照顾台湾人，而是为他们自己的日本“皇民”。当时，有志气的台湾人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具有强烈的祖国意识，对中国大陆、中华文化及历史等都

有高度认同感，视中国大陆为原乡，怀抱对祖国大陆的高度期待及理想。当台湾回归祖国后，这些人却立即感受到期待落空，心中理想的祖国与看到的祖国似乎有一些落差，刚接手台湾的国民政府政治腐败，让台湾人民很失望。再加上国民政府与日据时代在生活习惯及管理方式上的差异，随国民政府来台的军民与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发生严重矛盾。台湾内部常有新旧住民之间的冲突，让这些台湾人有些失望，对祖国大陆的理想、梦想开始变化、淡化。直到1949年国民党当局来台后，两蒋积极治理台湾，台湾人又重新燃起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尤其在蒋经国主政时期，积极推动台湾建设（著名的十大建设及十二项建设等）及经济发展。台湾经济发展后人民生活富裕，对政治的参与意愿提高，不断有杂音要求立法机构改选，并终结“万年国会”。最后在蒋经国主政晚期默许政治的改革开放，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

在此之前，大陆不断向台湾伸出和平橄榄枝：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提出“三通”。同日，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台湾随后也宣布停止炮

击厦门。从此，金门与厦门互打宣传弹的活动（所谓的“单打双不打”）完全停止，两岸共同迈出了和平的第一步。

1982年1月，邓小平首先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概念。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会议中说：“……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大陆主要领导人不断递出和平及友善的橄榄枝，对当时台湾的“三不政策”冲击很大，也促使来台的军民更加渴望返家探亲，乃不断向当局施压，终在1987年10月15日，当局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两岸交流的高潮。台湾老荣民络绎不绝回大陆，带着“三大件五小件”回老家探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亲人团聚故事不断上演，有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情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两岸人民交流多了，误会也就少了，人民感情也融洽了，台湾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声浪也大了，此时台湾内部却有一些政客及媒体不断以省籍分化换取个人政治及经济利益，分化族群、撕裂台湾，造成台湾内部所谓外省与本省族群的极大冲突。这种

省籍的分类是这些政客自定的，毫无法理的基础，本书第一章及第二章的文献，证实原来台湾汉人也都是外来人，甚至台湾少数民族也都是6000年前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所有台湾人都是一家人，只是先来后到之别而已，本不应分彼此。

然而，当时在所谓的外省及本省壁垒分明的情况下，台湾一些政治新贵（以陈水扁为代表）不断激化族群对立，以分化族群方式骗取政治资源，不断丑化1949年以后来台的同胞，将他们称为外省人，以芋仔（即芋头或香芋）代表外省人，将自己（1949年前到台湾的闽南人）比喻为番薯，以示自己是本土的，因为他们以为番薯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食物。

事实上，根据台湾最高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光直的研究，芋仔事实上在台湾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台湾人自古爱吃芋仔，台湾还有芋仔的化石。番薯反而是外来食物，所有名字带“番”字的食物多半都是外来的，如番茄、番薯。番薯主要来自美洲，是近三四百年前才由西班牙人在占领台湾时引进的。“番”在中华文化里是古代对外国或边境少数民族的称呼，可见番薯的字义就可证明其是外来的。台湾无知的政客弄巧成拙，谬用番薯标榜自己的本土性

及草根性。不过在日据时代，台湾人以番薯暗喻自己是台湾人，意义与此是不同的，因为这些有志台湾人不愿做亡国奴，不甘做日本奴，并无分化族群之意。

张光直副院长在其著作《番薯人的故事》中指出，植物学家早已证实番薯起源自南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番薯带到欧洲，明末时期才辗转由西班牙及葡萄牙水手传到中国。芋仔则是起源于东南亚，大约一万多年以前就见于中国南部和马来西亚等地区。

以下所引为张光直副院长所著《番薯人的故事》中的论述：

我弄不明白的是：青芋在台湾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当代的政论家却用它来象征来到台湾只有半世纪的大陆人。而番薯这个植物在台湾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却用来象征台湾本土人。

这两种植物在台湾的历史证明，芋仔才是真正本土植物，番薯反而是外来种。这些人利用“芋仔”“番薯”来分化台湾人民的情感，真是无知，弄巧成拙！

日据时代台湾人自称为“番薯仔”，是因为不当亡国奴或日本走狗，所以以台湾地图就像一条番薯自称番薯是可以理解的。如今区分“芋仔”与“番薯”，

却隐藏分裂族群的偏激意识及动机。那么，“老芋仔”是何时变成所谓的外省人符号的？为什么？

研究“老芋仔”一词的典故、缘由，要追溯到晚清时期的台湾政策，左宗棠的治台理念有宏观视野，他体会到台湾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不断上奏要求朝廷加强对台湾的建设和防卫，所以从1867年美船罗发号事件及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左宗棠特别挑选一些优秀湘军赴台治理及防卫。因此在晚清光绪年间有数万名湘军驻台，尤其从1881年起至1885年，刘璈担任台湾兵备道（实质上相当于省长）时期，整个台湾从北到南基本上都有湘军驻守，湘军官兵又多是湖南籍，也就是说有40营约两万多名湖南籍官兵驻台。

《说什么芋仔、番薯——从湖南伯到老芋仔》一文作者杨基裕指出，当时台湾人如遭受委屈或有冤情时，老人家会以闽南语说：“去说给湖南伯听！”或者说：“去找湖南仔！”也就是去找湖南官兵申冤。在晚清，一个兵都很有权威，何况是官，所以找“湖南仔”就是希望找湘军官兵帮忙申冤，这也是合理的。“老湖南仔”与“老芋仔”这两词以闽南语发音非常类似，所以“老芋仔”是当时台湾人对这些外来湘军的尊称或是昵称。

这些台湾人口中的“老湖南仔”或“老芋仔”应就是晚清时期驻守台湾的湘军，在当时左宗棠及沈葆楨两人建设台湾的政策下，一批批清末官吏中的年轻精英，经培训后，被左、沈推荐派遣去驻防治理台湾，包括沈葆楨、刘明灯、刘璈、孙开华、杨载云，等等。晚清数十年来台湾人称湘军官兵从“湖南伯仔”“老湖南仔”“老湖仔”，转变到今日的“老芋仔”。因此今日的“老芋仔”与晚清的“湖南伯仔”是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老芋仔”应是由“老湖仔”的闽南语发音转变而来是可信的。

《拥抱阳明山系列——冷擎步道》一文的作者萧秀梅在讲述有关阳明山“河南勇”“河南营”由来时指出：

1. 河南二字指的是什么？比较完备的说法是当清廷在收复台湾之后的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因为戒慎郑成功的势力再起，以及后来朱一贵、林爽文事件之骚动，为防止台民拥兵叛变，所以台湾的防务不用台兵，而是由大陆各省抽调军队轮流防守。到了清朝中叶，兵员的主力是湘军，“湘”是湖南的简称，因“湖南”的闽南语发音近似“河南”，念来念去遂变成“河南”了。

2. 这些湘军在民间的以讹传讹之下，被称为“河南勇”，

这就像今日称呼大陆来台的老兵为“老芋仔”一般自然，官方文书不见记载，但民间的口耳相传倒是极为普遍。

3. 而这些湖南军队，有的是因移防，后来调回中国大陆，有的却客死台湾，后由善心人士在淡水附近盖了一间万善堂，祭祀这些孤魂。

清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康熙对台湾并不重视，在施琅的死谏之下才勉强于康熙二十三年设省，由福建省巡抚分巡。当时施琅提出两岸“三不政策”，严格管制人员进出台湾，从那时起，清朝由大陆各省征调军队轮流防守台湾，三月轮调一次（即所谓的班兵制）。从清朝中叶起，台湾防务是以湘军为主力，所以今日阳明山上的“河南道”实际上是“湖南道”（因为当时并无河南兵驻守阳明山的史料纪录）。

由前述一些学者专家的论述可见，“老芋仔”一词就是由“老湖南仔”闽南语演变成“老湖仔”，再转变成“老芋仔”而来，实在有点出乎台湾人意料。

1988年蒋经国逝世前，曾多次公开说他也是台湾人，就是希望促进族群融合，从高位者做起，不分外省、本省。马英九祖籍湖南省湘潭县（一说是衡山县），担任台湾领导人8年，在他第一次出来竞选台北市市长时，

就高喊自己是新台湾人，就是希望不要有族群矛盾。台湾唯一民选省长宋楚瑜祖籍湖南省湘潭县，他在当省长时，也多次公开呼吁不要分什么“芋仔”“番薯”，还编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说大家都是新台湾人。在台湾少数民族面前，没有任何人有权去定义谁先谁后，谁本省谁外省。对少数民族而言，我们汉人都是后来人，只有在少数民族包容及先民的艰辛垦荒下，我们汉人才能成为今日的新台湾人。台湾汉人更应谦卑对待不同族群的人，才能真正促进族群和谐及团结。

事实上，“老芋仔”是对湖南人的尊称，如今是所谓外省人的统称；而“番薯”虽是所谓本省人的统称，但它并不代表本土。用很简化及错误的植物或符号去代表某种族群的意义，是没必要的，更何况这些符号都还是错置的。

《拥抱阳明山系列——冷擎步道》一文作者提到这些保卫台湾人的湖南官兵，有的因移防后来调回大陆老家，有的却命丧台湾，幸运者有同胞或善心人士为其安葬或盖庙（如新北市淡水区万善堂的善众黄德利先生及杨富田先生），祭祀这些湖南籍忠魂，其他无亲无故者，则可能曝尸乡野无人善后，真是让人心寒。现在台湾还有少数人竟认为当年

牺牲生命保护他们祖先的人是台湾的外来人，这些搞族群分化的人的祖先在天有灵知道他们的后辈这么做，不知会做何感想。事实上，诚如笔者一开始所述，台湾已无省籍问题，人民已开始理性思考，如果今天台湾还有省籍问题，2008年及2012年湖南籍的马英九就不会高票当选台湾领导人。2016年台湾选举结果清楚地告诉我们，问题在经济（政策如何惠及小市民，而非大财团），不是省籍或统“独”问题。两岸应专注在那些中间民众，他们才是决定两岸未来的关键力量，而他们心中没有省籍问题。如笔者在第二章所述，“台湾”一词在台湾少数民族西拉雅人语中就是指“外来者”“侵略者”（包含这些搞族群分化的政客）。严格来说，从台湾少数民族的角度看，这些搞族群分化的人也不是本地人；从地球村的角度看，全世界都是一家人，实在没必要分彼此。台湾人自己要觉醒，不要再分什么“芋仔”“番薯”、本省外省，去分裂族群。台湾汉人和少数民族都源自大陆，与大陆同文同种。两岸的关系近可追溯至三国时期的卫温、隋炀帝时期的陈稜，远可追溯至9200年前来自大陆的南岛语族人，两岸本是一家人。这些历史事件、文化遗迹及史料，不容少数人任意篡改！

